



正見
合辑 · 二〇一三年冬

轮值主编：武卓韵

本期设计：钱争予

观察员：

陈仲伟	方可成	傅若兰	归宿	韩笑	励轩
刘含章	刘冉	刘岩川	马军	缪莹	邵立
宿亮	陶郁	汪吕杰	王磬	王绍达	王韬
吴瑶	武卓韵	杨鸣宇	于灵歌	袁林	袁幼林
张跃然	周航				

制图师：

卜书剑	龚方舟	黄俊如	黄雷蕾	焦佳文	吕妍
钱争予	苏颢云	魏天瑶	姚辰	张韧刚	周优游

新媒体运营：

操傲文	韩智轩	李大岩	吴睿	赵蒙旸	张烨
-----	-----	-----	----	-----	----

设计师：

钱争予	朱丹青	黎达	林育颖	周优游
-----	-----	----	-----	-----

工程师：

靠谱地谈论中国

关于政见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从官员到农民，从时评人到的哥，似乎人人都可以评头论足一番；但是，似乎又没有人能真正将它弄明白、说清楚。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充斥着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和似乎永无止境的争吵，但是，它们都太局限了。

要想更靠谱地谈论中国，你需要接触更智慧的头脑，吸取更优质的思想资源。

我们的使命与愿景

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的“政见 CNPolitics”，希望带给你这样的

资源。我们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独立网站，成员包括海内外政治学研究者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我们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则，跟踪阅读全球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部分呈现给你。

我们引介的思想资源，绝大部分都是在大众传媒上无法见到的。它们呆在仅有专业人士才经常问津的学术期刊、报告、会议中，普通公众鲜有机会接触。

当然，来自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比起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比起社交网络上那些泛着情绪化泡沫的争吵，学界的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基于丰富的研究材料，经过了理性的逻辑推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观点，是更值得你参考的信息。

我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多位大学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了我们制作的内容，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期刊曾转载我们的文章，还曾有省部级官员与我们联系，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得到了包括大西洋月刊在内的众多外媒译介。不过，比起这些，我们更看重每一位普通读者从“政见”的内容中吸取的营养、得到的启发。

我们的风格与旨趣

我们致力于发掘理性、靠谱的思想资源，理性并不等于枯燥，它们往往是鲜活、有趣、令人茅塞顿开的。

我们将普通人难以接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强调“专业性、趣味性、信息量”的写作风格呈现给你，节省你的宝贵时间。

媒体报道

他们不忙着在公共辩论中站队，而是为读者普及热门话题背后的知识；

他们不直接发表政治意见，而是编译介绍外国的学术观点；

他们管自己做的事情叫“政治科普”。

〈年轻政网深入浅出〉，《联合早报》，2013年6月30日

5月21日，一个由青年人自发组织的非盈利网站“政见”发布了一条“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微博。3个月内，这条微博被转发2786次，评论382条。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转发微博并评论道：“中国公民基础知识之一：多民族。好帖。收了！”

一个名为 CPGTour 的网友评论道：“太棒了，要顶！如果这个有英法文版就更好了，给外国人介绍时更加生动。以前没见到过这么棒的图文并茂又简洁的分析介绍。”

《凤凰周刊》主笔黄章晋曾写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专题，他看到这张图后，留言道：“看到这图，想想我的呈现形式，我觉得我像一条听到自己腰椎咔嚓一声折断了的小狗……费劲巴拉地写了一大堆，被人一张大图给灭了。”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中国民族报》，2012年7月24日

新一代人对现实的认知和行动力，完全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他们知道怎么通过社会网络激发参与和共建新的平台，从生活的裂缝本身，给社会撕开了新的出口。

《商业周刊 / 中文版》(Bloomberg Businessweek)

各界评价

口水少、有新知，值得关注。

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者

总体来说，“政见”的信息图新闻产品引领了业界的潮流，树立了一定的评判标准。经由“政见”的介绍和推广，信息可视化的概念在国内新闻界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政见”团队自身具有有别于专业媒体的特殊性，它的信息图新闻也并非量产，但它在新闻领域作出的信息可视化尝试确实在逐渐改变国内传统的生产模式，更新了受众的阅读体验，这对于信息时代新闻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龙昊，《新闻信息可视化的尝试——以“政见 CNPolitics”的信息图新闻生产为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

一群年轻的新闻人将目光投向海内外的学术界，将最新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简洁但又严谨地报道出来，为

普通公民提供更为专业、独到的优质信息。如果你渴望在时政话题上比市井杂谈、网络吐槽有着更为深入地表达和理解。

北大媒介观察

与其关注大 V，不如关注 @政见 CNPolitics，理性地思考政治。

微博网友 @Nate_invictus

“永远不要怀疑那一小部分有思想并且持续努力的公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这种精英主义的话刊登在 @政见 CNPolitics 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微博网友 @龍助

政见合辑

二〇一三年冬

编者的话

雪夜漫谈	1
------	---

政见·内

政治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7
习近平的治理策竟能否成功？	12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17
“达标”模型：理解中国官僚组织行为的另一种视角	22

乡镇政府：夹缝生存，疲于奔命 27

村委会还是党支部：农村治理谁说了算？ 31

经济

中国外汇储备为何这么多？ 35

“住、行、学”是扩大内需的重点 41

人口变化将为中国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46

市场化改革并未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 51

要做“全球化城市”，北京缺点什么？ 56

不同行业的经济转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 61

社会

中国大学：研究投入快速增长，研究成果依然匮乏 67

千人计划未能激励顶尖学者回国 72

非营利组织正在填补农村教育空白 77

工业污染在乡村：农民只能“靠自己”？ 82

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对警察的不同信任 86

民众的沉默：医疗改革的媒体话语分析 90

中国式移民：“贫贱不能移？” 95

维权带头人：“活雷锋”与“谋私利” 99

历史

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秘密” 103

从民营到党管：报业转制缘起国民党治下 107

法律

转基因立法：在美国和欧盟的两极之间 112

动力：在国际压力与民意要求之间 118

路径：在政治环境与技术细节之间 122

互联网

互联网普及能否增强民主诉求？ 128

“话不投机”的百度与谷歌 132

民族宗教

国家如何影响宗教：以新疆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为例 138

他们为什么抗拒对中国的认同？ 145

中国民族政策调整路在何方？ 151

家庭教会对中国社会自组织的启示 157

宗教慈善团体低调扩张 将国家权力“化为己用” 161

两岸三地

国民教育在香港：97 前后的变化 169

经济稳定增长，香港人为什么不满？ 172

台湾民众：政党不可信任但不可或缺 175

台湾父母如何影响孩子的政党偏好 179

政见·外

经济

“中国制造”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 185

美国“页岩气革命”对中国有何影响？ 189

中国商人与加纳员工：劳资关系缘何紧张？ 193

援助换资源？ 197

用定量方法探索中非资源贸易的后果 201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优势独特，但水平依然偏低 205

中国日益依赖世界的稳定和西方的繁荣 209

政治

- | | |
|--------------------|-----|
| 中美对朝政策可能走向一致? | 214 |
| 中美冲突的风险超过冷战时期的美苏? | 220 |
| 中国、美国、缅甸：合作式的三国演义? | 225 |
| 同床异梦：探究中亚地区中俄抗争 | 228 |
| 欧盟“北极政策”：拉俄联中? | 232 |

他山之石

- | | |
|---------------------------|-----|
| 正规军和游击队：民间反腐网站在中国和印度的迥异命运 | 239 |
|---------------------------|-----|

政见·访谈

- | | |
|-----------------|-----|
| 马修·斯巴克：世界从来不是平的 | 246 |
|-----------------|-----|

政见·美国政治学年会专题

- | | |
|-----------------|-----|
| 什么样的帖子更容易被删除? | 254 |
| 中国走入非洲的两种模式 | 259 |
| 书记和县长对教育投入的不同态度 | 263 |

政权合法性来自绩效？	267
微博与公民参与：从大学教室开始	271

加入我们

成为政见观察员	278
成为政见设计师	280
加入政见新媒体运营团队	281
成为政见工程师	283

编者的话

雪夜漫谈

“美东即将迎来不知道今年的第几次暴风雪，而据新闻说，北京上周才刚刚迎来冬天的第一场雪。”当我打算用这句话作为这本冬季合集的开场白时，忽然意识到，在外求学的这几年中，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饮食天气，都不自觉地一遍遍地在与中国做着比较。而这种比较无论初衷为何，都成了我认识周围环境的一个起点。

但是单纯的比较不仅不能带来任何有益的启发，反倒会让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变得狭隘而偏激。在厌倦了简单评判“好”和“坏”之后，很多在外求学和工作的人要么放弃了这种虐心的思考，要么开始探寻这“好”和“坏”背后的意义。以我的理解，这种对于“好”和“坏”的追问，正是“政见”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我去年十月份刚刚加入了“政见”团队，所以这本合集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学习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三个月中，我以一个刚刚加入的小白的身份，目睹着每天邮箱中众多的邮件往来，看着一篇篇象牙塔里的论文在观察员手里变成通俗的文字，再到媒体团队的手中变成迅速传播的消息；我亲历了网站的改版和微信平台的上线，见证着“政见”在新的平台上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正与我们分享着对世界的观察。

在以实用为导向的法学院中浸淫了三年，学术二字似乎离我越来越远。而在法学界的学术讨论中，我不断发现宏大的学术观点和漂亮的理论背后往往总有挥之不去的作者的价值观的阴影。既然最终都是在用数字和逻辑证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证明的意义何在？这成为了长久以来我对所谓“学术”的疑问。

去年年初我在台湾大学法学院以交换学生的身份待了半年，期间旁听了一位政治立场颇为激进的教授的讨论课。他在讲课当中似乎从不回避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于是我终于在一次作业中表达了自己对学术研究和学者价值观这二者关系的疑问。他在回复我的邮件中这样写道：“因承认人之具有主观性，我主张学术研究者应明示其价值观，以接受学界检视其所为的客观描述是否

被主观价值观所干扰。价值观或理念来自信仰，或是被‘说服’（法论证的核心）。我尊重别人可以有不同的价值，但坚信自己的价值，愿意为此价值而奋斗。”

这种坦诚的态度或多或少解答了我的一些疑惑，也正是这种坦诚的态度使得我们试图靠谱地去谈论中国成为了可能。这本合集集合了“政见”在2013年10月至12月间所发布的55篇文章，其中包括49篇研究速览，1篇专访和5篇专题。它们涵盖了内政外交，跨越了历史现实。从最高层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到最基层的村委会，从内需如何拉动到外汇储备如何使用，从边疆的民族政策到两岸三地的身份认同，从热门的转基因食物到冷冰冰的死刑制度，不同学科背景、身处不同国家的团队成员们以靠谱的态度选取了靠谱的研究，用靠谱的方式将这些观点传递给您，以期待我们能够在追求真理这条永无止尽的道路上，稍微迈前一步。

作为团队中资历最浅的成员，能够编辑这样一本合集，并能将自己的感想与大家分享，感到惶恐而又无比荣幸。而更能让我感到荣幸的，也正如所有“政见”的同仁们所期待的，是“政见”能够得到你们不断的批评、鼓励和支持。无论你每天是在用手机还是电脑，无论是刷微博、看微信还是查邮件，能够与你一起分享“政见”对这

个世界的观察，能够与你一起靠谱地谈论中国，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最大动力。

武卓韵

2014年2月于美国

政见·内

政见 · 内

政治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爱国主义者并不像民族主义者那样会把对祖国的热爱诉诸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因而，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热爱中国并不必然意味着蔑视或敌视外国。

◎ 陶郁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一对概念，虽然含意相近，却又存在重要差别。同样一种行为或言论，有些人会将其解读为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爱国主义的表现。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更加准确与客观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区别？

最近，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艾利娜·辛肯恩（Elina Sinkkonen）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研究报告，不仅对这对概念做出了清晰区分，

并且通过分析 2007 年对 1346 名北京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所收集的资料,说明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学生,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偏好具有明显差别。

辛肯恩指出,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把自己作为一国公民的自豪感单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之上。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优秀,并因此无条件地支持自己国家。所谓“爱国主义”,则指人们认为自己与祖国之间存在情感上的密切联系,而这种具有自豪感的联系,往往不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主要生发于对本国特质的欣赏。

辛肯恩调查问卷的蓝本,来自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ISSP,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在她的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基本均等,北大、清华和人大学生分别占有效样本的 32%、21% 和 38%,另有 9% 的学生来自其他高校,其中,五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是中共党员,超过四成受访者的父母也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超过九成受访者是汉族学生。

在访谈问卷中,辛肯恩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同意程度为一系列陈述打分。通过汇总计算这些分数,辛肯恩不仅了解了调

查对象是否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绪，也了解了调查对象看待外交政策的态度，并据此分析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辛肯恩发现，受访者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弱，主要与三个因素显著相关。首先，北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低于其他高校，不同专业的受访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其次，相对于党员，那些曾经或者正在申请入党的学生民族主义情绪更高，非党员的民族主义情绪则较低。最后，来自农村的学生往往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除此之外，性别、父母教育水平、民族以及对于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等因素，则与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水平关系不大。

受访者的爱国主义情绪强弱，也取决于三个主要影响因素。首先，党员比其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更加强烈。其次，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爱国主义情绪往往不如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最后，那些认为自己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爱国主义情绪也相对较弱。而父母教育程度、性别、专业、民族等因素，则与受访者的爱国主义情绪水平关系不大。

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绪，是否会影响人们看待外交政策的态度呢？辛肯恩发现，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

对于外交政策往往也具有比较强烈的偏好，而且往往更倾向于支持经济保护主义政策，更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具主导性的作用。而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学生，则往往更强调国家合作，也往往更具国际主义情怀。

辛肯恩认为，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爱国主义者并不像民族主义者那样会把对祖国的热爱诉诸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因而，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热爱中国并不必然意味着蔑视或敌视外国。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辛肯恩发现，无论受访学生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多么显著的差异，他们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却呈现出高度的一致。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北京高校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政府完全相同，即：绝不允许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独立出去。

辛肯恩的研究在抽样方法上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调研只着眼于北京几所比较排名靠前的高校，而问卷则是在自习教室里随机发放的，令人怀疑这些结果是否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然而，考虑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常被作为标签使用，而二者之间的微妙区别又常成为人们辩论和争吵的焦点，辛肯恩的研究还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至少，对照辛肯恩的调查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审视

自己的言行，掂量一下自己到底是爱国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或者，在我们下次用“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来形容某种行为或言论之前，可以也应该首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直觉是否准确。

参考文献

- Sinkkonen E. (2013).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216, 1045–1063. doi:10.1017/S0305741013001094

习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

3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目前的经济局势下持续壮大，其政治诉求也日渐强烈，这对习近平保守的政治改革路线构成了挑战。他们称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政治的十字路口”，如何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并冲破改革的瓶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郭毅 / 特约观察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结束，围绕中国改革方向的探讨还将继续。“习李新政”成效如何？新一届领导团队能否带领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他们又将以什么样的政策方针来应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

布鲁斯金学会研究员李成与 Ryan McElveen 于美国《当代历史》2013 年 9 月号发表题为《习近平的治理策略能否成功？》的

文章指出：改革如果不向法治、政治体制深化，将难以取得更好的成效。

两位研究者将习近平执政一年来的政策总结为：经济上趋向自由，政治上则相反。和以往的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类似，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改革较之政治改革更容易着手。习近平延续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起源于邓小平时代的治国思想，并实施更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目前的经济局势下持续壮大，其政治诉求也日渐强烈，这对习近平保守的政治改革路线构成了挑战。他们称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政治的十字路口”，如何满足中产阶级的需要并冲破改革的瓶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成与 Ryan McElveen 考察了习近平、俞正声、张德江和王岐山四人的从政经历，并从中总结出：他们均在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主导过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在推动市场开放、支持私有经济、鼓励外国投资及海外贸易、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方面有着高度的共识。整体而言，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具有极高的经济建设水平，并在经济改革方面不遗余力，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不如经济改革幅度大。

而除了这几位深谙“经邦济世”之道的核心领导人之外，习近平还任命了一批同样不寻常的部级干部——周小川，楼继伟，刘鹤——他们是深化改革的“总技术官”（technocrats in charge）。央行行长周小川曾经主持国有银行的商业借贷转型，并推动资本市场的开放；财政部长楼继伟自 1990 年代起便参与税制改革与债券市场的建立，并于 2007 年出任中国国家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发改委的刘鹤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曾号召加强市场导向型经济从而限制国企垄断，并主张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国内消费拉动型。可以看到，这三位已经走马上任的“总工程师”将利用一系列手段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他们的经济主张折射出习近平的改革指导思想。

但经济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急剧的城市化进程、房产泡沫、可能由 GDP 下滑导致的银行危机、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等现实问题都对领导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梦”这一新兴概念也因为中国政府与官方媒体不够明晰的阐释，导致其无法在民众中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的减速、基尼系数的上升也使得社会稳定成为一大问题。

改革刻不容缓，但面临瓶颈。困难存在于利益集团之间。庞

大的国有企业依旧把持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他们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政策的制定，但是中产阶级则对此形成制衡，保证这一场对曾经垄断一切的国有企业不利的经济改革得以正常进行。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处于国有企业与中产阶级这两大利益集团的夹缝之中。

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中产阶级将逐渐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对政局的影响也将逐渐加大。而现阶段的大学毕业生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因此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实际上对中产阶级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抱有巨大的期待以及迫切的需求。如何满足这一处于上升地位的社会阶层的要求，是改革的重要的命题之一。

诚如李克强所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阻力之大，利益关系之复杂，均要求极高的智慧、极大的魄力以及一往无前的坚毅来面对。在制度层面，两位研究者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是法治改革，其次是实现新闻自由，最后是推动党内民主。两位学者的研究显然强调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影响力，但需要指出的是，围绕这一问题在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论。中产阶级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中国新一阶段的改革？这一话题依旧需要更多更为细致切实的讨论。

参考文献

- Li, C., & McElveen, R. (2013). Can Xi's Governing Strategy Succeed? *Current History*, 112(755), 203–209.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方英文译名并不是“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而是“state security committee”，这似乎预示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应对内部安全威胁。

◎ 归宿

近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引发国内外观察分析人士热议。其中，公报中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尤为引人关注。

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原孙云 (Yun Sun) 近日在“战

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 (*Pacific Forum CSIS*) 上发表文章, 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安全机制建设的一大举措, 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解决。

“十年磨一剑”

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实际上已经在中国领导层和学术界讨论了十余年。作者指出, 这一动议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左右。当时,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中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安全风险急剧增多, 妥善管理这些安全风险的难度持续上升, 而中国缺少跨部门的国家安全协调机构的弊端也在逐渐显现。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提出应仿照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建立类似的机构, 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便应运而生。

但是, 出于种种原因, 当时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差别甚大。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更类似一个危机应对管理机制, 而非总体国家安全事务的管理机构。

作者认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是中国

十余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一项重大举措。这个机构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设计者、监督者和协调者，规范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咨询流程。同时，这一最高机构也将整合协调各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权责，避免狭隘的部门利益危及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国家利益。

诸多问题仍待解决

尽管各界都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有着良好愿景，但毕竟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只有一句话，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明确或解决。

首先，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方英文译名并不是“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而是政治意味更浓的“State Security Committee”。这就预示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应对内部安全威胁。同时，在三中全会公报中，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节被放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框架下，也从另一个方面为这种判断提供了佐证。当然，作者也提出，在当前国内外部威胁关联交织的背景下，应对外部安全威胁

也应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职责。

其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何种结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同时应对外部和内部安全威胁，其职能范围将覆盖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中央政法委两个机构。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真的取代了上述两个部门，那它将成为一个超级机构，这也是中国外交和安全机构设置的一次重大变革。但同时，这个超级机构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难题：如何协调与军方的关系？中国军队有自己的决策程序，只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作者认为，如果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能协调好与军方的关系，其作用必然要受到限制，甚至有成为第二个“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可能。

第三，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底是一个常设机构还是应急危机管理小组？作者指出，尽管分析人士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争论，但从过去十年的实际情况看，中国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成为一个精干的常设机构。

作者最后指出，虽然不确定因素甚多，但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界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依然充满期待。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安全挑战前所未有，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强化相关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协调，可谓正当其时。

参考文献

- Sun, Y. (2013). China's New "State Security Committee": Questions Ahead. *PacNet*, 81. <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net-81-chinas-new-state-security-committee-questions-ahead>

“达标”模型： 理解中国官僚组织行为的另一种视角

由于权力的分散，单一部门要完成任务指标，必须寻求其他部门的合作和帮助。因此，为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必须建立一种联盟来共同应对来自上级部门的任务压力。

◎ 杨鸣宇

无论古今，庞大的官僚组织一直是中国政治系统的突出现象。如何理解官僚组织的行为逻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教授曾提出“锦标赛”模型（tournament model），成为一个较为经典的解释，其基本思路是在层级的官僚组织里引入绩效竞争机制，使上级官员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控制下级官员的行为，以合乎上级

的利益偏好。

“锦标赛”模型无疑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然而它不能解释一些同样普遍存在于官僚组织的行为。比如，为了达到上级要求，下级政府之间通过“串通”的方式来达标，规避上级的指标审查压力。最近，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个模型来解释这些行为。

这个模型缘自公共政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林德布鲁姆 (Lindblom)。他认为，官僚组织一般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去获取足够的讯息进行完全理性的决策，因此，为了尽量避免决策结果的不可预期性和应付由问题引起的短期压力，官僚组织会倾向选择一种“小修小补” (incrementalism) 的方式来对既有政策进行改进，并不断根据新的讯息调整目标，而不是寻找一种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案。

由于中国官僚组织的主要压力来自上级规定的任务指标，因此在中国的背景下，林德布鲁姆的理论或许可以翻释为“达标”模型 (muddle through)。通过对一个市级环保部门的长期参与式观察，周等发现地方政府部门间至少同时存在三种不同的行为逻辑：

- ※ **满足任务指标**: 完成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
- ※ **抱团和结盟**: 由于权力的分散, 单一部门要完成任务指标, 必须寻求其他部门的合作和帮助。因此, 为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必须建立一种联盟来共同应对来自上级部门的任务压力。
- ※ **设计激励机制**: 上级部门需要设计出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下级部门能够完成分派的任务。在“锦标赛”模型下, 上级部门可以通过单一的指标进行绩效评估, 从而奖励任务完成中的成功者。然而如果任务涉及多个政府部门, 单纯通过单一指标建立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因为不同部门间可以通过串通的方式来完成指标。

在该市级环保部门完成十一五规划(2006—2010)减排任务的过程中, 这三种行为逻辑交替出现。首先, 在2006—2007年度, 由于国家环境保护部和省级环保局还未给予明确的减排年度指标, 因此市级环保局接受了县级环保局提供的并不真实的减排数据, 并协助县级环保局通过了上级部门的审核。

到了 2008 年的中期考核，由于年度减排指针已经明确，满足任务指标的压力成为了首要任务。虽然市级环保局在汇总的减排数量上已经达标，但有一定数量的县级环保局未能满足要求。为了维持市县两级环保局的合作关系，市级环保局需要通过对数据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来改善这种状况。

最后，到了 2009—2010 年度，市级环保局完成五年计划的减排要求已经不成问题。因此，在确保辖下的县级环保局都能完成任务指针的前提下，市级环保局开始更注重激励机制的使用。具体做法是：虽然上交的减排数据均进行过调整，然而调整的幅度将根据县级环部局真实的减排情况来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减排更成功的县级部门将可以得到更高的排名。

地方政府部门这种根据特定形势而不断调整自己行为目标的做法，和“锦标赛”模型所预期的官僚组织存在一个稳定、单一指标并可预期的行为模式非常不同，它更接近林德布鲁姆所描述的情况。当然，“达标”模型的关注点并不是要否定“锦标赛”模型，而是提供一个另外的解释框架。周等在结论部分明确提出：两个模型可能在适用的行政层级上存在区别，“锦标赛”模型更适用于解释

层级较高的政府机构行为，而“达标”模型在中层政府机构中的解释力更强。

参考文献

- Zhou, X., Lian, H., Ortolano L., & Ye, Y. (2013). A Behavioral Model of “Muddling Through” in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hina Journal*, 70, 120–147.

乡镇政府：夹缝生存，疲于奔命

镇政府不仅忙于对外招商、对上接待，还要对下执行维稳和计生任务。在多重夹击下，镇政府疲于奔命、士气低落。

◎ 刘岩川

政治学界对中国县政府职能和村庄治理著述颇多，但较少审视在县和村之间的乡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格雷姆·史密斯在安徽进行了 21 个月的考察，近距离研究了镇政府在转型期的生存状态。考察发现，镇政府不仅忙于对外招商、对上接待，还要对下执行维稳和计生任务。在包夹之中，镇政府疲于奔命、士气低落。

迫于发展指标的压力，乡镇政府把大批人力、物力和时间消耗在招商引资上。在人力方面，一个招商团队往往由乡镇的一把手领衔，同时凝聚了不同部门内交际最广、思维最敏捷的工作人员。这样一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任务就落在了平庸者肩上。而因为一把手疲于拉项目，日常工作中办公室主任扮演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

乡镇政府在招商方面的财政成本也不容小觑。三年免税和廉价地皮等硬性条件已是大行其道的招商手段。饭桌酒席上的浪费更与乡镇财政收入不成正比。史密斯援引国内学者的研究指出，虽然县政府有伙食标准，但在招商任务面前，一切标准烟消云散。

使乡镇政府疲于应对的还有频繁的领导检查。有研究发现，乡镇一把手每年有 100 至 150 天要接待上级领导，偶尔还要抽调人力临时组建不存在的单位、训练居民称颂不存在的试点，以粉饰平时鞭长莫及的领域。接待费自然也是乡镇的主要开销。有乡镇干部向史密斯抱怨说：不是自己挥霍，而是领导嘴馋、贪玩。据统计，陪领导唱卡拉OK、蒸桑拿和打麻将要消耗乡镇 5% 到 10% 的财政收入。某些乡镇甚至因为接待而负债累累。

上级政府和乡镇的分工也打击了后者的工作投入。类似派出

所、财政所和工商所等实权部门往往接受县或省的领导，成为上级的“垂直单位”。农技所之类的清水衙门则留在了乡镇一级，称为“下放单位”。下放单位因为待遇低、晋升机会少，而且看厌了乡镇为逢迎上级随意派活的脸色，士气尤其低落。目前的基层政治，既剥夺了乡镇对实权单位的控制，又打击了下放单位的工作热情。

除了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史密斯指出乡镇也受到来自下层的挤压。为了加强对村庄的管理及精简乡镇政府，大批乡镇干部被下派到村里。在史密斯造访的某些村庄，下派者甚至多过村干部。大多数下派者从事着并非分内的工作：维稳和计划生育。尤其是计生工作的“一票否决制”，即对不能完成计生任务者取消当年荣誉评选和晋升资格，使乡镇干部丝毫不敢怠慢。

下派的趋势也影响了乡镇和村庄的政治氛围。年轻干部希望通过下派积累晋升的资本，但很多人全力游说领导，争取不去有访民和钉子户的“是非之地”。一些下派干部破坏了村里的选举公平。特别是前任支书因故下课的时候，下派干部的熟人就有了可乘之机。长期在乡镇任职而不得晋升的干部，更觉得下派是不升反降，是对政治生命的否定和浪费。

上层和下层的双向盘磨，已经对乡镇产生了离心效应。史密斯

在采访中发现，在以招商、接待、计生和维稳为主的工作中，基层工作者已经身心疲惫。首先，无论工作难易，必须按要求完成，否则批评骤至。循规蹈矩理所当然是保险的做法，可是一旦出现访民，责任都在乡镇工作者。其次，对于急急忙忙炮制的大量文件，工作者自己也觉得是无谓的文字游戏；反观闲暇时间，与清茶和报纸为伍的无聊状态同样令人难堪。对于态度消极的下属，乡镇领导也心有怨气。

乡镇已经步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正轨了吗？史密斯的研究表明，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参考文献

- Smith, G. (2010). The Hollow State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3, 601–618.

村委会还是党支部：农村治理谁说了算？

相较于建国初期党支部担任农村“一把手”的情况，村委会主任越来越多地能够与村支书分享权力。二者权力地位的高低主要受到乡镇政府、村民的影响，以及委任和选举的过程是否正义。

◎ 于灵歌

长期以来，在中国农村处于核心政治地位的往往是党支部。自1990年代实行村民选举制度后，村委会的权力影响逐渐增强，与党支部形成“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成为农村治理的两大正式组织。那么，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

在“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背景下，来自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的四位学者利用实证数据与抽样田野调查，对村支

部与村委会的权力分野与互动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两大因素最能决定农村“谁说了算”的问题：一是授权者（principals）的能动性，即乡镇党委对村支部、村民对村委会的影响能力；二是治理主体（agents）的合法性，即“两委”选举或委任的程序正义性。

自实行村民直选制度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于自下而上的全村选民的投票选举。因此，从权力来源即授权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当上级乡镇政府的支配性较强时，村支部的权力地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巩固。这是因为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一级往往需要依赖于农村干部的合作来完成相应指标的政策任务，尤其在分配与村民有潜在利益冲突的“任务”时，乡镇干部更多会寻求强有力的村支书而不是村委会主任来完成，从而给予村支部更多的活动空间。

另一方面，当下级村民的能动性较强时，村委会能够汲取更多的权力。这主要体现于村民集体维权的案例中。由于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比委任产生的村支部与村民联系更加亲密，因而当不合理的政策出现时，与村民略疏远的村支部往往会招致更多的不满，这在乡镇领导者看来也是村支部地位受到冲击的表现。村委会在村

民维权事件中则相对有更多的机会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从治理主体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委任或选举的过程是否正义对“两委”的权力分配起到重要作用。实证数据表明，如果乡镇党委粗暴干涉了村支书的任免过程，就会削弱村支部在村民心中的权威地位。固然理论上良好而有序的农村选举过程会增强村民自我治理要求，有利于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巩固权力。然而现实中乡镇政府也很有可能操纵村委会的民主选举，破坏村委会的合法性。因此对村民而言，选举、委任的合法不仅在于选举权利的平等性，更重要的是选举过程的独立性，尤其免于上级乡镇政府的干涉。

总体而言，相较于建国初期乡镇指派的党支部担任农村“一把手”的情况，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悄然而深刻的转变，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越来越多地能够在农村治理中与党支部分享权力。不过，村民选举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迫切需要建构制度化的渠道，从村民群众中汲取更多的信任资源。

参考文献

- Sun, X., Warner T. J., Yang, D. L., & Liu, M. (2013). Patterns of Authority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who's in charge? W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3), 733–754. doi: 10.1080/10670564.2013.782124

政见 · 内

经济

中国外汇储备为何这么多？

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多个宏观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非单一的政策选择。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内外失衡才是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

◎ 王韬

2013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增长1600亿美元，存量达到3.66万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GDP的44%。此前第一季度意外增加1571亿美元，第二季度增加471亿美元，前三季度数据说明，外汇储备增长在经历了2012年的意外放缓后重新回到高速轨道。老问题也再一次被提出来：中国外汇储备为什么这么多？

人们存钱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花钱，一个国家存钱也是出于

类似的考虑。不过对一个国家而言，这里的收支对象变成了其他国家，国际贸易是交易的手段，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就变成了一国的收支。为了在从别国借不到钱的时候还能有钱可用，或是为了从外国进口东西时有钱可以支付，很多国家就会选择把一部分钱存在央行，以备不时之需。这是一国进行储备最显而易见的原因。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大规模地积累外汇储备，作为预防或应对危机的手段。最近的很多研究似乎在证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Kathryn M.E. Dominguez 等三位学者 2012 年的研究显示，危机前拥有更高储备的国家与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有正相关关系。Joshua Aizenman 等人 2010 年和 2012 年的研究则证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减持或损失外汇储备的方式以应对冲击。

但是，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样的预防性动机（precautionary motive）并不足以解释中国极高的外汇储备。以 2012 年末为例，中国外汇储备相当于同期外债存量的 4.5 倍，总进口额的 1.8 倍。两个比例都远高于普遍认为合理的外汇储备数量。换句话说，为了发挥其通常职能，中国远远不需要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

更重要的是，持有外汇储备越多，潜在的资产损失风险就越大，

这种损失在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显著。欧美经济体普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利率持续处于低位甚至是“零利率”，这使得外汇储备获得极低的收益。此外，人民币逐步升值导致了储备在国内真实购买力下降。这些都是国民财富的损失。既然如此，近年来外汇储备为何仍然高速增长？

一种颇为流行的解释是，外汇储备是中国政府有意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和欧元。央行通过发行债券或使用人民币吸纳外汇，增加外币的需求，助推外币升值，以此对冲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被看作是中国外汇储备很高的主要原因。如此的观点也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论点提供了支持。

在此基础上，积累外汇储备甚至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稳定因素的考量。避免人民币迅速升值可以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保护外贸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虽然从经济效率看不是最优，却是基于现实政治考量的次优选择。相比于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成本，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确保中国社会稳定，这样的损失是值得的。

但是有很多学者不同意上述的解释。他们认为，外界普遍高估了中国政府操控汇率的真实能力。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本

身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种更加合理的视角，或许是将巨额的外汇储备视为多个宏观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非只是单一的政策选择。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内外失衡才是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重点研究了中国国民收支帐户长期存在的“双顺差”现象。“双顺差”是指中国同时保持着经常帐户和资本金融帐户顺差。通俗地说，就是中国不仅通过商品、服务贸易和要素收入从外国赚钱到国内，同时还有资本的净流入。二者共同是巨额外汇储备的原因。

经常账户方面，中国自九十年代初一直保持顺差，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随时间变化各有不同。改革开放早期，“出口创外汇”的外贸促进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了积累足够的外汇购买国外商品，中国政府有意地支持对外出口。而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超额的居民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这变成了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虽然经常账户盈余在GDP的占比近年来逐步下降，但是国内经济失衡的状况并未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在近十多年来也持续保持资本帐户顺差，这与

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发展的政策选择有关。外资在中国长期“受宠”，不仅能够享受税收优惠，还能以低廉成本使用劳动力和土地。各地方政府彼此竞争招商外资，甚至将其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与此同时，由于国内金融市场不健全，对内融资渠道不畅，国内企业只好对外融资，这样还能顺便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附加收益。偏爱外资的激励机制，吸引了巨额外资流入中国。但是由于中国对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施加管制，加上汇率和利率没有放开，资本账户无法自行调节，于是只能在资本账户形成持续的盈余。

国内经济失衡是硬币的一面，全球经济失衡是另一面，而这集中体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失衡。”双顺差“形成了巨额外汇储备，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用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换句话说，就是美元被重新借回给美国。表面上看，只要美国继续支付利息，中国继续借钱给美国，这个游戏会一直进行下去，但是，这一体系蕴含巨大的风险。随着美国政府财务状况恶化，通过货币宽松政策稀释外债的倾向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的损失只会越来越大。

针对内外经济失衡的经济状况，中国政府并非无动于衷，早在2005年后就开始采取应对举措。刺激国内需求、允许人民币稳步

升值、将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区域间货币互换等行动都被提上日程。尽管如此，经济不平衡却并未明显改变，外汇储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于永定认为，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必须在更加核心和关键的问题上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具体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停止使用外汇市场干预的手段控制汇率，与此同时，逐步放开资本帐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与此同时，这些改革都事关重大，必须谨慎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 Dominguez, K. M. E., Hashimoto, Y., & Ito, T. (2012). International reserve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8(2), 388–406.
- Aizenman, J., & Hutchison, M. M. (2012). Exchange market pressure and absorption by international reserves: Emerging markets and fear of reserve loss during the 2008–2009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1(5), 1076–1091.
- Aizenman, J., & Lee, J. (2008). Financial versus Monetary Mercantilism: Long-run View of Large International Reserves Hoarding. *The World Economy*, 31(5), 593–611.
- Yu, Y. (2012). Rebalancing the Chinese 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8(3), 551–568.

“住、行、学”是扩大内需的重点

不同于较为常见的观点，本文认为消费不足的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在“住、行、学”等领域的有效投资不足。

◎ 王韬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学界和政策界已获得广泛共识：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相比之下，国内消费则增长乏力。作为应对，近年来中国政府已采取种种刺激内需的措施，新一届领导层也将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多项改革举措也都指向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

但是，围绕这一议题仍有许多关键的问题有待厘清：中国国内

消费真的如同主流观点所说增长乏力么？经济结构转型只是意味着抑制投资、增加消费么？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重心应该在何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王国刚教授的论文《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该论文在今年7月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通过将消费内容分为“吃、穿、用、住、行、学”六部分，文章指出，中国国内消费率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住、行、学”方面的支出占比增速过慢。虽然从长远来看，扩大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扩大内需的重心，但是在现阶段，要想提高消费率，就必须提高消费性投资，通过消费性投资增加“住、行、学”方面的供给。

所谓“住”指的是住房以及与居住相关的消费，“行”指的是医疗保健、道路和通讯等领域的消费；“学”指的是各类教育、文化、体育、娱乐方面的消费。

文章指出，在1994—2008十五年间，居民消费和居民储蓄大多数年份的增速都快于GDP，消费率下降的真实原因并非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在十五年间，“吃、穿、用”的各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经济发展理论的预测是相一致的。相比之下，居民消费在“住、行、学”方面的占

比则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增速在大多数年份却低于GDP增长。这些领域的支出比重上升速度无法抵消“吃、穿、用”所占比重下降，共同导致了消费率整体的下降。

因此，文章认为，“住、行、学”是消费结构改善的主要内容。但是，“住、行、学”三个领域恰恰处于消费对象的相对短缺，供不应求，因此，要有效扩大居民消费，就必须首先增加供给。中国经济长期以生产性投资为重心，消费性投资则相对不足。具体而言，2004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一直比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卫生保障、公共事业等领域的投资高出5—20个百分点。

文章认为，通过扩大消费性投资的路径解决“住、行、学”消费不足的过程，同时就是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将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结为：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城镇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衡量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到位？最佳的标准是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在温饱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对“住、行、学”领域消费日益增长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那么该如何满足诸如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住房、体育等领域的消费需求？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还是私人品？文

章认为，虽然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更多地赋予这些产品服务福利性质，但是发挥市场机制也至关重要。关键在于针对不同层次的供给区别对待。以教育为例，义务教育和部分公立大学应该是公共品，但是其他大学、职业教育等教育服务则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在所有这些领域，产业化和机制创新都大有可为，需要突破现有体制，深化体制创新。

围绕扩大内需、城镇化战略和经济结构转型等政策热点，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有趣而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于较为常见的观点，本文认为消费不足的原因并非需求不足，而是在“住、行、学”等领域的有效投资不足。但是，完全否认需求不足对内需不足的作用是值得存疑的。有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居民对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预防性开销是居民储蓄逐年增高的原因，这一部分预防性储蓄之所以无法转变为有效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花费过高有关。此外，我国居民收入虽然稳步增长，但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些需求方面的因素同样不该忽略。

事实上，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非相互独立。按文章所指出，如果政府在“住、行、学”增加投资，提升必要

的公共服务，这也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不可能仅靠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本。一面是对政府投资的仍然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升的客观需要，如何平衡二者，须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更多有意义的探讨。

参考文献

- 王国刚 (2010). 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 经济研究, 12, 72—83.

人口变化将为中国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中国未来人口变化将主要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储蓄等两个方面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负面冲击。是否能度过难关，有赖于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政府的政策创新。

◎ 邵立

周雪光、魏昂德等六位斯坦福大学学者，在今年六月的《亚洲研究学刊》上讨论了中国人口变化可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的冲击。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将面临两个最重要的人口问题，一个是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二是人口性别比例的不平衡。此外，由于城镇化使人口在空间上的大规模迁移也有可能是动荡因素之一。

人口变化的影响首先会出现在劳动率和生产率之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口红利”。据研究指出，在1982年到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到15%。但劳动人口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占据总人口数量的74.5%。之后便会萎缩。有学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口红利将面临枯竭。不过也有反驳者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一定继续依靠人口红利，也可以依靠生产率的发展。有学者估算中国目前的生产率大概仅为美国的13%，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这种发展潜力的实现，依靠的是对教育和健康的持续投入，而这两项对于中国来说都存在软肋。

从教育投入来说，研究者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既缺乏效率，也缺乏平等。教育投入严重依赖着家庭的资助，将延续代际之间的贫困。据文章估算，在中国592贫困县中，5到16岁的学龄儿童将占据未来劳动人口的25%到30%。这些地方的教育系统的教育方法严重落后，依然依赖死记硬背和灌输，而不是教会孩子学会学习方法。职业教育的发展赶不上计划，高中学费高昂，在全世界的农村地区公立高中排行第一。数学和英语教育赶不上劳动力市场需要，而计算机训练就基本上没有。在健康投入方面，贫困农村地区

接近三分之一的小学生缺乏微量元素，缺铁性贫血现象普遍。大量农村地区的学视力不正常。而劳动工资的上涨又使学生缺乏继续留在学校的动力，使辍学率持续增加。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健康、营养、教育等投入严重缺乏，也会降低中国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无法适应未来高技术、高工资的经济生态，从而让提高生产率的目标蒙上阴影。

另一方面，人口寿命期望的提高也会造成经济负担。因为提高的是人们退休后的寿命，并不能对劳动力做出贡献，却增加了社会保险和医疗的投入。对中国人口造成威胁的还有慢性病在劳动力中的蔓延。高脂肪和高热量的摄入，体育活动的减少，默许男性抽烟的文化，这些都让慢性病发病率迅速追上了高收入国家。

研究者也同时指出了人口变化对生产率带来的有利一面，例如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表明，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投入比多个子女要高。也就是说，生育率的减少有可能提高个人生产率。此外，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会被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大军抵消一部分，而未来极有可能实行的延迟退休政策也有可能减轻负担。作者认为，这取决于未来政府是否能提出有创造力的政策，例如是否会改变现行的“二胎政策”。

人口变化对经济造成的第二个冲击，来自于资本和储蓄之上。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父母养老的需求。据研究者的估计，中国三分之一的储蓄率增长来自于年迈父母对儿女——尤其是儿子的依赖。而独生子女政策，加上性别上男多女少的不平衡，使得有独生子的父母更倾向于给儿子攒下“老婆本”，提高储蓄的需求。由于中国的社保系统并不健全，金融市场也不发达，这种高储蓄是为了养老、健康等基本的消费和家庭支出，而不是在提高生活质量上，也就很难让储蓄变成资本再投资。如果将来情况得不到改善，中国便会错失“第二轮人口红利”，也就是由于高资本 / 劳动力比率和提高生活质量所带来的内需扩大和经济发展刺激。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人们将更多储蓄花在养老和医疗之上，储蓄率可能会迅速减少。长期依赖高储蓄率来处理坏账呆账的国有金融系统，便可能遭遇风险。

人口问题除了在生产率和资本投入两方面影响中国经济之外，还有可能在以下几方面造成冲击：第一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将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市场的前景和预期。作者举了城市化的例子。随着城市化急速推进，农民工将失去原有土地作为社会“保险”。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便会失业成为流民。第二，高度性别不平衡会增

加犯罪率，影响社会稳定。在农村地区，大量老年人需要照顾，迫使年轻夫妻一个在外赚钱，一个在家照顾老人。两人长期分居，也会让离婚率提升。而赡养老人的巨大负担，也可能会损害传统代际之间的亲情伦理。最终，人口变化还有可能冲击中国目前的政治统治结构。政府系统加大对社会挑战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紧张。官僚系统的过度扩张有可能成为人们不满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建立在由政府领导的高增长和高消耗基础上的“中国模式”，将会在经济下行时，由于无法兑现承诺而遭受威胁。

作者最后总结道，人口变化的确会延缓中国的崛起。但最后的结果如何，并不明确。在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中等收入的制约和提高生产率的困难，未来的五年里，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将会放缓。但是长期的发展还要看中国社会是否能够适应人口问题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 Eggleston, K., Oi, J. C., Rozelle, S., Sun, A., Walder, A., & Zhou, X. (2013). Will Demographic Change Slow China's Ris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2(3), 505–518. doi:10.1017/S0021911813000557

市场化改革并未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

虽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只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在本质上依然如旧。造成这一现象的机制，是市场、政府两股力量相互组合的结果。

◎ 张跃然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经济地位存在明显差距。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只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在本质上依然如旧。

这项研究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Lu Yao 和加州大

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王丰合作完成。两位研究者分析了 1995 年和 2005 年在上海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系统抽样社会调查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社会调查的时间点，恰好落在国有经济部门改制和市场化改革在城市大幅开展之前和基本完成之后。

数据显示，在 1995 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显著。这一发现本身并不令人惊讶。1990 年代中期，城市居民基本上仍在“单位制”的覆盖之下，主要供职于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等公有部门。由于这些公有部门基本不在外来务工人员当中招工，外来务工人员别无选择，只能进入私有经济部门。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地位不平等的体现。换言之，外来务工人员在经济上的弱势，是由政府对公有部门的保护和对私有经济的打压而间接造成的。

那么，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私有部门不断壮大，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的经济地位是否变得更加平等了？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从事行业等变量之后，对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在 2005 年，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的月收入水平没有明显差别。看起来，如“市场转型理论”所

预测的那样，市场力量的深化似乎带来了社会平等。

但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将“所有制部门”这一变量加以控制之后，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本地居民的月收入水平又变得显著起来，而且显著水平和 1995 年属于同一量级。换言之，当同等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供职于同一所有制部门时，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薪水。

即使将私有经济部门单独拎出来分析，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收入鸿沟也未能填平。这意味着，市场扩张和私有部门的壮大并没有减低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市场化改革展开之前（1995 年）相比，十年的经济体制转轨仅仅改变了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之间经济不平等的形式（从公私部门的简单二元对立变为各个所有制部门内部的不平等结构），而并没有弱化其本质。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的国企改制使得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了“单位”体制。相应的，许多城市居民自愿（“下海”）或被迫（下岗失业）地进入私有经济部门，和外来务工人员产生了直接竞争关系。在这一竞争中，外来务工人员成了相对利益受损的一方。

造成这一结果的机制，是市场、政府两股力量相互组合的结果。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企业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三十余年来

未曾改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外来务工人员不仅与许多职业福利无缘，而且缺少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化渠道。因此，雇佣外来务工人员并压低他们的工资，变成了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至上”的倾向又导致其缺少对企业进行监管的动力。

另外，面对被迫放弃国有部门“铁饭碗”的本地居民，地方政府不得不对他们进行保护，由此催生了地方保护主义。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为本地居民自主创业、开展个体户经营制定的种种优惠政策。而外来务工人员在成为“个体户”的过程中，与这些优惠政策无缘。

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本地居民在工作环境、就业稳定性上的差距同样值得注意。1995年，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比本地居民多11.8小时/周。到200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6.9小时/周。2005年，77%、96%的城市本地就业人口分别拥有正式合同、社会保险，而只有39%、19%的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同样待遇。

这一研究虽然只是基于上海一个地区的数据，但我们也能从中窥一斑而见全豹。决定当今中国社会不平等结构的，不再仅仅是政府或仅仅是市场，而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八届

三中全会报告明确了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表明了政府继续推进市场改革的决心。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配套的制度安排依然扭曲的情况下，市场的扩张无益于缓解社会压力。政府需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的竞争舞台，并防止过度市场竞争造成不平等加剧，从而和市场形成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Lu, Y., & Wang, F. (2013). From general discrimination to segmented inequality: 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6), 1443–1456.

要做“全球化城市”，北京缺点什么？

只靠政府并不能让北京成为国际化城市，只有培育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阶层才能激发出城市蕴藏的真正能量。而北京目前的治理方式与这个要求仍有差距，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如鼓励民众参与更多的公民事务，鼓励商业阶层和非政府组织发挥更多作用等。

◎ 归宿

北京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代表和缩影。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和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这座首都城市的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已成为国际性大城市。但与纽约、伦敦、巴黎、香港等老牌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似乎又缺少点什么。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网站近日发表了清华-布鲁金斯学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的研究报告《作为全

球化城市的北京》(Beijing As A Globally Fluent City)。报告认为，北京已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距离全球化城市(City with Global Fluency)仍有距离。

“全球化城市”的概念最早由原芝加哥市市长戴利提出。他认为，全球性城市是指那些有能力利用全球化的力量推动自身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潜力巨大，能更好地利用当前科技和文化创新和发展成果，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也更具竞争力。

王丰的报告指出，北京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受几方面作用的综合影响，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雄心壮志”，北京长期作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历史积淀，以及近些年来中央和北京市政府两级大量基础建设投资等。但同时，北京成为全球化城市的短板也非常明显，比如经济竞争力还不强，在金融领域的地位还远远不能与其地位相匹配等。

报告认为，北京想要成为“全球化城市”，解决以下四个问题非常重要：

其一，北京是否应该继续扩张？北京的扩张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空气严重污染。但同时，北京的扩张又使其聚集大量的资源，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令其仍然极具吸引力。报告认为，无论是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来说，北京都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但北京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是否需要在每一个领域都领先中国其他城市？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来看，北京市的发展还是追求“大而全”，这事实上不利于北京自身优势的发挥，也不利于体现竞争力。北京要想成为“全球化城市”，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扬长避短。这样无论是对于北京本身，还是中国其他城市，乃至对中国的整体发展都是多赢的结果。

其二，北京如何转变自己的治理方式？作为首都，北京在治理上始终面临着两难选择：是服务中央政府，还是致力于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城市？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前一度加快了向国际开放的步伐，但奥运会后开放的趋势明显却放缓，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报告指出，从北京市的“十二五”规划看，对外开放仍然是北京的优先任务，北京市政府也确立了一系列目标作为牵引。但是，只靠政府并不能让北京成为国际化城市，只有培育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阶层才能激发出城市蕴藏的真正能量。而北京目前的治理方式

与这个要求仍有差距,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如鼓励民众参与更多的公民政事,鼓励商业阶层和非政府组织发挥更多作用等。

其三,如何让北京的经济更有活力? 报告认为,建立创新驱动型、与世界密切关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北京成为全球化城市的基础。北京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成为创新中心的潜质。同时,近些年来北京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区域规划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被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但北京经济发展面临的阻碍仍然很多,糟糕的城市交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尽管全球各大金融机构纷纷落户北京,但由于中国两个证券交易所位于上海和深圳,北京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终究有限。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也是北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障碍。

其四,如何树立北京的国际品牌效应? 一个全球化城市应该对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以旅游为例,尽管北京具有全球顶级旅游资源,但是到北京旅游的外籍游客相对而言仍然不够多,特别是外籍游客与本地居民的比例甚至低于上海。北京也没能吸引更多的外籍人士在此定居,2010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长期居

住的外籍人士只有 9 万人，英语在北京也不够普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北京日益的空气污染使其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大减，这可能是北京市政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参考文献

- Wang, F. (2013). *Beijing As A Globally Fluent City*. Retrieved from Brookings Institute: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3/10/19-beijing-global-city>

不同行业的经济转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

尽管各行业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丰富多彩，但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革的决定，却基本上主要都是由国家做出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央计划经济，虽然市场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入与广泛，但国家仍然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力量。

◎ 陶郁

经济转型显然能够导致社会结构变迁。只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不算太短，随意想想亲戚朋友邻居熟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便不难发现：一些人从经济转型中得到的好处，要远比另一些人多得多。然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以及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更有趣的问题，在于经济转型到底通过何种方式对社会结构变迁造成了什么样的

影响。

经济转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每个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由于不同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职业和职位各不相同，它们受经济转型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可能也大相径庭。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 (Andrew Walder) 与两名合作者发表论文，指出在中国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经济转型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机制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源泉，则在于国家对不同产业部门实行产权改革的方式不同。

魏昂德等学者重点讨论了农业、钢铁和房地产这三个主要产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他们指出，国家对于这三大领域的产权改革都相当彻底，而如今这三个产业内部的市场化竞争程度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由于上述三个领域产权改革的方式存在根本区别，导致经济转型在一些产业内减少了收入差距，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加剧了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差异程度。

在农业领域，改革以前，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掌握在生产队和集体农场手中，而种植计划往往也是由社队集体确定的；改革以后，配置劳动力和制定种植计划的权利被下放给每个农户，但农村土地依然不允许私自转让。在这种情况下，农户成为了主要生产

单位,可以自由安排自身的生产活动,但也要为自己做出的经济决策负责;同时,改革还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可以进入其他领域获得工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家庭收入得以普遍提高,而对于土地私自交易的禁令又防止了以收取租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主阶级产生,改革缩小了不同家庭之间的农业收入差距。

与农业领域不同,钢铁产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在改革前后都掌握在国家控制的机构和企业手中,但经济转型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依然显著。改革以后,市场机制在钢铁产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尽管主要钢铁企业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企业管理层对于资金和人事的影响力却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在市场规律的驱动下,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并购和下岗分流。而在此过程中,钢铁工人的“铁饭碗”被彻底打破,许多人失去了改革前的固定工资、福利待遇甚至稳定工作。随着“大锅饭”时代的结束,钢铁产业的经济效益得以显著提升,但下岗失业也降低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

房地产领域的改革则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改革以前,农村住房主要依靠农民自建,而城市住房则往往由单位

负责提供，那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得以出让土地，而随着“房改”政策的推行和大量商品房被建设开发，城市地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而这一市场又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剧烈城市化进程而变得蓬勃兴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较早进入房地产开放领域并在其中取得成功的企业主，得以跻身中国最高收入的人群之中；而随着房价和租金不断提升，许多拥有多处房产的城市居民，也在改革中不断见证着自身财富的增长。但是，房价上涨也给无房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而从事房地产建设的广大农民工群体也未能完全享受城市化的红利。因此，房地产领域的改革虽然显著不同于钢铁行业，但同样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分层。

在此基础上，魏昂德等学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各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间所经历的产权改革在内容与方式上都大不相同，而上述过程也确实使得经济转型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因行业而异的鲜明特点。然而，尽管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丰富多彩，但各行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革的决定，却基本上主要都是由国家做出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虽然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央计划经济，虽然市场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入与广泛，但国家仍然对经济运

行和社会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国家在控制贫富差距和优化社会结构等方面，也应当肩负责无旁贷的义务。

参考文献

- Walder, A. G., Luo, T., & Wang, D. (2013).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kets. *Theory and Society*, 42(6), 561–588. doi: 10.1007/s11186-013-9203-2

政见·内

社会

中国大学： 研究投入快速增长，研究成果依然匮乏

中国大陆高校虽然在科研经费投入和发表论文总量等比较容易操作的指标上取得了极大进步，但如果想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需在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效率等方面狠下一番功夫。

◎ 陶郁

10月2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公布了2013—14年度世界大学排名。在这份深受全球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重视的榜单上，除分别位居第45和50名的北大清华外，再无任何其他中国大陆高校得以跻身前200名。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莫玉琳（Kathryn Mohrman）的观点——不久前，她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研究报告披

露：虽然一些中国大陆顶尖高校近年来在科研投入等多项指标上缩小了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但其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和生产效率仍亟待提升。

莫玉琳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领域的资深研究者，还亲自领导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战略规划联盟，并曾在多所美国大学担任过行政管理职务。无论出于教育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还是出于教育规划专家的职业身份，莫玉琳都特别重视研究型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在她看来，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分布并不均衡，少数成功的研究型大学控制着大量学术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知识生产；因此，大学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直接影响着一国在全球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地位。

为考察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莫玉琳从世界范围内选取了 21 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进行比较。这 21 所大学中，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 5 所中国内地高校外，还包括 3 所日本高校、3 所美国高校、3 所欧洲高校、2 所澳洲高校、2 所香港高校和 3 所位于亚洲其他地区的高校。莫玉琳分别统计了这些高校在 2003 年和 2007 年的表现，重点考察“985 工程”二期建设对于中国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莫玉琳通过大学网站、官方报告、国际研究数据库和个人访谈等多个渠道收集资料，并从财务状况、研究经费、出版发表和学者水平等方面对 21 所大学进行了系统分析。数据显示，5 所中国大陆高校在 2003 至 2007 年间的支出增长速度都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支出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就对于每位研究者的平均投入而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虽然不能与美国和日本高校媲美，但却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许多欧洲和亚洲高校的水平；而四川大学、天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情况则相对逊色许多。当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此期间接收的“985 工程”专项经费，也远远高于其他 3 所中国大陆高校。

莫玉琳发现，2003 年到 2007 年间，世界主要研究型大学都显著增加了研究投入。就绝对规模而言，中国大陆高校的研究投入目前仍显著落后于美日高校，但二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显著缩小。不过，在此期间，亚洲其他地区的高校也大量提高了科研支出；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韩国高丽大学的科研经费增长速度甚至比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要高出 18 到 29 个百分点。或许受到美国政府降低科研支持力度的政策变动影响，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的人均研究投入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下降。

然而,就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中国大陆高校仍与国际一流水平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莫玉琳指出,全部 21 所高校在 2007 年的高质量论文发表量都高于 2003 年,而 5 所中国大陆高校的论文发表量增长比率更位居前列;然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在于部分中国大陆高校 2003 年只发表了很少的高质量论文。此外,若对每位研究者的平均发表量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5 所中国大陆高校表现异常乏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 5 所中国大陆高校中,没有一位学者被选入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 (ISI) 基于学术成果影响力评定的学科核心人物,而东京大学、牛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分别有 31 名、45 名和 89 名学者入选。

那么,中国大陆高校近年来巨额科研投入的生产效率,又究竟如何呢?通过计算单位论文的科研支出金额,莫玉琳发现:虽然中国的消费水平远低于欧洲,但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出版一篇论文平均所需的科研经费,却要多于位居欧洲高收入国家的牛津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巴黎第六大学。莫玉琳指出,这或许是中国大陆高校正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因而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前期的建设和准备工作;当然,与欧洲大学相比,得益于“985 工程”的实施,中国大陆高校也确实拥有更多可以自主支配的研究

经费。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型大学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结果，不仅关乎大学自身的声誉，更关乎大学所在国家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是相当明智的。然而，如同莫玉琳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高校虽然在科研经费投入和发表论文总量等比较容易操作的指标上取得了极大进步，但如果想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需在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效率等方面做很多努力。

参考文献

- Mohrman, K. (2013). Are Chinese Universities Globally Competi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727–743.

千人计划未能激励顶尖学者回国

在学术界，压抑的学术环境和复杂的关系网往往使得海外新人才对中国望而却步，或者仅仅选择一只脚在国内，一只脚在国外的状况。

◎ 缪莹

发展中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西方国家留学，以求更好的前途，但这往往会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脑力流失（brain drain）。因此，这些国家经常用尽全力挽留本国人才，鼓励他们回国就业。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国务院出台的“千人计划”就是激励海外人才返华的政策之一。在《中国季刊》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香港科技大学的 David Zweig 和中国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王辉耀教授认为，此

项计划成功引领了华侨回国创业的风潮，却没能鼓励最佳的华人科学家和学者回国。

其实，脑力流失在近年来已经有所减缓，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愿意回归祖国就业。对此，主流的观点解释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展开：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类人才的需求极速增长，人才进而可以促进国家发展，以至政府可以出台鼓励政策来激励人才回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与此同时，Zweig 和王辉耀认为，政府在此间的作用是必不可缺的：为了吸引人才，政府应该将反向移民（reverse migration）的成本和困难减到最低。

在作者们看来，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薪水和解决住房问题来吸引人才回归，同时开放双重国籍或绿卡政策，以便已经加入了其他国家籍的人士回国工作。对于尖端学者们，将新的实验室或大学的管理权交给他们是不错的选择；而对于创业者，建造高新区，减少税赋以及给予他们进入本地市场应有的帮助将会十分吸引人。但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大力鼓励科研，以创造一个适合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这不但包括投资，还包括杜绝歧视，以免某些缺少跨国资本的本地人士因为眼红而阻挡回国人士的发展。

中国对海外人才回国发展的大力鼓励可以算是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从九十年代起到至今，国务院一直在注重学术界和经济界高端人才的归国发展，从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到现今层出不穷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考察行，几乎可以说，国家对此投入的精力是源源不断的。可惜的是，被这些计划吸引来的归国人士往往是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他们中缺乏尖端人才，更缺乏科研经验。复旦大学的一位副校长便就此发表言论说：“他们并不能算是明星。极少的人来自一流大学，或者在做一流的工作。”

与此同时，归国人士们往往抱怨他们需要花太多精力来搞好人际关系，或者浪费时间在无止境的文书工作上。北京的一些科研机构甚至面临着“内部脑力流失”（internal brain drain）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归国人士正离开国家科研机构而跳槽到私人机构或国际企业，以期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那么，中国政府的努力有得到回报吗？

在论文中，作者们用 2008 年的千人计划为例，并对其成功率做了一番仔细的调查。他们发现，千人计划的华侨们普遍年龄较大（平均 50 岁），并大多在八十年代便取得了他们的博士学位，使得他们的学术成熟度较高。他们中将近 60% 来自美国，20%

来自欧洲。令作者们觉得欣慰的是，在他们调查的 501 位归国华侨中，有 55 位是在中国取得学位后才移民，最后被项目吸引而归来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收回他们之前在这些学子身上投入的教育投资。

然而，这些数据并不能克服千人计划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所给予高端人才们的工作合同仅仅为期五年，而非终身职位。对往往在海外可以拿到终身职位的高端人才来说，这非常不具备吸引力，以至 74% 的调查对象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海外机构的职位，而只是在中国做半职工。作者们还指出，大多这样做半职工工作的教授们已经年过半百，更不容易做出永久移民的决定，所以他们的半职状况或许并不会得到改善。

另外，数据显示，有 87% 的学术人才是 08 年之后才回归祖国，也就是说他们的确是被千人计划吸引而来。然而千人计划中有 84% 的创业人才在 08 年前便已经大多回到中国，这意味着千人计划对于创业者来说只起到了一个政府认可的作用，而没有另外的吸引人才作用。然而在学术界，压抑的学术环境和复杂的关系网往往使得海外新人才对中国望而却步，或者仅仅选择一只脚在国门内，一只脚在国门外的状况。如此看来，Zweig 和王教授认为中国面临的情

况是与其说是脑力流失，不如说是“脑力流转”（brain circulation），并没有长久的流失，也没有长久的获得。是否能改善这种状况，还要看中国政府的持续努力，以改善大环境为先。

参考文献

- Zweig, D., & Wang H. (2013). Can China Bring Back the Best? The Communist Party Organizes China's Search for Talent.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590–615.
doi:10.1017/S0305741013000751

非营利组织正在填补农村教育空白

在政府与市场未能覆盖的区域，非营利组织正努力填补着农村贫困儿童对基础教育的需求。它们的工作模式有哪些，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与影响？研究者以雪球抽样法调查了 464 家致力于在农村推广义务教育的非营利组织，指出它们正填补着重要的空白领域，且不同的背景与注册身份影响着这些组织的工作模式与成效。

◎ 刘冉

中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落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政府和市场未能覆盖的区域，非营利组织正努力填补着农村贫困儿童对基础教育的需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周慧泉指出：这些组织正填补着重要的空白领域；同时，不同的背景与注册身份影响着这些组织的工作模式与成效。

周的研究发表在《中国教育学前沿》(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杂志上, 研究以雪球抽样法调查了 464 家致力于在农村推广义务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其中约一半 (220 家) 正式注册为非营利组织, 其中 174 家注册为基金会, 7 家无法识别注册类型, 其余注册为社会组织或民办非企业组织。作者将所有组织按照“背景”分为九类: 政府、企业、高校、非高校学术机构、宗教、名人、海外、草根、其他。其中草根组织最多, 占到 37.5%; 政府、高校与企业背景的组织紧随其后。政府与企业支持的组织中, 超过 95% 有合法注册的身份, 而草根组织中只有不到 15% 曾正式注册。

这些机构在中国农村开展着不同类型的项目。其中, 一对一资助是较为普遍的项目类型, 大约 42% 的组织都有类似服务; 30.4% 的组织曾开展乡村图书馆建设项目; 28.9% 的组织对农村学生直接提供资助; 27.8% 的组织对农村学校进行实物捐赠。

有些项目中, 注册组织占据了绝对优势, 例如建设新学校、改善学校硬件设施、农村教师培训和资助等。这些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以及与当地政府、捐款者和学校进行持续有效的沟通协商。对非注册组织来说, 这种程度的资源动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某些特定项目中, 非注册组织正担当主力, 例如短期志愿者支教、农村学生咨询服务、实物捐赠、家访、与农村学生互通书

信、农村教育研究调查等。这些项目对资金要求不高，却需要大量人力投入；对于草根组织和高校背景的组织来说，较大规模的志愿者团队令它们更有机会开展此类项目。

机构背景和身份不仅影响着它们开展的项目，也影响着它们开展工作的方式。例如，在建设图书馆和图书角项目上，注册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更倾向于提供一模一样的设施和符合教育部大纲的图书类型，捐款数额也是预先设定好的“一刀切”；此外，这些组织往往会从捐款中抽取管理费用。相反，非注册组织通常更为灵活，让捐赠者在捐款数额和书目选择上拥有更多决定权，且一般不会抽取管理费用。

机构背景也影响着其项目规模。例如，尽管只有一家政府机构开展支教活动，其规模却胜过所有草根机构项目的总和。此外，政府机构对志愿者的遴选也严格得多；志愿者会获得补贴和证书，甚至能作为将来竞争公务员岗位的资本。

当然，机构背景也决定着其影响力。例如，在九家开展课程大纲研究的组织中，仅有一家真正能对课程内容产生影响，那就是与教育部关系紧密的中国教育协会。该组织甚至能直接参与教科书制定。但作者表示，很难判断究竟该机构究竟是在向教育部提供

建议,还是在执行教育部的指令。

值得注意的是,非营利组织在设计、实施和评价项目时仍然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例如,“图书角”类项目在建立之后往往处于半遗弃状态,缺乏维护和补充,也缺乏相应的鼓励阅读机制,往往沦为上层官员检查时才拿出来展览的工具。短期支教项目的质量也令人忧心,大部分志愿者并未经过系统培训,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也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还有可能由于来去匆匆而对学生造成情感上的伤害。

总体来看,非营利组织在义务教育推广上仍然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在某些领域,它们又扮演着填补空白的角色。作者指出,这些空白领域分为两类:其一是公共系统由于资源缺乏而未能全面覆盖,例如基础设施、教学质量和学费补贴;其二是公共系统根本不存在相应的服务,例如对学生提供精神关怀等私人性质较强的项目。

其中,一旦公共系统扩展覆盖到第一类空白领域,非营利组织就可能遭遇竞争和排挤,例如自2005年政府开展“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以来,许多非营利组织就不再继续开展此类捐助项

目了。

相较而言，第二类项目中的非营利组织较少受到来自公共系统的挑战。例如，在农民工比例较高的农村，非营利组织远比政府和市场更注重留守儿童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其中，草根组织提供的家访和书信交流等项目更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作者注意到许多乡村教师正面临严重的压力与精神困扰，并指出没有一家非营利组织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这也是一个可能开拓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 Zhou, H. (2012). Promot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What are the NPOs Doing?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7(4), 576–607.

工业污染在乡村：农民只能“靠自己”？

农村居民对工业污染有着惨痛体验，但由于污染源太多、环保局给不出明确的环境评估、无法证明污染物与疾病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居民对污染的理解存在许多缺失。社会经济的变革使农民以个体为单位直面工业污染的风险，但集体行动被证明为最有效的抵抗方式。

◎ 刘岩川

以北京雾霾天为代表的城市环境污染一次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一些城市居民幻想“逃离城市”，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然而，中国农村的污染同样触目惊心。

人类学家 Bryan Tilt 在学术期刊《中国季刊》撰文指出，农民对工业污染有着惨痛体验，但由于污染源太多、环保局给不出明确的环境评估、无法证明污染物与疾病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农民对污

染的理解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Tilt 从 2001 年起在四川的富田镇做调查。当地的工业园区曾拥有三家污染企业：治锌厂、焦化厂和洗煤厂。伴随这些企业的还有百名外来工人及其家属。污染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工业园区冒着高高的黑烟，洗煤厂染黑了河流，治锌厂和焦化厂泛出刺鼻气息。根据 Tilt 自己的测算，富田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达到国家标准的两倍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十倍。

让 Tilt 颇为叹服的是，当地农民有不少关于污染的知识，比如金属冶炼如何对土地造成污染、有毒物质如何进入食物链等等。然而，村民的理解也存在种种缺失。首先，污染从哪里来？村民不确定最严重的污染源是什么。Tilt 发现，邻近富田的乡镇还有不少化工和冶炼企业，而体量庞大的攀钢也在不远处。抛开工业，化验结果表明，当地的可吸入颗粒物不仅来自工业，也有农民自己焚烧木材等物质后的残渣。

其次，污染虽然无处不在，但无人能判定它到底多严重。且不说缺乏科学测量设备的村民，当地环保部门告诉 Tilt，他们由于人力和技术的匮乏而疏于检测。一座环保局要应对 120 个企业，难怪工作人员力不从心。

再次，村民无法证实污染和疾病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医学研究需要在考察大量患者之后才得出因果结论，但当地村民所有的只是个人色彩浓厚的叙述：饭馆老板断定女儿的先天残疾与冶炼的污染有关；村民认为水井距离工厂太近而不敢使用新建的自来水系统。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且考证太难，村民普遍表现出绝望。一位受访者告诉 Tilt：普通老百姓做不了什么，忍了吧。

在考察了村民对污染的认知以后，Tilt 还提到了他们生存的政治经济背景：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将农民从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既给了他们参与市场的自由，也让他们独自承担价格浮动、工业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农户可以选择放弃传统的粮食而种植经济作物，但要独自面对来自污染的威胁。不少受访者向 Tilt 表示过“需要靠自己”的信念。但是，如果“自己”过于弱小，那么“靠自己”与听天由命相差几何呢？

不仅是受到污染困扰的农民，污染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受到“个体化”趋势的影响。改革赋予他们跋山涉水来打工的自由，而吃苦耐劳的态度使他们的收入高出当地农民不少。他们不担心甚至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危害健康。一位受访工人告诉 Tilt，他的工作数年来没给身体带来一点毛病。Tilt 认为，工人们也许是怕失去工作才

产生对污染的容忍或麻痹，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并不属于当地的集体。他们仅仅在市场买卖环节与当地人发生接触，因此不会因为污染而感到道德上的亏欠。

即便改革让社会越来越“个体化”，而且加剧了农民相对于工业污染的脆弱，“集体行动”仍然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抗争方式。在富田，尽管“忍”的态度大行其道，还是有一些村民自发组织联系四川电视台，使环保部门在媒体的压力下关停了污染企业。现在三家企业中的两所已经关闭，另一所转移到离富田不远的云南。

参考文献

- Tilt, B. (2013).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in Rural China: Risk, Uncertainty and Individua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283–301.
doi:10.1017/S0305741013000350

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对警察的不同信任

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对警察的看法是最不具批评性的。这颠覆了学者们的假设，因为农民工往往是受执法歧视最严重的群体。

◎ 缪莹

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带来了不安和冲突。作为应对，中国政府加大了以人民警察和武警为主要后盾的治安管理力量。那么民众们究竟怎样看待警察？在过去十年里，有关中国大众对警察的主观评估研究并不少，但类似研究很少涉及边缘化群体。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授孙懿贤带领一些学者填补了这个空白，他们围绕农村居民、城

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这三个不同群体对警察的信任度展开了对比调查。

在西方的研究中，民众对于警察的信任可以分为两类：程序信任和结果信任。前者指民众对警察公平执法这个决策程序的主观信任，后者则指民众对不同群体及不同地区的执法结果是否公平的主观判断。再细一些划分，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可以分为四个问题：1) 警察是否可靠？2) 警察是否能胜任他们的工作？3) 警察是否了解并共享当地居民的关切和担忧？4) 警察是否能够尊重民众？前两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警察执法的结果信任问题，而后两个则是程序信任问题。

学者们在两个沿海城市以及一个沿海农村地区采集了近一千位调查对象。他们发现，在中国，对警察执法的程序信任和结果信任难以分开。西方研究曾提出“大众更重视程序信任而非结果信任”的理论，但在中国这一点并不能得到证实。中国依旧是一个“权力距离遥远”（high power distance）的国家，民众已经习惯很少参与执法程序的现实——在这样的基础上，对结果的看重是容易理解的。

其次，学者们发现中国大众对警察的看法根据社会分层而变

化。在三个群体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对警察的看法是最不具批评性的。这颠覆了学者们的假设,因为农民工往往是受执法歧视最严重的群体。然而这一发现和近来中国的一些社会调查恰恰不谋而合——在那些调查中,农民工反而是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水平是抱有最大希望的,而城市居民对收入不均、社会不公的反应更激烈。这样的主观反差或许是因为农民工是将自己的现状和更加糟糕的过去在做对比,而城市居民往往会将自己的现状和比自己过得更好的人而做对比。另外,学者们认为,中国民众对警察执法表现的期待值本身并不高,这就容易导致对警察偏高的友好度和支持度。

第三,调查发现民众对警察这个群体表达出的更多是象征性关切 (expressive concerns) 而非工具性关切 (instrumental concerns)。换句话说,民众不仅认为警察是打击犯罪的主要力量,更认为他们应该维护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质量。这一点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调查中更加明显——他们对警察的信任度和他们对所处地区居委会的信任度、生活质量以及小区的治安情况有直接联系。只有农民工这一群体对警察的信任度会受到自身和周边人的安全状况的影响,而他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评估则不影响他

们对警察的信任度。

最后，媒体的作用对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也有极大的影响。城市居民更容易接触和相信有关警察的负面报道，并因此对警察表示不信任。但本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媒体并不需要对此负责任，而是警察中个别人的行为需要改进。

在学者们看来，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反映了他们对当地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 (legitimacy) 的认识。不少研究表明，当民众认为警察是一个合法的社会制度 (legitimate social institution) 时，他们更加愿意遵纪守法，并给予警察部门政治上的支持。倘若警察能够对民众和社会进行公平透明的保护，地方政府在民众眼中的合法性也能够得到增加。

参考文献

- Sun, I. Y., Hu, R., Wong, D. F. K., He, X., & Li, J. C. M. (2013). One country, three populations: Trust in police among migrants, villagers, and urbanite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6), 1737–1749.

民众的沉默：医疗改革的媒体话语分析

《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话语倾向于家长主义式的民粹主义，而《财经》则是精英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现象反映出国内非精英的利益团体（nonelite interest groups）和公民社会的虚弱无力。

◎ 邵立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简·达吉特教授（Jane Duckett）和安娜·兰哲博士（Ana Ines Langer）学术期刊《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上发表了研究文章，探讨中国媒体在报道医疗改革话题时的话语特征。

这一研究对三家媒体进行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第一家是党报代表《人民日报》，第二家是市场化媒体代表《北京青年报》，第

三家是专业媒体代表《财经》杂志。研究主要关注的时间段从 2005 年的 6 月 1 日到 2009 年的 4 月末，即医改新方案正式公开之时。他们利用 CNKI 数据库，输入关键词“医改”和“医疗改革”，获得总共 196 篇文章。

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总体上支持国家主义，倾向于公众的立场，提倡国家加大管理和投入，并普及基本医疗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投入不够，此前的医疗市场化是造成医疗问题的重要原因，造成医院、医生和制药企业追逐市场利益。而《财经》的报道中则有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医疗问题不是市场化之错，而是因为市场化的进程并不完善，而且国家的干涉或垄断仍未中止。它们质疑国家对医疗系统的管理和支持，提倡赋予医生更多的自主权，鼓励私立医院的发展。

在几家媒体的报道之中，48% 的文章同意卫生部的改革方向，支持国家的投入；9% 倾向市场化，12% 主张平衡，21% 报道比较中立。在这其中，《人民日报》有 75% 的报道支持政府介入；《北京青年报》则比较温和，只有 41% 支持；而《财经》则有 35% 的文章支持市场化，在三家媒体名列首位。作者认为，《财经》的报道给主流的政策方向带来了挑战，甚至还曾将全民医疗保险比作大

跃进，认为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倾向市场的报道在开始一段时间增长后，数量就开始下降，因为改革的方向逐渐明朗。主张市场化的媒体开始转向质疑新政策中政府的承受能力和投资能力。

三家媒体报道最多的问题是人们对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问题，占所有报道的 72%，其次还有普及程度不高（49%）、医疗系统效率低下（46%）、医疗腐败（21%）和医患关系紧张（12%）等问题。

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发现，在描述解决医疗问题的方法之时，民粹主义话语而非社会主义话语成为“支持政府”的主流。具体而言，在 196 篇文章中，“社会主义”一词只出现了 18 次，而且在《人民日报》只出现过 6 次，马克思主义则从来没有被使用过。而且各媒体避免使用“平等”和“不平等”等接近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去描述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平等”只出现过 6 次，“平等”出现过 21 次（《人民日报》只用过 5 次）。《财经》使用“平等”一词最多，但只是用来描述私立医院应该有平等的竞争，而非人们有平等的机会享受服务。“正义”一词只使用过 11 次。与此相反，报道喜欢用更自由化的价值语词“均等”（出现 70 次）和“公平”（出现 172 次）。此外，西方国家的医疗政策最喜欢讨论的“病人选择权”的问题，三家媒体都很少提及。而且，作者认为“权利”一词的使用有些

边缘化，三家媒体对权利的关注也有差异：《人民日报》关注的是“广大民众”的权利，《北京青年报》关注的是病人和农村居民的权利，而《财经》关注的是医生的权利。

尽管“民粹主义”是主流的话语，但在三家媒体的报道里，民众的声音非常弱小。大多数时候都是精英在“为民众说话”。政府官员被 83% 的文章提及，他们的话被 58% 的文章引用。专家学者被 41% 的文章提及，被 31% 的文章引用。医疗保险和制药业代表被 14% 的文章提及，医院管理者和医生代表各有 15% 和 14% 的引用率。相比之下，“病人”，“人们（人民）”和“农村居民”被 60% 的文章提及，但也只有 14% 的文章引用了他们的话语。而且，民众的观点经常只用来表达个人经验和感受，而不是对医疗系统和政策的具体观点。作者评论道，除了《北京青年报》有少数文章提及人们对政策的看法，民众仅仅被媒体当作政策的实施对象，而不是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

总体而言，《人民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话语倾向于家长主义式的民粹主义，而《财经》则是精英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现象反映出国内非精英的利益团体（nonelite interest groups）和公民社会的虚弱无力。在西方的医疗政策报道中，政府和医疗相关

利益集团也占有很大的话语权，但同时也会给有组织的非精英集团提供越来越多发声的机会。而在中国，这个机会并不存在。没有多少组织能作为病人的代表发言。存在的组织不但规模小力量弱，还只是代表某种疾病的更狭窄的团体。他们完全缺失在报道之外。此外，这项研究的结果也反映出媒体的自我审查。编辑害怕给民众提供过多自由发挥的空间，造成舆论失控。相反，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辩论显得风险更小。

参考文献

- Duckett, J., & Langer, A. I. (2013). Popu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Diversity and Ideology in the Chinese Media's Narratives of Health Care Reform. *Modern China*, 39(6), 653–680.

中国式移民：“贫贱不能移”

越来越高的移民成本和移民门槛，阻止了大部分普通百姓的移民梦想，移民更多成为了有钱人的手段，“贫贱”真的不能“移”了。

◎ 戴磊 / 特约观察员

“贫贱不能移”，这句出自于《孟子》的经典古文现在有了新的解读——贫穷的老百姓是没有资格移民的。由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移民成为不少富人的选择。据经济学人杂志数据，超过 16% 的中国富人已经或正办理移民，44% 准备离开。在近期兴起的这一波移民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普通百姓的身影。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的两位学者 Zai 和 Miao

针对中国居民的移民现象做了实证分析，他们以中国福建省的部分城市为样本，抽样调查了当地的移民趋势、倾向，并集合国家统计数据，形成了研究论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越来越高的移民成本和移民门槛，阻止了大部分普通百姓的移民梦想，移民更多成为了有钱人的手段，“贫贱”真的不能“移”了。自上世纪 70 年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沿海地区的普通老百姓通过移民海外，有效改善了他们的经济水平。虽然绝大部分移民者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去了国外也是去餐厅、服装厂等工作场所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国外的劳动收入比国内要高很多，这也不断激励着尚留在国内的亲戚、朋友、同乡们积极准备移民。然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如今的移民门槛已经很高——许多梦想通过移民而改善自身经济条件的人，已经被高昂的移民成本所阻挡了。而且现在国外经济形势也不好，中国人移民去了国外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Liang 和 Miao 的研究还发现，移民网络（migration networks）的构建也影响着不同群体的移民决策，并进一步加深了“贫贱不能移”这一现象。一般来说，富人的朋友、亲戚是富人的比例要高过普通百姓的亲戚朋友群体，因此不难理解，富人有更多的移民海外的富人朋友，而这些已移民的富人朋友，则为那些潜在移民者织起了一张移民网络。他们可以

为准备移民的朋友提供有效的移民信息，提供必要的帮助，无形中扩大了移民网络的范围，以覆盖到更多的富人。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由于缺乏成功移民的亲戚朋友的帮助，或者缺乏有效的移民信息、移民地工作信息，使得他们的移民决策更加困难。这似乎显现出了一种马太效应：富人移民更顺利，穷人乃至普通百姓更困难。简而言之，经济基础薄弱以及移民网络的缺失已经成为横亘在普通民众移民道路上的两座大山。Liang 和 Miao 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若家中有政府官员，其家庭成员移民的倾向比较低。作者可能忽略了近年来在大陆官场普遍受到关注的“裸官”现象。不过，“裸官”的发生是建立在官员们拥有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基础上的，他们低调行事，乃至当地纪委都不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故而调查者在调研中也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作者经过调查发现，不少官员会安排他们的妻子、子女、亲戚、朋友在当地各部门工作。这些人在官员的庇护下，通常会获得稳定的工作以及较好的收入，因此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国内较为优渥的生活而移民国外。对“官员”和“富人”的移民决策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行的解释：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官员通常有着更为隐蔽的财富以及财富保护能力，在权力的庇荫下，财富不会轻易被剥夺；而空有财富的富人们，没有权

力的庇护，私有产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更有欲望移民。他们的研究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受教育程度以及年龄都会对人们的移民倾向以及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移民的倾向逐渐降低；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移民的倾向也会逐渐降低。

参考文献

- Liang, Z., & Chunyu, M. D. (2013). Migration within China and from China to the USA: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networks, selectivity, and the rural political economy in Fujian Province. *Population Studies: A Journal of Demography*, 67(2), 209–223.

维权带头人：“活雷锋”与“谋私利”

抗议行为的带头人风险系数最高，为何还会有人甘愿冒险？维权成功后，在利益驱使下，他们的维权动机可能发生变化，开始寻求自身的利益，这会给维权行为带来怎样的影响？

◎ 杨鸣宇

一般而言，集体抗议行为在中国是高风险且预期收益偏低的维权方式，其中又以抗议行为带头人的风险系数最高——所谓“枪打出头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有人甘愿冒这样的风险？他们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带头维权？

通过对北京的业主委员会维权行为的调查，蔡永顺等学者发现，业主可能出于多种动机而成为维权行为的带头人。概括而言，

这是一个混杂着“公利”和“私利”的过程，两者之间孰重孰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更。

房产业主的主要抗议对象通常是地产发展商，在进行维权时他们多数处于劣势。原因有多方面，比如说双方在资源上的差距（钱和关系），很多业主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些业主甚至可能因为缺乏权利意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一个具有相关经验和知识，并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组织抗议行为的带头人出现，虽然不能确保维权成功，但已有的研究发现这确实有助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由文章提供的案例来看，这些带头人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交网络，这些特质使他们更可能组织成功的集体行动。作为“有闲人士”，他们愿意投入到“吃力不讨好”的维权行为里，一方面是因为小区其他居民会形成压力（比如说被推举成为维权带头人）；另一方面，通过组织集体行动反过来有助增加自己维权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在维权行为的初始阶段，带头人可能更倾向把公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因为公利和私利的冲突并不明显。

然而随着维权成功，他们可能由此赢得了声誉、媒体的关注和

相关经验等额外收益。在利益驱使下，他们维权动机就可能发生
变化，再难以无条件为公益投入自己的资源，而开始寻求自身的利
益。比如说通过指导和训练其他业主委员会进行维权的方式来收
费赚钱。这些谋取私利的行为，尽管无可厚非，却会和本来带有公
利性质的“带头人”身份发生潜在的冲突，可能使他们失去小区居
民的信任，并最终失去“带头人”的身份。

简单而言，在业主维权行为上，带头人的动机是复杂的。而无论
带头人是“活雷锋”还是“谋私利”，都将影响到相关组织或机制
的长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Cai, Y., & Sheng, Z.(2013). Homeowners' Activism in Beijing: Leaders with Mixed Moti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513–520.

政见 · 内

历史

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秘密”

最早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组织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试图通过集体方式来实践在传统文化中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修身养性”。它们将个体变化与社会变化视为一体，强调组织纪律和忠诚。

◎ 刘冉

当共产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传入中国，为何有些组织立刻接受了这种崭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另外一些团体却拒绝了它？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徐晓宏近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论文，通过分析五四运动前后 28 个社会团体和会议记录和报告，以及重要活动家的通信、日记和回忆录等珍贵资料，追溯了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被作为一种“主义”得以接纳的过程。作者认为，共

产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发展路径是：通过革命先驱逐一控制五四运动时期业已存在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群体招纳”过程中，具有“道德行动主义”特质的组织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

作者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共产主义发展初期，没有通过其他组织而直接加入共产党的个人大部分都很快退出了，因为他们不习惯共产党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和绝对忠诚。因此，面对正在发生社会变革的中国，渗透和吸引已有的社会组织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核心途径，这被称为社会运动间的溢出效应 (inter-movement spillover)。

那么，究竟怎样的团体才会更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的溢出？作者研究认为，这与不同组织当时的发展情况、成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等组成成分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组织本身的气质与共产主义是否具有天然的亲近性。

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分析，作者筛选出 28 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社会组织：在 1920 年 7 月到 1921 年 7 月期间表现活跃，具有稳定独立的成员体系和规律的团体生活。在这些团体中，有五个最终接受了共产主义，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试图通过集体方式来实践在传统文化中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修身养性”。相反，没有接受

共产主义的团体则更靠近中国传统中的异见知识分子组织。

作者认为，这一组织形式与活动层面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组织气质”(group ethos)，于是，注重修身养性的组织在两个重要方面对共产主义表现出亲近：首先，它们将个体变化与社会变化视为一体，这与布尔什维克将所有党员和组织活动统一视为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互相呼应；其次，它们更强调组织纪律和忠诚，因此更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严格纪律和民主集中制。

例如，建立于长沙的“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就包括推动“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并制定了严格的会员道德标准。新会员必须由五名现有会员推荐，获得全体会员多数票通过，并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旦有会员被发现不当言行，就会被立刻开除。所有会员每年至少要向学会汇报一次自己的思想道德现况，并通过内部出版物公开刊登。在北京和法国，学会还为会员安排了共同居所，并定期举办讨论活动。学会有明晰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并有专门的评议部来负责组织纪律；就连会员的婚姻也可能纳入组织事务的一部分。在当时诸多社会变革思潮之中，共产主义显然比无政府主义等更符合新民学会将个人修养与社会变革视为一体的宗旨。1921年，拥有78名会员的新民学会正式采纳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少年中国学会”尽管有李大钊作为核心领袖，却一再拒绝了他试图将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团体的努力。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尽管学会成员被社会公认为道德高尚，但却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实践，因此学会凝聚力并不高，也难以接受布尔什维克式的纪律。当李大钊和恽代英开始尝试说服学会将共产主义明确写入章程，以解决当前宗旨和纪律太过模糊的问题时，学会内部产生了争吵。反对者认为，学会应当以学习为主，而并非推广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场所；他们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道德规范，认为在旧道德分崩离析、新道德尚未确立的社会背景下，学会没有权力将某种特定的道德标准纳入组织核心理念。最终，两派人分道扬镳。

作者指出，这种组织气质与接受共产主义与否的关联，说明了道德与宗教某种程度上可能通过组织活动影响政治。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党员的个人道德与组织活动依然密不可分，或许这也部分解释了其超乎寻常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 Xu, X. (2013). 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 Group Ethos and Bloc Recruitment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Commu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5), 773–796. doi:10.1177/0003122413500784

从民营到党管：报业转制缘起国民党治下

资本家退出与强权的介入，国家分配印刷材料从而控制出版，以及官方管理报业的计划协调组织，共同形成了上海报业格局中政权取代资本进行统治的权力结构。这一结构使得共产党建政后上海报业能够顺利地、少有抵抗地完成国有化转制。

◎ 于灵歌

1949年后，中共新政权对大众文化进行全面改造。其中，旧报业被改制成各级党委主管、以党报为统领的新型国营报业体系。然而，从民营向党管的报业转制并非突然发生，而是随政治、社会变迁有其历史源起。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陈细晶 (Sei Jeong Chin) 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以 1937 年至 1953 年的上海

报业为例，分析了新中国报业从民营向党管转制的源起。在陈细晶的研究中，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报业格局中权力结构的变迁——资本家对报业的影响力骤降、同时国家管控权力的上升，成为新中国报业成功转制的关键性历史因素。

抗战爆发前，尽管存在国民党方面的新闻审查机制，上海报业仍主要归资本家所有并控制。1937年上海沦陷后，报业结构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大部分战前活跃的民营报纸被归于日军或汪精卫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大大削弱了上海报界资本家的影响力。1941年，日军占领包括租界在内的上海全境，控制并压迫上海报刊的抗日宣传，进步的民营报刊几乎全部被停办或查抄，资本家被迫撤离报界。彼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纸《申报》《新闻报》也难逃厄运，在日方操纵下刊登大量日本报刊的社论和文章。政治威权强行统治了上海报业格局，民营报刊被拷上权力的枷锁。

其次，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上海报业不得不依赖于国家政权获取印刷材料维系其出版、发行。这其中不仅有日方直接的参与，同时，汪精卫政府也先后设立了一系列出版统制机构，如中央报业经理处、中央书报发行所、中国文化总会等，统管印刷机器设备及

纸张的采购分配,进行出版宣传业务的控制。战后,国民政府同样通过国产纸的配给制度来限制新闻出版,报业生存空间遭受到持续挤压。

抗战结束后,上海报业已全然不同于战前繁荣的民营景象。由于战时日军控制,资本家对报业的影响力所剩无几,国民政府顺利接管了上海的整个文化产业,限制甚至“党化”民营报刊发展。以《申报》为例,国民政府以《申报》“附逆”为名,成立以 CC 系要员潘公展为主任的申报报务管理委员会,对其实施管控,《申报》完全被国民党 CC 系控制。至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强迫史沫庚出让 51% 股份给政府,实行官商合办,彻底改变了申报 74 年来的民营性质。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日后上海报业产生持久影响的政策之一是建立报业计划、协调组织,即上海新闻党团的成立。作为一个上传下达、上令下行的国民党中央层工作组织,国民党中央的权威机关直达参会各报,上海的各主要新闻媒体,无论官方民间,统统被置于党团的掣肘之下。

陈细晶认为,战时的这三个重大改变:资本家退出与强权的介入、国家分配印刷材料从而控制出版,以及官方管理报业的计划

协调组织，形成了上海报业格局中政权取代资本进行统治的权力结构。这一结构随着战争结束逐渐加强、巩固，使得共产党建政后上海报业能够顺利地、少有抵抗地完成国有化转制，接受了共产党的管理。

换言之，共产党对报业的改造，是同 1937 年至 1949 年这一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相承接的。

参考文献

- Chin, S. J. (2013).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hanghai Newspaper Industry, 1937–1953. *China Review*, 13(2), 1–34.

政见·内

法律

转基因立法：在美国和欧盟的两极之间

美国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有害，就可推广转基因；欧盟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无害，就得限制转基因。欧美都试图推动国际标准执行自己的立法标准，而两极化的现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领域的选择。

◎ 宿亮

在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中，立法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一些美国环保团体质疑：既然欧盟可以立法强制标注转基因，为什么美国不可以？事实上，美国和欧盟正代表了转基因领域的“立法两极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两极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罗伯特·福克纳 (Robert Falkner) 和荷

兰瓦格宁根大学学者阿赫提·古普塔 (Aarti Gupta) 撰文分析了欧美在转基因立法上的区别，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立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内外政策趋向一致，特别是大西洋两岸在机构框架、政策取向和立法结果上所持立场更是相近。

转基因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现实似乎正在颠覆这一共识。学者们早期也认定全球化对该领域国际机制构建有积极作用。不过，如今的现实是欧美政府转基因“立法两极化”，并已成为全球较为成熟的两种对立观点，难有妥协余地。

美国 1986 年制定《生物技术监管合作框架》，根据“实质等同原则”认定，转基因植物所带来的危害与传统选育品种给人体和环境带来的危害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允许大量试验、种植并在市场上销售转基因食品。

欧盟则于 1990 年通过美国不同的泛欧立法规定。欧盟根据“预防原则”立法，限制那些科学家无法确知是否存在风险的转基因技术。这项立法也就导致欧盟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了源头可追溯、强制标注的措施。

粗略而言，美国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有害，就可推广转基因；欧盟的标准是：只要科学家不确定无害，就得限制转基因。

为食品安全和贸易计，欧美都试图推动国际标准执行自己的立法标准。不少人认为，“立法两极化”的现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领域的选择。

现阶段，转基因国际立法主要依据两个条约。其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关于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这一协议基于世贸组织减少非关税壁垒的初衷，在缺乏国际标准的领域依靠科学判断，只要未确定有风险，就不应执行严格预防性措施。

另一个条约是联合国主导的卡塔赫纳议定书。这一条约则基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初衷，在科学家无法确定新技术不存在风险时，允许采取预防性措施。

换句话说，这两个条约就是美欧双方两种对转基因的对立态度写照。

在“立法两极化”、争议不休的同时，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正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全球范围内频繁贸易的农作物，美国、中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家的转基因农田占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 95%。

福克纳和古普塔在文章中以中国、墨西哥和南非为例。这三个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技术研发居于世界前列，对于转基因的国内讨论也较多。他们在“立法两极化”环境中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具有代表性。

这三个国家均在坚持贸易自由化的路上大力支持生物技术研发。以中国为例，中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是生物科技的拥护者，生物技术市场化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领先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批量种植转基因植物的国家，当时种植的是一种抗病毒烟叶。在中国，十几种转基因作物已经通过试验，仅转基因棉花就有 710 万农民种植。2007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从贸易角度看，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转基因大豆，还向欧洲和日本出口转基因水稻。

中国、墨西哥和南非都是卡塔赫纳议定书成员国，体现了这几个国家虽然鼓励转基因的研发，但对转基因作物的政策仍存谨慎。不过，以这三个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基因立法并没有成型。

仍以中国为例。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中国发展商业化生物技术时并没有明确立法。1992 年，科技部出台《基因工程安全管理条例》，那是一部科学家写给科学家的原则性规定。1996 年，农业

部在条例基础上出台实施细则。在细则中，农业部倾向于要科学地证实转基因的危害，即不强调转基因长远威胁，更倾向于大力发展商用转基因产品。

作为最终决策机构，国务院 2001 年推出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办法，农业部随后出台三个实施细则，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增加风险评估、安全管理和食品标注。

而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似乎是谨慎对待转基因的代表机构。这一机构是中国谈判卡塔赫纳议定书的主要部门。在两名学者对环保总局的访谈中，他们的访谈对象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出台完善的生态立法，对转基因作物形成应急管理系统，但一直没能成功。

在中国的案例中，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中国从 1999 年开始暂停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种植。这一时间点紧随欧盟 1998 年终止转基因种植授权。2000 年，欧盟在中国出口的大豆产品中检测出转基因成分，一度禁止进口来自中国的大豆。2008 年，欧盟要求中国进口的大米及相关产品出示无转基因证明。

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做出限制转基因的决定的重要考量。另外，美国曾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要求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其中

就涉及到美国转基因大豆。中国对转基因的限制措施在学者们眼中，可能是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另外，从内部来看，中国在转基因棉花上的政策就比较宽松。河北、河南、山西和山东 1997 年就开始种植转基因棉花，其中包括在全球陷入争议的孟山都 BT 棉花，710 万中国棉农涉及其中。

学者们认为，之所以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是因为棉花主要是国内市场使用，不进入贸易链条，就不会触及类似欧盟的禁令。

福克纳和古普塔的研究勾画了当今世界转基因立法的一副素描。他们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欧美两种转基因立法博弈中寻求自我立场，受到各种利益因素的影响，在谨慎中部分放松对转基因的规定。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食品安全是生存大计，转基因难以“自证清白”，了解转基因立法的国际环境与来龙去脉对下一步的政策发展显得格外重要。

参考文献

- Falkner, R., & Gupta, A. (2009). The limits of regulatory convergence: globalization and GMO politics in the sou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9(2), 113–133.

死刑制度改革

动力：在国际压力与民意要求之间

中国的死刑案件审理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平台，它包括受害者家属的复仇要求、公众对于参与公共事件的渴望、政府对于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追求，甚至包括基层法官们通过腐败来获得自身利益的要求。

◎ 武卓韵

死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外界常常批评中国的死刑执行数据并不透明。不过，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是，近些年对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力度很大，每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也有了明显的下降。这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学者 Michelle Miao 在近期发表于《英国犯罪学杂志》的文章中，通过对 36 名法律专业工作者的采访，描绘出了这一改革的背景和原因。

作者的采访对象包括人大、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其中 18 名被采访者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采访，作者首先认为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与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有关。绝大多数被采访者认为，死刑制度改革可以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而死刑制度方面符合国际通行的标准可以避免中国在国际社会丢脸。这些意见显示，全球范围内的废除死刑运动通过对话、媒体曝光、批评等多种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效果的确带来了正面的效果。

作者同时注意到，虽然这样的外部压力能够产生正面作用，但并非所有阶层的法律工作者都能认同这种改革。作者提出了一个类似同心圆的结构，处于最中心的是那些位于高层的政治精英，中间是地方的政治精英，而最外层是普通大众。作者观察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的信息互动几乎完全是由位于同心圆中间的高层政治精英完成的。因为这部分人对于西方的信息有更便捷的获取渠道，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理解，也对西方的实际情况有着更客观的了解，所以他们更乐于去配合和理解全球范围内的废除死刑运动——至少是在国内限制死刑的适用。

这种观点在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当中并未成为主流。有来自地

方法院的法官抱怨中国目前所谓的“精英立法”和“学者立法”使得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对于死刑的限制并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比如，最高法要求只有在证据客观确实时才可以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源的限制和公安机关办案的习惯，这种证据数量非常少，而个别案件中受害者家庭和社会公众又强烈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即使在证据并不完备的情况下。相当多的法官抱怨在按照最高法要求没有做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后，他们经常要向被害人家属做大量的工作来解释为何被告人没有被处死，很多被害人家属因此而上访或在法院闹事。

尽管众多被采访者都提到中国目前不能废除死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民意仍然对于死刑有着很强烈的要求，但是作者认为被采访者对于“民意”的判断几乎全部来源于自身的经验和网络获取的信息，而且中国的制度也使得大规模的民意调查无法实施，所以被采访者对于“国情”的判断并不十分可靠。

作者认为，与建国头六十年相比，中国的司法体系在专业化和组织化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这种专业化和组织化使得如今民意对于司法的影响不同于过去的直接影响个案，而是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刑事民粹主义”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意味着刑事司法政策

往往服从于占据优势的民众意见，或者至少符合民众的期望。中国的死刑案件审理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平台，它包括受害者家属的复仇要求，公众对于参与公共事件的渴望（因为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参与受到限制，所以司法案例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意见窗口），政府对于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追求，甚至包括基层法官们通过腐败来获得自身利益的要求。

综上，Michelle Miao 认为，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是一种建立在全球废除死刑背景当中的，包含国际和国内、高层和基层的不同参与者的，充满了冲突、妥协和政治角力的互动过程。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话语权的不断增多，它也越来越可能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做出决策，而减少国际社会对其的影响。作者预测，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将会持续进行，死刑的适用范围将会被进一步限制，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公众感受越来越敏感，死刑制度改革也有可能成为公众表达不满的一个出口，从而导致政府在做出限制死刑的决策时更加慎重。

参考文献

- Miao, M. (2013). The Politics of China's Death Penalty Refor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Abolitionism.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3(3), 500–519.

死刑制度改革

路径：在政治环境与技术细节之间

死刑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是多层而清晰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它与“和谐社会”的口号是相互配合的；在具体工作中，最高法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通过自身在法院系统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和案例指导制度等多种工具为下级法院提供了不断明确的信号和指引。

◎ 武卓韵

在中国近些年的司法改革中，死刑制度改革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样的改革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路径实现的？学者 Susan Trevaskes 在近期的《英国犯罪学杂志》当中指出，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不仅与整体的政治环境有关，而且在具体操作中也充满了很多技术性的细节。

首先，作者认为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与执政党维护社会稳定

和自身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中，刑罚往往与“阶级斗争”、“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等政治词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强烈的与政治话语交织的环境中，死刑制度改革必须配合当下的政治目标。而之前的学者也观察到，中国的最高法院虽然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但是由于其自身专业性和高度组织化的特点，最高法也一直试图在服从党领导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在法院系统中的权威。从 2003 年开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正好为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他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改革意识的最高法院院长——提供了改革的空间。

为了实现对于死刑的控制，肖扬以及其身边的改革者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自 2007 年 1 月起将死刑案件的最终复核权收回至最高法。这一措施立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07 年一年间死刑案件的数量减少了 30%，而死缓数量也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死刑的数量。但这也引起了基层法官和受害者家属们的质疑和反对。改革者们意识到死缓可能是实现进一步改革的完美突破口。一方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可以实现改革者们“少杀”、“慎杀”的目标，另一方面死缓在名义上也可以被称为“死刑”，从而也满足了基层法官和普通民众对判处“死刑”的要求。

2010年6月，最高法等部门发布了两部新的有关死刑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这两部规定（经常被称为“两规”）是当时有关死刑案件审理时法官在自由裁量当中所要考虑的因素的最具体的指导，而这些规定当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合并在了2012年新修订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

尽管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极大地限制了下级法院在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的自由裁量权，但他们仍然面临两个问题。首先，针对农村邻里纠纷引起的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中，尽管最高法院明确要求尽量适用死缓，但是在受害者家庭不愿意接受罪犯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下级法院仍然更倾向于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第二，两年的死刑缓刑考验期过后，罪犯会被减刑为无期徒刑，进而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进一步的减刑，这经常被法官们称为“死刑过重，生刑过轻”。

针对第一个问题，2009年8月《法制日报》连续发表五篇有关依法不核准死刑的典型案例报导，其中的核心内容便是报道最高法

院的法官在死刑复核中如何通过调解使罪犯获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从而避免罪犯被立即执行。针对法官认为死缓意味着未来大幅减刑的顾虑，2011年修改的刑法第五十条增加了限制减刑的规定，这意味着如果罪犯被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在两年缓刑期过后，他们至少还必须要面对25年的有期徒刑；即使未被限制减刑，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他们在2年缓刑期后至少还有13年的刑期。

2011年，最高法第一次颁布有关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便针对了限制减刑的适用问题。在此案中，罪犯由于其女友家人反对二人婚姻，持刀杀害女友，被逮捕后其主动交代了罪行，但在金钱赔偿上并未与受害者家属达成一致。尽管如此，山东省高院在认定其“罪行极其严重”的同时，也认为其罪行属于二人恋爱关系冲突时激情杀人，其对所犯罪行十分后悔，并能够积极赔偿受害者家庭。在考虑到判处死缓所面对的社会质疑后，法院最终对其判处了死缓并限制减刑。在这个案例当中，限制减刑被适用到了“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当中，这也意味着最高法院对如何适用限制减刑做出了更为具体的指导，也对下级法院在死刑、死缓和死缓限制减刑当中如何选择做出了更为清晰的指引。

综上，在Trevaskes Susan看来，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的具体

路径是多层而清晰的。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死刑制度改革与当时“和谐社会”的政治口号是相互配合的，离开了“和谐社会”的政治指导，死刑制度改革不可能顺利提上日程；其次，在具体的工作中，最高法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通过自身在法院系统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和案例指导制度等多种工具为下级法院提供了不断明确的信号和指引；第三，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中，死缓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死刑”，为改革提供了突破口，也为平衡各种诉求和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Trevaskes, S. (2013). China's Death Penalt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spended Death Sent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Penal Reform.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3(3), 482–499.

政见 · 内

互联网

互联网普及能否增强民主诉求？

若某国互联网普及率、民主化程度和民主需求皆处于较高水平，则互联网很可能将在该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 刘冉

成功的民主化转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民主体制的需求。信息时代，民主化理论学者也开始愈来愈关注互联网对民意的塑造。网络的日益普及究竟能否影响各国公民对政治体制的偏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四位学者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发表论文，对非洲与亚洲共 28 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数据进行了多层分析，试图找到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与使用情况

同民主需求之间的关系。

研究证明，互联网在个人层面的使用频率与个体对民主政体的需求相关，但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与此并无相关。此外，民主化程度与互联网普及率愈高，互联网使用与民主需求之间的相关性愈强。

民主化理论研究发现，非民主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以及新兴民主政体的巩固都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公民倾向于选择民主政体。也就是说，“民主”需要“民主派”才能成功。此前曾有不少量化研究分析过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同民主进程之间的宏观联系；而这项研究的特别之处在于更关注公民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力图在微观层面解释互联网如何塑造公民对政体的态度与偏好。

研究者共提出四个研究假设：1) 个人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与民主需求呈正相关；2) 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与民主需求呈正相关；3) 若假设 1 成立，互联网普及率能影响该相关性；4) 若假设 1 成立，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影响该相关性。

研究所需数据来源于 2008 年的非洲民主动态调查 (Afrobarometer Survey) 以及 2006 到 2008 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 (Asian Barometer Survey)，共涵盖了 28 个国家的 37549 名受访者。此外，

研究者还采用了来自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民主化评级、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并计算了互联网普及率。

通过分析数据，研究者发现，在个体层面，除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政治态度等与民主需求相关之外，互联网使用频率也与民主需求呈正相关，即假设1成立。

在验证假设2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互联网普及率与民主需求之间并未呈现出相关性，只有“民主化程度”和“所属地区”这两个因素与整体的民主需求相关：民主化程度愈低，民众对民主的需求愈高；非洲国家民众对民主化的需求高于亚洲国家民众。也就是说，假设2不成立。

此外，作者还发现，民主化程度愈高，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民主需求的相关性愈强。与此相似，互联网普及程度也能够增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在民主化程度和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的国家，网络言论也更为活跃和多元，从而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指出，若某国互联网普及率、民主化程度和民主需求皆处于较高水平，则互联网很可能将在该国未来的民

主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中涉及的 28 个国家中，新加坡、肯尼亚、赞比亚和塞内加尔最符合该标准。而对于坦桑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等民主化程度中等（自由之家评级为“部分自由”）但民主需求不高的国家，若能设法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和个体使用频率，也可能有助于加强其民主诉求，推动民主进程。

中国香港属于民主化程度中等、互联网普及和使用程度很高、民主需求程度中等的地区，因此互联网在民主化进程中亦可能大有作为。由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三波数据尚未释出，研究者未分析中国大陆的具体情形。但依照研究推论，中国民众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民主需求的相关性很可能低于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无论如何，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普及将成为当权者与民主推动者都必须重视的变革因素。

参考文献

- Nisbet, E. C., Stoycheff, E., & Pearce, K. E. (2012). Internet Use and Democratic Demands: A Multinational, Multilevel Model of Internet Use and Citizen Attitudes About Democrac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2), 249–265.

“话不投机”的百度与谷歌

通过比较谷歌与百度在中国的搜索结果，本研究发现了不同搜索殷勤在可得性、重叠度、排序和偏差四个方面的差异，用数据印证了搜索引擎可以通过人为控制来服从于特定的政治与商业目的。

◎ 刘冉

搜索引擎几乎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根据雅虎 2012 年的市场报告，谷歌与百度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上分别占有 15% 与 78% 的份额。2010 年 1 月，谷歌宣布停止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内容审查，并将服务器移至香港。如今三年过去，这个决定对中国的搜索引擎表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传播学系副教授蒋敏近日在《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 上发表论文, 通过比较谷歌与百度在中国的搜索结果, 用数据印证了搜索引擎可以通过人为控制来服从于特定的政治与商业目的。

蒋敏及其研究团队选取了发生于 2009 年的 316 起中国热点事件, 于同一时间段内分别在中国与美国打开百度与谷歌进行搜寻, 并记录每次搜索的前十位搜索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作者指出, 过去的研究往往着眼于网络审查, 而忽视了普通网民的日常搜索体验; 因此, 该研究的事件样本并不仅限于政治敏感话题, 也包括其他能够吸引网民眼球的事件, 涉及流行文化、互联网业内热点、国际新闻、爱国主义等多个方面。作者提出的主要研究问题是: 对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用户而言, 百度与谷歌对网络热点事件的搜索结果在可得性、重叠度、排序和偏差四个方面究竟有何不同?

可得性是指在搜索发生的地点能否打开搜索结果。作者将信息过滤分为三级: 防火墙、搜索引擎和本地内容 / 服务供应商。防火墙过滤是集中化的, 百度和本地内容 / 服务供应商的过滤则是分散化的。墙的过滤有多种方法, 包括封锁 IP、屏蔽关键词和数据包过滤等, 通常会出现“连接已被重置”的警告。作者在中国与美国比较了无法打开的链接, 若在两地皆无法打开, 则认为是网页本

身的问题；若在美国可以打开，则认为是经过了防火墙或百度的过滤。

百度的过滤方法分为屏蔽页面（不返回搜索结果）或部分过滤（返回少于十个结果）。研究中，若返回结果少于十个，则将缺失数目计为经过百度过滤的链接数目。谷歌的安全搜索则会过滤色情内容。然而作者指出，本研究无法证明搜索引擎是否将某些结果预先全部过滤，或人为降低了其排序。

研究者发现，谷歌搜索结果中有 400 个链接无法打开，其中 299 个是由于防火墙过滤，共涉及 19 个话题，其中包括“贾君鹏”、“李开复告别谷歌”等并不敏感的话题。相比之下，百度在中国的 3160 个搜索结果有 171 个无法打开或缺失，其中只有 24 个是由于防火墙过滤，22 个是由百度自行过滤。作者指出，相比谷歌中敏感内容被完全封锁，百度偶尔会允许搜寻者连接到原本应该被封锁的海外异议网站；有时百度也能打开与敏感话题相关的链接，但这些内容大多采用中性口吻或表示支持政府。相比谷歌，百度多了一层自我审查的过滤方式。因此，自从谷歌将服务器迁出中国大陆，其搜索结果遭到了更严重的防火墙过滤，而百度的过滤效果则更加微妙且难以觉察。

在重叠度与排序方面,研究团队发现,在3160对搜索结果中,相同的URL仅有216对,也就是说,百度与谷歌的前十位搜索结果仅有6.8%指向同样的链接。这其中,没有任何一起事件有超过5对相同的结果。仅有44对搜索结果具有同样的排序,其中22对排在第一位;若放宽限制至前三位,则有61对入围。这在3160对搜索结果中所占比例仅为0.7%和1.9%。即使考虑到无法打开的链接,这个比例也仅能达到2.4%与3.2%。作者认为造成如此低的重叠度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不同的搜索技术、抓取原理与过滤原则等。

最后,作者还研究了搜索引擎对其自身旗下内容及竞争对手内容的处理方式。结果发现,百度搜索结果中有89项指向其自身旗下内容,包括百度知道、百度百科、百度空间、百度贴吧等;谷歌搜索结果中有98项指向百度。此外,百度搜索结果中虽有10项指向百度百科,却仅有一项指向互动百科,且完全没有指向中文维基百科的链接;谷歌则搜出了10个百度百科页面、31个互动百科页面和16个中文维基页面。研究进行时,互动百科的条目内容比百度百科多出66%,可见百度的搜索结果很有可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刻意操纵。

作者最后指出，搜索引擎处于信息发布与流通的中心位置，在用户与社会现实之间搭建桥梁，具有揭示、重构、夸大和扭曲现实的力量。不同的搜索引擎建构着不同的社会现实，各自塑造出争议性社会话题的不同维度。由于搜索引擎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其可调整与可操控性，因此也极易受到政治权威与商业力量等利益团体的影响。用户由于缺乏选择，往往倾向于盲目信任搜索引擎，这一现状值得我们忧虑与警醒。

本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事件样本偏小，收集数据的方式较为单一，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较低。尽管对比结果看似差异明显，但未经统计分析，因此说服力相对有限。面对这一关乎每个网民日常生活的话题，我们期待更具突破性的研究与数据出现。

参考文献

- Jiang, M. (2013). The business and politics of search engin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aidu and Google's search results of Internet events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 doi: 10.1177/1461444813481196

政见 · 内

民族宗教

国家如何影响宗教：以新疆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为例

在长期以来受儒家怀疑主义及共产主义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充满挑战性的话题。

◎ 励轩

作为长期以来受儒家怀疑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充满挑战性的话题。虽然中国自古存在多种宗教，且部分中原王朝一度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但后者往往是可以与统治者所尊奉的儒家怀疑主义并存的佛教、道家。随着公元 13 世纪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兴起，到了明清，中原王朝不得不在自己的辖地面临数量日益庞大的一神教信众。面对

从未出现过的状况，中原王朝时或因处置不当引发大规模的宗教、族群冲突。即使作为中国历史上处理族群问题最为成功的清朝，在其鼎盛的 18 世纪接连发生了西北回族穆斯林与新疆维族穆斯林的大叛乱，来自穆斯林群体的抗争一度持续到 19 世纪末。到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先是 1912 年结束君主制，接着在 1949 年进入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政时期。20 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变化中的伊斯兰教的，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埃德蒙德·维特（Edmund Waite）博士在其论文《国家对伊斯兰教的影响：喀什绿洲的宗教知识与权威》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维特博士首先介绍了 19 世纪以来发生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变化。伴随着印刷、电子媒介及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生，对传统上在宗教学校（Maktab）和宗教学院（Madrasa）以记诵、口传、面授为主的宗教知识传递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促进了倡导更为平等的伊斯兰宗教改革派贾迪德运动（Jadid）的产生。而借助旅行和贸易带来的日渐增长跨国交流，新的宗教改革思想得以从中东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到了 1885 年，一对富有的商人兄弟侯赛因·穆萨巴耶夫（Husayn Musabayov）和巴吾敦·穆萨巴耶夫（Bawudun Musabayov）在新疆阿图什建立了一所受贾迪德教育运动影响的革

新派学校。及至 20 世纪初，大量革新派学校在阿图什、喀什及吐鲁番地区出现。

那时的革新派穆斯林面临着双重挑战。部分反对来自保守派神职人员。更激烈的反对则来自新疆当局。从 1912 年起，相继续治新疆 22 年的军阀杨增新和金树仁，努力把新疆跟外界隔绝。他们实施审查制度，并警惕一切教育革新，以防挑战现状。虽然 1934 年接替金树仁的盛世才在其统治初期实施了宽松政策，允许伊斯兰宗教改革派报纸、杂志和学校的发展。但在 1937 年巩固政权后，他却对改革派知识分子进行严厉镇压，在其统治的十年里，总计约有 10 万人遭到逮捕。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在极度不宽容与有限宽容之间摇摆。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出于平息叛乱和政治团结的需要，伊斯兰教受到了谨慎与宽容的对待。虽然 1950 年伊斯兰宗教法庭遭到废除，然而同年的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保护清真寺所有的土地。1953 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其他几个爱国宗教团体一起成立，以便于管理宗教培训和监督神职人员。这些机构也是党向官方认可神职人员传授马列主义学说的重要工具。

然而，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结束了建国以来的宗教宽容政策。

大量的清真寺被关闭，所属土地被没收，宗教仪式的举行遭禁止，甚至官方主导建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在 1958 年被解散。直到 1962 年大跃进结束，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才稍稍恢复，不过没收的土地却并未还给清真寺。

后大跃进时期稍微放开的宗教政策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终止了。那时候的官方政策是努力以毛泽东思想代替宗教，只有毛泽东本人才可以受到崇拜。除了极少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还允许存在，绝大多数宗教场所都被关闭。狂热的红卫兵将伊斯兰教视为封建余毒和四旧之一。维特博士的访谈对象证实，那时候红卫兵为找宗教书籍而去抄家，然后把找到的古兰经与其他宗教书籍放到艾提尕尔清真寺（喀什最重要的清真寺）前焚毁。

1976 年四人帮倒台以及之后邓小平的上台，给中国伊斯兰教带来了新的春天。从 1979 年开始，整个新疆的清真寺开始得到修复。到了 1984 年，新疆已有 14000 个清真寺开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 1980 年恢复，麦加朝圣活动也再次得到允许。

可是，由于 1990 年巴仁乡暴乱和 1997 年伊利事件，政府加紧了对新疆宗教活动的限制。1990 年起，所有宗教领袖必须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注册，他们必须支持党的领导，反对民族分裂。麦加

朝圣活动也受到了一定限制。从 1996 年开始，在官方话语中，非法宗教活动明显和分裂主义联系起来。同年新疆的“严打”不仅针对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也打击与非法宗教活动有关的分裂主义。

在回顾完近百年的宗教政策后，维特开始探讨这些政策尤其是新中国的伊斯兰教政策变化对喀什农村地区宗教活动的影响，他以喀什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海兹来特 (Hezret) 为例来说明。海兹来特主清真寺的大毛拉叫阿不力买提 (Ablimet)，出生于 1941 年，接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在 1947 年，他进入阿帕克和卓 (Apaq Khoja) 宗教学院学习，到 1954 已学会背诵整部古兰经，并能将它翻译成维吾尔语，他在那里也学习了教法和其他宗教知识。然而宗教学院随着 1958 年大跃进的到来而关闭，从那时起，由于严厉的宗教迫害，阿不力买提放弃了宗教活动，转而从事农业劳动。直到 1980 年起，因为改革开放，他才重操旧业，花了十年时间重新学习古兰经。很多当地年长的神职人员与阿不力买提大毛拉有相似的经历。他们在传统的宗教学院进行两到三年的学习，学习认识阿拉伯字母，学会背诵古兰经甚至只是几个章节。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神职人员被称为卡里 (qari)。

与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卡里不同，一些借助改革开放而

到中东去学习的穆斯林则接受了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尔海米德 (AbdulHemid), 他在海兹来特北部扩建了一个叫土库兹塔什的清真寺。在那里, 他宣扬他所认为的“正统”伊斯兰教, 批评各种地方宗教修习、圣徒崇拜等, 理由是后者在古兰经里没有根据。他鼓励信徒按照沙特罕百里教法学派 (Hanbali) 的要求而非维族流行的哈乃斐教法学派 (Hanafi) 进行祷告。阿卜杜尔海米德清真寺布道的一个特点是鼓励平等主义的伦理, 强调在真主面前, 一切人都是平等, 反对对宗教领袖的过分尊重, 批评喀什地区流行的论资排辈风气。阿卜杜尔海米德教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倡导伊斯兰教与现代科技发展、经济进步相容。因为阿卜杜尔海米德及其信仰者的改革特质, 其他维族穆斯林称呼他们为瓦哈比派 (Wahhabi)。

然而在 1997 年, 阿卜杜尔海米德被官方从土库兹塔什清真寺毛拉位置上解职, 他的学校在此之前被关闭。在喀什, 很多人说, 这次解职是因为他太受欢迎, 他强调宗教知识和维族人发展被认为反动。虽然如此, 阿卜杜尔海米德的教义却仍然在维族年轻人中受到欢迎, 一些缺乏古兰经合法化支持的地方性宗教仪式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争议。然而, 在后 9·11 的背景下, 政府对于传

教活动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对所谓“瓦哈比”穆斯林的压制也在增加。

维特博士最后在论文中总结道，教育体制的世俗化、印刷媒介的普及以及与外界穆斯林的接触已经削弱了喀什地区传统上以口耳相传为传播方式的宗教知识传递模式。不过，这种变化，依旧受到国家宗教政策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 Waite E. (2006).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the Kashgar Oasis. *Central Asian Survey*, 25(3), 251–265.

他们为什么抗拒对中国的认同？

国际因素在国家认同政治的抗争和适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在境外有同族的族群来说，他们应对中央政府国家认同构建政策的政治策略取决于他们自己与境外同族的比较以及是否有来自境外的支持。

◎ 励轩

自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试图利用这一概念来团结中国境内的不同族群，以维系族群多样化国家的统一。然而，这一政策虽然在某些族群中看起来比较成功，可是在另一些族群中却遭到了反抗。为什么北京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在一些族群中较为成功，而

在另一些族群中并不那么成功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系讲师韩恩泽博士在其新出版的著作《抗争与适应：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书中进行了探讨。

韩恩泽博士认为，国际因素在国家认同政治的抗争和适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在境外有同族的族群来说，他们的策略取决于自己与境外同族的比较以及是否有来自境外的支持。如果一个族群认为他们的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并且这一族群还可以得到来自境外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对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采用抗争策略进行应对。如果一个族群认为他们的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但没有获得境外支持，那么族群成员更倾向于移居到境外同族所居住的地方。相反，如果一个族群不认为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但他们获得了境外支持，那么这一族群更倾向于满足国内的文化自治。如果一个族群既不认为境外同族拥有更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会，也没有获得境外支持，那么他们就更倾向于适应新的国家认同，寻求融合甚至同化。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韩恩泽博士依次检视了中国境内以下

五个族群的情况：维吾尔人、朝鲜族、蒙古族、傣族和藏人。韩恩泽博士认为，中国境内维吾尔人对中亚和土耳其的看法导致了他们对北京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土耳其和苏联时代的中亚在各方面条件上要比中国新疆优越，同时维吾尔人也获得了来自苏联、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境外支持。因此，维吾尔人在对待北京的中华民族构建政策时，采用了抗拒策略。

朝鲜族在境外有一个在经济方面非常强劲的境外同族韩国，这吸引了他们中很多人移民韩国或韩国投资集中的中国城市，然而由于他们缺乏境外支持，甚至还会受到来自韩国人的歧视，他们在看待“故国”韩国（包括朝鲜）和“祖国”中国的关系方面显得很矛盾。

内蒙古的蒙古族虽然认为独立的蒙古国在政治和文化自由方面比较优越，但蒙古国并没有给他们展现出强劲和吸引人的经济模式，它也不能给蒙古族提供境外支持。因此，尽管存在一些试图在政治上动员蒙古族的团体，然而蒙古族并不像维吾尔人和藏人那样积极的抗拒中华民族认同。

和蒙古族一样，西双版纳的傣族已经进一步融入中国的主体

政治，他们对自治的诉求仅限于文化方面。邻国缅甸、老挝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更使傣族人意识到作为中国公民的好处，并强化了他们寻求同化的意愿。

西藏的案例则被韩恩泽博士特别提出来用于说明国际援助是如何影响藏人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动员的。他认为国际因素在过去六十多年的藏人抵抗运动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国际援助的存在和缺乏与藏人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韩恩泽博士认为，他的书可以为中国政府提供两方面的启示。

首先，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阻止族群分离主义，那就应该提高中国边疆地区各族群的生活水平——不仅要改善少数族群的经济状况，还要关注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情感，以缩小少数族群和境外同族在各方面的差距。中国政府还应该为少数族群提供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表达的空间，缓解少数族群特别是藏人和维吾尔人在人口失衡和文化同化方面的担忧。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切断特定族群受到的境外支持或者

至少阻止此类问题的国际化。最近的情况表明，中国政府似乎已开始运用一些外交政策来干预一些少数族群受到的境外支持。如果此类政策持续下去，将会限制持异议少数族群的国际空间。在跟国内族群的潜在支持者改善外交关系时，中国政府必须仔细考量自己的利益。也许中国在跟美国和欧盟国家打交道时无法收获更多，因为后者已经出于政治和战略考量有了很大兴趣支持中国境内持异议的少数族群，但中国政府还是可以在与其它国家的外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比如尼泊尔和中亚国家。

与以往境外许多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作品不同，韩恩泽博士并没有将中国境内部分少数族群的不满仅仅归因于中国政府的政策，而是将少数族群对自己在国内处境的判断和来自境外的支持联系起来分析少数族群的抗争和适应，这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此外，韩恩泽博士在书中利用比较方法来检视中国境内五个族群对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的反应，这在以往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学术成果中也较少被使用。然而，尽管韩恩泽博士为完成这本书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田野调查工作，但他如果能够提供更具体的实证案例，比如用具体的访谈记录或问卷调查结果来佐证维吾尔人认为土耳其

和苏维埃中亚比新疆更好，那会使他的论据更有说服力。进一步的，如果韩恩泽博士能够运用除了汉文和英文之外的多语种材料，也将丰富书中的论据。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博士，本文的完成获益于我们对此书的讨论。
感谢原书作者韩恩泽博士对本文相关术语翻译提出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 Han, E. (2013). *Contest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民族政策调整路在何方？

从长远看，中国民族政策必须调整，但面临的困难和复杂还很多，需要一步一步的建立共识。而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不稳定现象高发的态势不可避免，中国政府应对此有预期和准备。

◎ 归宿

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该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既要保持民族的多样性，尊重各民族发展的权利；又要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各民族的融合以及和谐共处。当然，要同时兼顾到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们往往相互冲突。正因为此，民族问题非常复杂，经常成为一些国家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重要变量。

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多民族国家当中相对而言较为成功，各民族间也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民族政策与形势不相适应的一面也显现了出来，并产生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这在一些民族聚居区表现尤为明显。今年9月初，笔者到新疆走访调研，就能感觉到新疆一些地区的民族对立情绪非常突出。

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趋于热烈，各种学术观点纷纷出现。一些主管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讨论，更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政见”团队就以信息图的方式，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关于民族政策的争论（参见《图解中国56个民族^{*}》）。近期，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James Leibold的研究报告《中国的民族政策：改革不可避免？》（*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 Inevitable?*），分类梳理介绍了当前中国国内关于民族政策调整的主要观点，并试图预测未来中国民族政策制定的可能发展方向。

* 励轩，钱争予（2012），〈图解中国56个民族〉。CNPolitics.org/2012/05/56-ethnic-groups

中国当前的民族政策以及负面影响

作者指出，中国现行民族政策根植于苏联。所谓“民族问题”，在苏联人看来就是如何与国家内的少数民族打交道。但中国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中，对苏联的民族政策做了扬弃，并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实践中，中国的民族政策由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优惠政策三大支柱构成。在作者看来，除了在“大跃进”及“文革”等特殊时期，中国的民族政策执行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作者认为，尽管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民族政策上着力甚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负面效应凸显。一方面，国内少数民族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出于种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远远落后于汉族地区。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 50% 的贫困县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另一方面，也更为致命的是，近几年来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3·14”、“7·5”等事件，不仅严重恶化了当地安全稳定形势，损害了民族感情和民族关系，对于民族政策也造成了强烈冲击。

关于民族政策调整方向的争论

当前关于民族政策调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类。

一是马戎的“去政治化”观点。即将“民族”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族群”概念，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把民族问题“政治化”。

另一类观点是胡鞍钢、胡联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即削弱“族群意识”、“民族认同”，加大“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一体化”认同。作者特别指出，虽然中国左右派学者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很大，但是对于民族政策亟待改变这个议题上，两派能形成一定共识。

报告中认为，虽然马戎、胡鞍钢等人的观点影响不小，但在学术圈毕竟还是“少数派”。目前，国内民族学界“守成派”的主流观点还是以“稳”为主，认为解决民族关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好现行的民族政策。2012年上半年，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官方学术机构多次开会，批评“第二代民族政策”，重点突出现行民族政策的重要作用。郝时远是其中的代表，2012年初，他一连发布了四篇文章，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违反宪

法规定的各民族“真正的平等”（参见〈中国民族识别的学术背景争论^{*}〉）。但同时，主流民族学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不少也认为现行民族政策的确有不甚合理，需要改变的部分。

“中国梦”蕴含着民族政策调整？

相对于民族学界的相对保守，一些官员在民族政策调整问题上主动发声。2012年2月，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在《学习时报》上刊文，指出要更加促进民族的交融、融合。他还特别提出，要将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去掉。朱维群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并引起广泛讨论。去年底习近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的“中国梦”思想中，也明确含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今年3月，他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梦是中国13亿人的梦”。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民族政策走向又引来一阵揣测。

作者认为，部分学者和高级官员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政

* 郝时远（2012），〈中国民族识别的学术争论背景〉。CNPPolitics.org/2012/05/identification-of-chinese-nationalities

策确实到了应当调整的地步。但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在短期内废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样的民族政策大调整并不现实。作者同时认为，在习近平时代，民族政策领域一些小的、但却显著的调整会出现。比如将民族一栏从第三代身份证上去掉、加大汉语教学力度、在户口本上更改民族更为容易等。

作者指出，要大幅改革中国民族政策，必然要涉及到修改宪法，这无疑又是对中国宪法权威乃至政权合法性的极大伤害。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看，中国民族政策必须调整，但面临的困难和复杂还很多，需要一步一步的建立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不稳定现象高发的态势不可避免，中国政府应对此有预期和准备。

参考文献

- Leiboid, J. (2013). *Ethnic Policy in China: Is Reform Inevitable?*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家庭教会对中国社会自组织的启示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自组织基础。但家庭教会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能量远大于传统认知。

◎ 张跃然

宗教的社会意义并不局限于提供精神寄托，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源。俄勒冈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Karrie Koesel 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证明，在当代中国，家庭教会系统依然保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其隐秘的运作方式依赖于兼顾灵活性和凝聚力的特殊组织形态。家庭教会的组织经验揭示了中国社会自组织的巨大潜能，为我们重新思考“教会”、“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

这一发现来自于研究者对某一家庭教会系统的案例研究。在2006—2007、2010年，研究者分别对这一教会系统的若干不同层级的领导人进行了访谈。研究者的分析基于这些第一手的访谈资料。

家庭基督教会，是指不隶属于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中国三自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未经官方登记的宗教组织。2010年，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曾连续发表几篇正面报道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文章。文中提到：家庭教会话题已经脱敏，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可以介入的公共话题。用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教授的话说，“政府对于有关家庭教会的讨论与争论，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

Koesel 研究的教会发展蓬勃，保守估计其徒众已经达到一百万人。该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并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不断壮大，核心原因之一是其特殊的内部组织结构。

该组织结构具有两大主要特点。其一是垂直和水平层面的半自主性。垂直地看，整个教会系统被划分为如下层级：总部（全国）、教区（每省一个或几个）、地方教会（每个教区含三到五个）、

家庭教会（宗教仪式活动单位）、细胞小组（徒众的日常活动单位）。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层制组织不同，教会每个层级之间不存在具有很强约束性的命令、监督关系，只有较为松弛的事务协调、信息传递关系。每一层级的组织单位自主安排其负责的宗教活动，并自主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各个组织单位也不掌握其上一层级、下一层级的具体情况。水平地看，同级组织单位之间完全独立而且甚少联络。

其二，基层组织单位能有效凝聚徒众。在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细胞小组中，徒众们定期聚会。这些聚会不仅能交流感情、增强大家精神信仰的强度，而且成为成员们互相排忧解难的平台。这样一来，教会及附着在其上的社会关系，将徒众生活的各个维度包裹起来，大大强化了成员内部的凝聚力。每个细胞小组的规模被严格控制，一旦超过某一上限（一般是30人），便被拆分为两个小组，这一做法不仅保证了小组对成员的凝聚力，而且防止活动规模过大引人注意。

这种结构一方面保证了教会系统的核心领导人物可以一直居于幕后，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当某一层级的某一组织单位遭遇危机（如被取缔），整个系统可以安然无恙。此外，它还保证了整个系统

拥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弹性，可以对外在环境做出灵敏反应（比如不断变更集会地点）。基层组织单位对徒众的有效凝聚，使得教会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并能稳步壮大。

有意思的是，教会的某些领导者承认：教会在创建阶段有意借鉴、模仿了早期共产党的组织模式。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讨论中国社会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缺乏自组织基础。但家庭教会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这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能量远大于传统认知，完全有可能生产出能动的公民社会。另外，在吸取上世纪末某些组织的教训之后，现今的家庭教会尽量避免与政府正面接触，并表现出对政府的拥护态度以换取一定的“政治安全”。这一观察背后隐含的依然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命题。蓬勃发展的自组织社会，既有可能与国家产生冲突，也有可能与国家和谐共存。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取决于多种社会历史条件。

参考文献

- Koesel, K. J. (2013). The Rise of a Chinese House Church: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572–589.

宗教慈善团体低调扩张 将国家权力“化为己用”

利用已得到国家许可的非盈利组织或慈善基金形式，宗教组织通过各种路径低调地扩展着宗教活动的空间与内容；慈善活动由此成为信仰活动的载体，将国家权力“化为己用”形成一种独特的模式。

◎ 刘冉

作为非政府和非盈利社会团体的一种特殊类型，基于信仰的宗教慈善组织近年来在中国悄然兴起；在特殊的政策与社会环境下，它们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层面的障碍，以达到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 Susan K. McCarthy 于 *The China Journal* 发表研究指出：一方面，中国的宗教慈善团体提供的社会服务有利于维护威权统治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其基于信仰的本质也

在挑战着国家权力。利用已经得到国家许可的非盈利组织或慈善基金形式，宗教组织通过各种路径低调地扩张着宗教活动的空间与内容；慈善活动由此成为信仰活动的载体，将国家权力“化为己用”（repurposing），形成一种独特的抵抗模式。

作者首先指出，尽管在过去二十余年里，中国的宗教组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与发展，但其活动仍然受到严密的国家管制。国家试图影响和控制宗教机构中职业人士的培养；法律也禁止除合法注册的宗教团体之外的个人或机构组织任何宗教活动或表达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是，国家掌握着判断和宣布任何行为是否属于宗教的权力。总体来说，国家权力在竭尽所能地限制着宗教表达的空间和形式，以阻止其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与普通宗教组织不同，基于信仰的慈善组织往往注册为非政府、非盈利机构，不具备宗教团体身份，也不一定与宗教场所有直接关联。它们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于公共福利的急迫需求，有利于协助政府管理与解决社会问题；宗教慈善团体的成员也往往自视为爱国公民，并声称其工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宗教慈善团体又如何产生微妙的力量，抗衡国家权力的扩张？作者认为，通过赋予公共服务以宗

教内涵，这些组织以不产生直接冲突的形式加强了宗教凝聚力，拓宽了国家预设的宗教活动范围与宗教社区空间。对宗教慈善组织而言，慈善活动并不是精神信仰的某种外围体现，而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而这些活动恰恰是通过国家许可甚至国家建立的形式开展实施的。

作者认为，这种“化为己用”的策略是一种微妙的抵抗形式。此前，学界往往将“抵抗”视为一种具有连续变化意涵的概念：一头是公开彻底的反体制行动，一头是隐秘低调的“日常抵抗”；若在公开抗议的同时强调对体制的忠诚，并将行为限制在法律框架之内，则是介于中间位置的“合法抵抗”。作者则提出另外一种理解抵抗的二维模型：一个维度是“躲闪—对抗”（evasive-confrontational），衡量抵抗行为与权威直接对抗的程度；另一个维度是“忠诚—反对”（loyal-oppositional），衡量抵抗者对体制的态度。尽管躲闪型抵抗往往较为隐秘，而对抗型抵抗通常较为公开，但作者并未采用“隐秘—公开”的分类方式，这是因为部分躲闪型抵抗尽管采用种种方式掩盖其抵抗的本质，却完全有可能公开进行。事实上，作者认为中国的宗教慈善组织采用的“化为己用”型抵抗正是这种方式。

“化为己用”体现在空间、行为、组织和论述等方面。“空间化

为己用”意味着将世俗空间与地点赋予宗教含义，将其转化为体验和表达信仰的场所。“行为化为己用”则是将日常活动理解成宗教行为。“组织化为己用”指的是将国家许可的组织形式转变为基于信仰的宗教社区。“论述化为己用”则包括重新阐释国家倡导的话语并赋予其宗教价值，同时重新塑造中国社会对于宗教整体以及特定宗教的印象。为达到这一目的，宗教慈善团体往往需要强调其对于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于推动社会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作用。

以中国最早的天主教慈善组织进德基金会为例，其最初的工作范围包括为危难中的个人与家庭提供紧急支援，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灾后支援等；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的进德也提供艾滋病咨询与预防服务，养老、托孤、残疾儿童照管服务以及农村发展项目。此外，进德还为其他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天主教慈善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尽管进德提供的社会服务完全可以由世俗组织来完成，但进德的标志、口号、人员组成、管理模式、空间设计和日常活动却完全遵从天主教传统。自 2005 年以来，进德每年都会举办圣诞慈善晚宴，规模逐渐扩大，到 2011 年已经有超过 500 人参与，其中不乏政府官员和商界名流。

然而，当地政府在大力支持进德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对其宗教内核始终抱有戒心。2008年四川地震发生之后，进德的修女希望同其他NGO一起进入灾区协助救援，却遭到阻挠，被勒令先参加“学习班”才可放行；进入灾区后，她们也被严格置于红十字会的管理之下，不允许有任何传教行为和言论。但作者注意到，进德在灾区拍摄的照片中，修女们都佩戴着代表教徒身份的头巾。事实上，她们在日常工作中并不会如此打扮；在登上前往四川的飞机时，她们穿的都是日常服装。通过服装这一细节，她们在严格的限制之下传达着自己的信仰与身份。此外，在采访中修女们表示，参与救灾工作具有丰富的宗教意涵，令她们“见证到上帝之爱”“仿佛与耶稣同在”。由此，灾区临时医院乃至毁于地震的城镇等场所，也都成为神圣的所在。

进德的另一个目标是弥合中国不同教派以及地下教会和公开教会之间的裂痕，从而扩大中国天主教“想象共同体”的边界。在其网站和出版物上，进德公开强调其慈善活动的宗教基础，以及参与者基于信仰的动机。在捐款页面上，进德列出世界各地捐款者的姓名和机构名称，其中包括教皇本笃十六世的8万美元捐款。中国的天主教徒多年来遭受隔绝与分裂；通过这种形式，他们终于

可以将自己视为全球天主教社区的一部分。

与进德类似的是佛教组织“仁爱基金会”。在提供孤儿抚养、衣物捐赠和“爱心粥”等社会服务的同时，仁爱也致力于传播佛教信仰，并用佛教逻辑来理解社会问题和构建解决策略。为了规避法律与政治风险，仁爱表面上的运作是世俗化的：其总部位于现代化楼宇内，主要工作人员也并非出家人；但是，海淀区龙泉寺的学诚法师为组织提供精神指引和支持，还经常在博客上宣传仁爱的活动。“仁爱”这个名称或许更容易令人联想到儒家教诲，但其标志图案却是毫无疑问的佛教符号——莲花。

“爱心粥”等项目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奉献中强化着信徒的信念；义工们将志愿工作视为修行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简单的鞠躬、合十等动作，向接受者传递着佛教精神。尽管用于“爱心粥”的花销本可以开展其他服务项目，但仁爱的负责人在采访中用“因果报应”的思路作出解释：与其他 NGO 相比，仁爱更注重社会问题的成因而非结果；也就是说，仁爱的最终目的是鼓励佛教理念中的“行善”。

通过进德与仁爱的例子，作者证明了宗教慈善组织正以隐秘的方式将宗教带入大众视野，扩大和重新定义着宗教社区。它们提

倡公民参与、表达爱国热情和服务社会的愿望；与此同时，它们也抵抗着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目前这股力量看似渺小，却完全有可能推动进一步的变化发生。

参考文献

- McCarthy, S. K.(2013). Serving Society, Repurposing the State: Religious Charity and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70, 48–72.

政见 · 内

两岸三地

国民教育在香港：97 前后变化

国民教育的基本目的是通过非强制的方式来塑造对国家的认同感，它在香港的起伏折射出陆港关系在回归前后的微妙变化。作者认为香港市民并不反对国民教育。相反，多数市民认为有必要加深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但是他们反对不加反思地接受经过筛选的教育讯息。

◎ 杨鸣宇

2012 年，香港曾经历声浩大的“反国民教育运动”，最终香港政府搁置推行计划。其实，国民教育在香港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随之出现：既然国民教育已经存在了超过半个世纪，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至于引发今天的反对浪潮？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学系学者 Tracy Lau 尝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她认为，国民教育的基本目的是通过非强制的方式塑造对国家的认同感。而这个过程在香港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97前”和“97后”。

在 1997 年前，提供国民教育的通常是所谓的亲中中学（又称“左派中学”）。1970 年，这类学校只有 44 所，占总学生数目的比例仅为 3.1%。不过，相对低廉的学费使亲中中学在香港还未推行强制义务教育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当时中国大陆需要通过香港来接收外汇和其他资源，因此北京对于这些亲中力量的指示是：在维持香港现存制度秩序不变的情况下开展爱国教育活动。

但是，在 1967 年发生的“六七暴动”后，亲中力量和港英政府，以至香港社会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由于亲中力量过分使用暴力手段来发动阶级斗争，使得香港市民转而更多的支持港英政府，同时使港英政府有理由对亲中力量进行整治，亲中中学的数量由此大为减少。随着香港于 1977 年开始推行强制义务教育，亲中中学的吸引力不再。直至 1991 年，只剩下一家职业教育学校和五间中学合乎港英政府的资助标准。

1997 年香港回归后，亲中国民教育逐渐成为香港教育里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还是社会团体均投入更多的资

源到和国民教育相关的事务之中，例如资助到中国大陆进行游学、参观和访问，推广学习普通话，并在课堂教育中加入阅读《人民日报》等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刊物等。当然，更为直接的措施是在正式的课程系统里强制加入“德育及国民教育科”。2011年香港教育局推出了国民教育的咨询文件，建议于2012年在中小学开展强制的德育和国民教育科。由于被指责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进行撰择性编纂，这份文件随后受到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反对和批评，最终逼使香港政府放弃所谓的三年过渡期（即所有中小学必须于三年内在政府的指导下开展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在香港的起伏可以折射出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关系在回归前后的微妙变化。作者认为香港市民并不反对国民教育。相反，多数市民认为有必要加深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但是他们反对不加反思地接受经过筛选的教育内容。因此，如果香港政府期望通过强制的国民的教育来塑造国家认同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未来仍然充满着未知数。

参考文献

- Lau, T. (2013). State 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o-Beijing School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Asian Survey*, 53(4), 728–753.

经济稳定增长，香港人为什么不满意？

今天香港面对的管治危机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一方面，贫富差距引发社会日益不满，而基本生活物质的满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促使更多的社会群体更积极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议题的类型越发多元。另一方面，企业家群体的中介作用减弱，降低了政府回应社会要求的能力和效率。

◎ 杨鸣宇

近年来，香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磨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发生了诸如皇后码头、菜园村高铁争议、反国教运动和最近的香港电视免费牌照等一系列事件。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和决定屡屡引起社会的不满，不过，单纯从统计数字来看，香港的整体经济自回归后事实上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社会不满？香港城市大学学者方志

恒最近在学术期刊 *Asian Survey* 上撰文，认为关键原因在于：港英政府时期建立并有效运作的政商联盟（state-business alliance）在回归后的作用大不如前。

港英政府时期，主要权力都集中在港督手上，普通市民没有选举长官的权利。换言之，政府和市民之间并没有制度上的联系。因此，港英政府要对社会实现有效管治，必须借助一些中间媒介来完成。这个中间媒介就是企业家群体（business sector）。这些企业家不单对香港的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亦是社会上的意见领袖。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居中调停，政府可以获得社会的反馈；另一方面，借助企业家的社会声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矛盾往往能够得以平息。

九七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事实上延续了和港英政府相同的管治策略。然而，企业家的社会中介作用却在不断减弱，作者认为原因有三点：

其一，新进入政府管治联盟的企业家缺乏足够的社会威望，并且和新生的公民社会和团体之间缺乏联系。

其二，一系列社会事件（例如数码港、西九龙艺术区等）使社会日益怀疑政府和企业家之间存在利益输送，造成社会对这个群

体广泛的负面印象。

其三，香港的结构性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而企业家群体提倡的“政府积极不干预市场”主义并不能回应社会的要求。

因此，简单而言，今天香港面对的管治危机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一方面，贫富差距引发社会日益不满，而基本生活物质的满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促使更多的社会群体（由传统的社会精英如律师、医生转向普通市民）更积极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议题的类型越发多元，除了传统的房屋、医疗和社会保险政策，亦包括环保、文化、保育和城市规划等新型议题。另一方面，企业家群体的中介作用减弱，降低了政府回应社会要求的能力和效率。

参考文献

- Fong, B. C. H. (2013).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Governing Coalition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Asian Survey*, 53(5), 854–882.

台湾民众：政党不可信任但不可或缺

台湾民众对政党存有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一方面又不信任政党，一方面肯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政党短期内的表现会影响政治信任，却未必影响民众对政党必要性的认知。

◎ 马军

台湾爆发九月政争以来，执政者马英九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与此同时，不止一份民调显示，出于对国民党内斗文化的厌恶以及对民进党涉及司法案件的不满，台湾民众对国、民两党的满意度和支持率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

在诸多对九月政争的评论声中，质疑台湾民主制度的声音特别引人注意。在至少六成民众具有鲜明的政党认同的背景之下，

政党形象的下降会不会影响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评价？台湾淡江大学公共行政系林聪吉副教授通过电访的方式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文献回顾中，林聪吉发现，民众对政党的不信任并非台湾特有的状况。包括美国国父华盛顿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政党是一种难以驱离的恶魔幽灵，随时随地戕害国家与大众的利益。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党又不可或缺，现今世界几乎没有办法在民主国家中找到不需要政党却可以运作良好的例子。现代民主甚至只是正当竞争所产生的副产品。

1980年台湾中期民主化工程启动以来，台湾民众目睹了竞争性政党体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然而，民众对政党的施政满意度皆不高，作为政党政治的主战场，立法院更是常备大众诟病。近半数的民众认为国民党与民进党同样具有贪腐的形象。但是，尽管社会大众对政党的表现不满，但是在历次选举中，由政党提名的候选人仍是台湾选民主要的投票对象，绝大多数不具有政党背景的独立候选人仍旧难以在选举竞争中崭露头角。

为测量民众对政党的态度，林聪吉在研究中选取了政党必要性和政党信任两个指标进行衡量。通过电访的方式成功随机访问了1208个样本，得出以下结论——

在政党必要性方面，有 36.4% 的民众认为政党存在拥有必要性，有不到 20% 的民众表示政党存在没有必要性，态度模糊着有 36.5%。林聪吉认为，多数民众对于政党在台湾政治的必要性，抱有肯定的态度。对此，林聪吉的解释是，在多数民众心中，民进党与台湾过去 20 多年的民主化进展有密切联系，而国民党在民主化过程中，同时扮演者被改革者与改革者的角色，同样对台湾民主化的推动具有正面影响。

在政党信任方面，有超过 45% 的民众表示不信任政党，非常不信任的比例由 19%，远超对政党非常信任的 3%。林聪吉通过检视近十年的研究认为，台湾民众对于正当的不信任，一直保持在 70% 左右，是台湾民众近年来一项稳定而持续的政治态度。

关于台湾为何出现多数民众普遍不信任政党，却肯定政党在民主政治的必要性的情况，林聪吉做了更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以下发现——在政党能够协助民众了解政治事务的问题上，45% 左右的台湾民众给出了正面的评价，给出负面评价的民众同样占 45% 左右。而在政党是否能够选拔政治人才的问题上，六成的民众不认为透过政党才能找到好的政治人才，仅有三成多民众同意这样的说法。

然而，对于政党组织政府的功能和政党在立法院制定法律的角色，多数的民众都表示赞成：近六成民众赞成政府必须由执政党来组织和运作才有能力，认为立法院必须有政党参与才能制定好的法律的民众也超过五成。

由此，林聪吉得出结论：台湾民众对政党存有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一方面肯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不信任政党。政党短期内的表现会影响政治信任，却未必影响民众对政党必要性的认知。这一研究结果与之前许多文献指出的结论一致：民主国家的民意普遍对民主制度抱持高度肯定，但对政府的信任却往往偏低。

参考文献

- 林聪吉（2013）. 欲迎还拒：台湾民众对政党必要性与政党信任的态度分析.
台湾政治学刊, 17 (1), 185—226.

台湾父母如何影响孩子的政党偏好

家庭因素是影响一个人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形成的重要部分，父母的政治态度很容易影响到子女的政治态度。台湾一项研究发现，家庭因素比学校、同学以及媒体对大学生政党偏好的影响力更大。而在家庭内部，母亲对子女政党偏好的影响力又要大于父亲。

◎ 马军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的政党政治并没有形成如欧洲般的“左右分野”的局面，而是形成了以统独选择为区隔的“蓝绿分野”。而年轻人的政治态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台湾社会整体统独光谱的变化。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同学团体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都会对其政治态度和政

党偏好产生影响。其中，家庭不但决定了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经济地位，更是一个人在成人之前生活最长的处所，所以对个人政治态度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家庭中，对子女政治态度影响最大的非父母莫属，但是在父亲与母亲影响力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前人学者看法不一。持父亲对子女政治态度影响较大意见者，认为父亲在家中的“政治性”表现要多于母亲，子女会认为父亲更对政治感兴趣，进而更多的受其影响。然而认为母亲对子女的政治态度影响更多者则称，女性在政治议题上的态度会更多的影响子女，而且母亲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较多，对其教养更加关心，所以子女更容易受到母亲影响。

为了研究这一有趣的课题，国立台北大学公行系助理教授刘嘉薇与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黄纪通过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一批大一新生所做的四年追踪研究，归纳出了台湾家庭中父母政党偏好对子女的影响。

研究中，刘、黄二人通过随机筛选的方式选择政治大学 761 位学生，对其进行父母政党偏好、家庭地位、性别、省籍等信息的询问和登记，其中政党偏好分为泛蓝、中立与泛绿。最终研究结果

表明——

首先，父母政党偏好相同时，对子女政党偏好的影响最大，即父蓝母蓝时，子女偏好泛蓝的可能性最大。同样，父绿母绿时，子女为绿营支持者的概率最大。

再者，当父母两人一方有政党偏好，一方政治中立时，子女多倾向于具有政党偏好的一方。即父蓝母中或父中母蓝时，子女对支持泛蓝；父中母绿或父绿母中时，子女多支持泛绿。

对于以上两个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具有政党倾向的父母是子女最大的政治信息来源，且由于父母与子女所处的社会位置几乎相同，所以适合政治价值的世代传递。

最后，研究还发现，当父母政党偏好不同，即父蓝母绿，或父绿母蓝时，子女的政党偏好往往更接近于母亲的偏好。这与前人给出的“母亲花在子女身上的时间较多，对其教养更关心、互动更多”理论一致。

对此，研究者认为，虽然台湾从政者的性别中男性大于女性许多，但是家庭所从事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却以女性为主力军，女性的政治价值更容易在非政治兴致中的家庭养育中传递。此外，研

究还发现，虽然大学生逐渐脱离了家庭生活，但是学校、同学和媒体对其政党偏好的影响力仍然不如父母，可见自由家庭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即便到了大学时期依然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 刘嘉薇, 黄纪 (2012). 父母政党偏好组合对大学生政党偏好之影响. 台湾民主季刊, 9 (3), 37—84.

政见·外

政见·外

经济

“中国制造”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

“中国制造”在美国所导致的大量失业主要发生在制造业。但较为出乎意料的是，它对工资的拉低却主要发生在非制造业。

◎ 王绍达

1991 至 2007 年间，美国年均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增长了 1156%，远远超过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增速。1991 年，美国进口的所有制造业商品中，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商品只占 2.9%，这一数字在 2000 年达到了 5.9%，在 2007 年更是攀升到了 11.7%——据估计，这样的迅猛增长中，来自中国的贡献约占 91.5%。

随着“中国制造”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之

相关的媒体报道、政策讨论也日趋火热。林林总总的观点和意见之中,一种老生常谈是:“中国制造”冲击美国劳动力市场,导致制造业工人失业或者工资降低。David Autor 等三名经济学家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最新论文试图严格地检验这一说法。

这篇文章基于一个关键的论点:简单地检验“美国劳动力市场”与“进口中国商品”之间的相关性,很难得出真正的因果推断,主要原因在于遗漏了“美国市场的需求”这一变量的影响——“美国市场的需求”可能会同时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换言之,即便中国商品进口增多和美国失业率降低同时出现,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认为是中国商品的进口促进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因为有可能是在那段时期内美国的国内总需求增长同时导致国内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对进口商品需求的增加。

所以,为了实现因果推断,作者采取了“工具变量”的识别方法。主要的思路是:将“对中国商品进口的增加”分离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美国市场的需求变化”所导致,另一部分则是由“中国市场的供给变化”所导致。其中,“中国市场的供给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国内的制度改革和技术升级,而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没有直接关系,它唯一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途径就是使中国出口

更多商品到美国。因此,如果能够检验它与“美国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就更有可能得到一个因果关系。

经过实证数据分析,作者发现:“中国制造”增加了美国的失业、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并拉低了工资。作者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可以解释美国制造业就业数下降的25%,进而导致失业、残疾、退休及保健补助显著增加。

如预期的那样,“中国制造”所导致的大量失业主要发生在制造业。较为出乎意料的是,它对工资的拉低却主要发生在非制造业。作者对此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由于“中国制造”导致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能够继续留在岗位的工人平均而言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这会导致对制造业工资变化的估计产生偏误。其次,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制造”的激烈竞争,美国的制造业被迫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制造业的高工资水平。为了确保结果的严谨性,作者还指出了本文实证方法所面临的三个挑战(发达国家之间需求变化的相关性、美国供给变化的影响、发达国家技术升级的影响),并分别予以回应。

综合来看,这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了更加适当而严谨的计量方法,得出了稳健而可信的实证结果。相信更多类

似这样文章的出现，将有助于把旷日持久的有关“中美贸易”的论战提升到更为科学和有价值的层面上来进行。

参考文献

- Davi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美国“页岩气革命”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其实是由一小群追逐经济利益的冒险家发起的，但在中国，由于整个石油化工能源行业被几家国有企业巨头牢牢掌握，影响页岩气开采和利用的因素更多。起码目前从短期看，页岩气还不是这几家企业优先关注对象。

◎ 归宿

世界各国对页岩气的开采和使用已经愈发广泛，页岩气对世界能源市场格局的影响也更为明显。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对页岩气发现、研究、勘探和开发的国家，近几年来更实现了页岩气的大规模商业开采。受此影响，2009年，美国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有可能在2020年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出产国。

“页岩气革命”对中国的冲击已经显现：由于美国对国际能源的依存度降低，今年9月，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购石油消费国。

近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Erica Downs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前沿”(Up Front)专栏中撰文指出，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不断深入，未来中国受到的影响仍将延续加大。

作者指出，未来“页岩气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中国可能借鉴美国经验，加大对页岩气的开发利用。中国也有着可观的页岩气资源。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资料显示，中国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居世界第一；可开采的页岩油储量在俄罗斯和美国之后，居于世界第三。调查也发现，中国的页岩气和美国一样，多储存在海相页岩层(marine shale)中，相对而言更容易被开采。但作者也指出，中国开发页岩气，可能将面临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阻碍：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其实是由一小群追逐经济利益的冒险家发起的，但在中国，由于整个石油化工能源行业被几家国有企业巨头牢牢掌握，影响页岩气开采和利用的因素更多。起码目

前从短期看，页岩气还不是这几家企业的优先关注对象。

其次，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收购优质上游资产可能获得更多便利。由于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太晚，石油行业勘探和生产等优质上游资产早已被瓜分，后来者再想进入非常困难。但如今，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高度繁荣，急需大量资金，这为中国石化企业在美投资创造了机会。同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要石油公司在海外出售资产投资美国的页岩能源开发，在海外新的并购行动也相应减少，这都有助于中国石化企业在海外强势扩张。在今年10月巴西最大海上油田项目利布拉油田开采权的拍卖中，胜出的联营企业成员中就包括中石油和中海油。

第三，中国石化企业与伊朗的合作可能受到限制。这对于美国来说，倒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地缘政治红利。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外国控制美国企业的并购计划都要通过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审查并购计划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中国企业之前有与伊朗合作的记录，通过审查的难度也会相应加大。因此，如果中国石化企业想要搭上“页岩气革命”的顺风车，扩大在美投资，可能必须要重

新审视与伊朗的生意。

第四，中国可以在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谈判中占据上风。俄罗斯无疑是“页岩气革命”的最大“受害者”。由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原先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市场——欧洲有了新的、更为可靠的选择。因此，对于天然气需求日益旺盛的中国，越来越成为未来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保障。这也将使中国在与俄罗斯旷日持久的兴建跨国天然气管道的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第五，中国的中东政策可能更为积极主动。随着美国对外能源依存度的降低，中东地区对美战略重要性可能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中国取代美国从中东进口大量石油，中东地区的稳定和主要航道的畅通对于中国战略重要性将大大上升。目前，中国的学术和政策研究人士已经在思考，中国和其他亚洲石油买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保证中东的石油源源不断的流向亚洲。作者在文中暗示，随着这一趋势的继续，未来中国的中东政策也有可能更为积极主动。

参考文献

- Downs, E. S. (2013). Implications of the U.S. Shale Energy Revolution for China. Retrieved from Up Front, Brookings: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11/07-shale-energy-revolution-china-downs>

中国商人与加纳员工：劳资关系缘何紧张？

加纳员工时常埋怨得不到工资以外的福利报酬，因而感到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加纳本土商人通常愿意炫富、展现权力、行事高调，而中国雇主低调的处事风格则让加纳雇员难以理解。

◎ 周航

2013年6月，124名中国公民在加纳政府采取的严打非法采矿行动中被扣押。这次事件也使得曾被称为“黄金海岸”的加纳一时成为国人最为关注的非洲国家。然而，采矿淘金远远不是中国人在加纳故事的全部。来自德国全球和地区研究所（GIGA）的研究员 Karsten Giese 和 Alena Thiel 将目光投向在加纳从事批发生意的中国商人，并在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期刊上撰文讨论中国

商人与加纳本地员工之间的劳资关系。

据不同研究的统计,目前在加纳大约有2000至10000名中国商人,其中许多从中国进口商品,在当地从事批发业务。大部分中国人通过民间贷款或按揭获得成立批发公司所需的前期资金。按照加纳法律规定,外资公司至少需要雇佣10名当地员工。然而,许多中国商人为了减少开支,都没有遵守这项规定。作者在加纳探访的中国批发公司中,没有一家雇佣超过3名当地员工。这些员工大多为年龄介于20至30岁之间的男性,一般只接受过中等教育或其他与批发行业无关的职业教育。而在加纳的城市地区,他们也恰好属于失业率最高的群体。尽管中国公司的工资一般都高于加纳的平均水平,许多当地人仍然埋怨报酬不公,指责中国商人是剥削者。因此,中国雇主聘用当地人通常都经熟悉的邻居和顾客介绍,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在加纳,良好的教育并不能保证求职者找到合适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动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属关系。雇主通常更加愿意聘用亲属介绍的本族人。在这样特殊的劳动关系中,雇员获得的报酬不仅仅包括固定的工资,还有各种形式的补贴,如交通、食宿和医疗。雇主也经常为忠诚的员工离职创业时提供起动资金。员

工遇到经济困难时，也会向雇主寻求建议或额外的经济支持。所有的这些工资以外的福利表明，在加纳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文化中，雇主被视为是值得尊敬的长者、员工的保护人和援助人。

在进入中国商店工作之初，许多加纳员工都以为中国商人也会扮演和加纳雇主相同的角色，但后来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加纳员工时常埋怨得不到工资以外的福利报酬，因而感到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加纳本土商人通常愿意炫富、展现权力、行事高调，而中国雇主低调的处事风格则让加纳雇员难以理解，甚至中国雇主对穿着的不讲究在本地员工看来也不是因为节俭而是缺乏品味的表现。以上因素都导致加纳员工对中国雇主缺乏尊敬。而中国商人则不了解为何本地员工经常索取各种额外的“奖励”，认为除非在工作上有突出表现，否则他们根本不应该张口询问。此外，由于本地员工的工作大多只是体力活，中国商人也不会对他们的付出额外看重。两位作者发现，加纳员工由于没有得到他们期望的福利报酬和足够的尊重，便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有碍于语言不通和文化上的不习惯，很少有加纳员工会直接与中国雇主探讨如何改善他们的劳资关系，更多会消极怠工以示不满，也有一些人会直接顺走商店的物品。

作者认为，中国雇主与加纳员工之间难以达成和维持“心理契约”是造成双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心理契约”是员工与企业之间的隐形契约，指的是企业清楚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发展愿望，并尽量满足；而员工也尽职尽责，因为他们相信企业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作者探访的中国批发公司中，雇主和雇员都未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和愿望。出现这种双方都认为遭受到对方不公对待或指责的情况，根本原因是雇主和当地雇员对彼此在生意或生活上脆弱一面的不了解。中国雇主没有意识到为他们打工的这些加纳男性年轻人大多属于当地经济生活中的最弱势群体，竞争力和承受力均十分低下。因此，固定工资以外的“奖励”对他们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并且按照当地习惯，这也是雇主理应提供的。而加纳员工也没有理解中国雇主的难处。加纳较为恶劣的营商环境，中国同行的激烈竞争，偿还贷款的重压，再加上远离家人，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雇主的经商之路尤其坎坷，也会对当地员工的忠诚度怀有更高的期待。

参考文献

- Giese, K., & Thiel, A. (2012). The vulnerable other — distorted equity in Chinese-Ghanaian employment rel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20. doi:10.1080/01419870.2012.681676

援助换资源？

以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为例

中国尝试向资源供应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以获得更多和更稳定的资源供应？通过分析中国向南太平洋岛国提供的发展援助，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 周航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对外援助资金增长迅速，援助方式也日趋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在海外积极运筹资源外交，以保证国内经济持续增长所需。国外逐渐有学者和媒体将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尝试向资源供应国提供更多发展援助，以获得更多和更稳定的资源供应。

来自澳洲罗伊国际问题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的研究员 Dr. Philippa Brant 以中国向南太平洋岛国提供的发展援助为例, 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作者看来, 要想研究中国对外援助, 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尽管中国政府于 2011 年发布了首份对外援助白皮书, 详细的对外援助数据仍难以获得, 透明度不高。二是目前国外研究大多采纳经合组织对“海外发展援助”给出的定义来计算一国对外援助的总额, 但是中国政府对援助的定义与经合组织给出的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经合组织将奖学金与减免债务视为发展援助的一部分, 并将军事援助排除在外。中国政府的计算方式则正好相反。

在经贸和援助方面, 中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加大投入, 一方面使得该地区的传统大国澳洲和新西兰感到忧虑, 另一方面也让其它西方传统的援助国对该地区的兴趣大增。总体上, 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金额大致与日本、新西兰和欧盟相当, 与澳洲仍相差距大。大概 58% 的中国援助流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在 2006 年斐济政变后, 西方主要援助国已暂停大量对斐济政府的援助, 并对中国维持对当地临时政府的援助颇有微词。

通过与政府官员的访谈，作者发现中国的“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原则是其在南太平洋地区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西方批评中国外援不够透明尽管有其合理性，但也低估了受援国自行评估中国援助利弊的能力。

分析了中国在各岛国的援助项目之后，文章并未发现中国的援助与其在当地的资源投资项目有明显的联系。中国的赠款项目主要涉及农业、医疗、军事、海岸保护等。其优惠贷款项目也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部分受访官员反映中国的优惠贷款款项规定不清（如偿还期限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贷款可被豁免为赠款），也难以核实援助项目的具体花费。此外，中国在各岛国的援助项目通常由中国公司从国内招募工人负责承建。尤其是在巴布内亚新几内亚，中国工人的涌入在当地百姓中造成的异议颇多。

文章最后以中国在斐济和巴布内亚新几内亚的资源投资项目为案例，进一步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其在当地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的确有利用其对外援助来促进中国企业商业利益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援助减少当地百姓对商业投资项目

的负面观感，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资源换援助”（resources-for-aid）的模式。

参考文献

- Brant, P. (2013). Chinese Aid in the South Pacific: Linked to Resources? *Asian Studies Review*, 37(2), 158–177.

用定量方法探索中非资源贸易的后果

中国与非洲的资源贸易对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第一篇用较为严格的定量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采用了比较新颖的实证设计，得出了有些出人意表的结论。

◎ 王绍达

中非关系，尤其是非洲对中国的资源出口，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西方主流媒体和民间舆论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与非洲的资源贸易对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Meyersson 等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挑战了上述“常识”。他们在研究中指出，与中国的资源贸易为非洲国家带来了额外的经济

收益。同时，他们发现，虽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确对一些非洲国家的人权状况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是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美国等其它一些与非洲发生贸易的国家，且这种破坏作用不分轩轾。

那么，如何证明中非贸易实质上导致了这两方面的后果？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问题。例如，即使各国经济发展和对中贸易存在正相关性，也并不一定说明对中贸易导致了经济发展，而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越愿意与中国开展贸易。同理，如果一国的人权状况随着对中贸易的上扬而走下坡路，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对中贸易导致了这种恶化，而可能是由于某国越发独裁暴力的政府愈发倾向于和中国开展贸易。

为了在因果推断的层面排除上述干扰，研究者采用了工具变量的识别方法。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对非洲某国所拥有的特定资源的需求情况”和“该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在逻辑上并无关系，但却与该国和中国的资源贸易总量紧密相关。如果统计分析显示中国的资源需求实际上和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人权状况高度相关，那么基本可以认定，经济发展、人权状况实际上是该国与中国资源贸易导致的结果。

通过这样的方法，研究者发现，平均而言，对中国的出口每增

加 1% 会导致非洲国家当年的 GDP 增长率上升 0.2%、之后三年的 GDP 增长率上升 0.7%。作者检验了美非、印非贸易是否同样有此作用，结果发现，美国、印度的对非资源贸易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小于中非贸易。由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介入对于非洲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而这样的贡献常常被以往的媒体报道所低估甚至忽略。

政治层面上，研究者发现，如果非洲国家出口更多自然资源到中国，该国人权状况的确出现一定的下滑。然而，他们同时指出，如果对美国进行类似的检验就会发现，美非贸易也会导致类似的人权滑坡，且美国的负面作用并不显著低于中国。作者认为，产生这一效果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不过这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资源贸易对非洲政治环境有何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与其贸易的是不是西方民主制国家。

作为第一篇用较为严格的定量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本文采用了比较新颖的实证设计，得出了有些出人意表的结论，具有较大的价值。不过，工具变量方法原则上只是对因果关系的“逼近”，而非百分之百的证明，且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合适与否还存在争议，因此文章的结论还难以称得上是“一锤定音”。这也要求

未来的研究者要使用更加微观、详实的数据和更加令人信服的识别策略，来对本文的结论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 Meyersson E., Padró i Miquel, G., & Qian 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in Africa*. Retrieved from The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优势独特，但水平依然偏低

中国的对外合作项目多数由中国政府主导，因而所面临的审查较少，手续办理更便捷。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海外经济合作几乎不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因而也更受发展中国家欢迎。

◎ 陈磊

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持续吸引外资并为我所用。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日本专修大学教授大桥英夫在最新发表的个人研究成果中，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进行了梳理。

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外，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有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海外承包工程项目，中国的建筑业者在很多年前就开始

在海外承包了大量的工程项目，这些工程项目的业务来源主要包括参与外国工程招标、中国政府对外援建、中外跨国企业合作建设等几方面，从结果来看也实现了合作双方的互惠互利。

第二种重要方式是派遣工人去国外提供劳务服务。近年来，中国的大型人力公司每年都会组织大规模的劳工赴海外淘金。据中国官方最新统计，目前至少有 600 万以上的中国人通过合法途径赴海外工作，且人数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迹象。

而第三种主要形式——对外设计和咨询业务（overseas design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s）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据了解，提供对外设计和咨询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司比较擅长的建筑、矿产开发等行业，主要包括为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地质资源勘探、建筑设计咨询、后备人才培养等内容。

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有哪些优势？作者介绍说，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动向保持着高度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上升而带来的合作规模扩大，还在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发达国家采取的模式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主要采取官方开发援助（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模式开展对外经济合作，这种模式一般对于援助资金的监管比较严格，审批

耗时漫长需经历太层层手续。中国的对外合作项目多数由中国政府主导，因而所面临的审查较少，手续办理更便捷，随之而来的高效率也能最大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海外经济合作几乎不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因而也更受发展中国家欢迎。

虽然中国有着独特的优势开展海外经济合作，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就对外经济合作中涉及的人员结构而言，中国派出的海外劳工大多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中暂时处于失业的人员。而发达国家需要更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一定技术的劳动者。换言之，中国的海外劳工群体从长期来说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人才标准，这会对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对外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依然规模较小、层次偏低。而且，围绕着海外的部分业务，一些中国公司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更有甚者采取恶意杀价、抹黑等非法行为。同时，中国对外经济合作集中于工程建筑、矿产及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即使在这些领域，也还面临着西方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

除此之外，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地域还主要局限在亚非拉等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营业务也主要局限在产业链中低端、低附加值的行业，对于欧美市场的开拓和提升产品附加值方面还有很多功课需要补足。

因此，作者总结道，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应该以提高涉外经济活动人才的综合素质为基础，进而尝试开拓合作的新地区、新领域。

参考文献

- 大橋英夫（2013）. 中国の非援助型対外経済協力——「対外経済合作」を中心に.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中国日益依赖世界的稳定和西方的繁荣

中国一方面极大地从全球化中获益，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在深度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一国都变得更加“脆弱”。

◎ 王韬

邓小平领导的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提升了全球影响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使得中国更加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压力和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依赖于稳定的世界秩序和西方世界的繁荣。

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兰德公司的施道安（Andrew Scobell）发表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合

作的文章《作为安全战略的全球化：“中国模式”的权力和脆弱性》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两位研究者认为，中国领导人拥抱全球化的过程并非心甘情愿、一蹴而就，而是在两难的处境下不断妥协的结果。为融入世界，中国不得不改变自己。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必须打开国门，不断加深开放程度，改革国内经济管理制度和机构，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同时接受来自外国机构的监督检查。以加入WTO为例，入世谈判十多年，期间伴随着降低关税壁垒、取消出口补贴、撤并政府部门、知识产权立法等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外部力量成为国内改革的重要助推力，但这一过程对中国而言也堪称“痛苦”。

对外开放使中国的自主性不断削弱。经济方面，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外汇储备，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戚戚相关。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尤为深刻：大量留学生在美国等国接受教育，带着迥异于传统的价值观回国，其中不少人还在各行业成为决策者。与此同时，中国公众被置于西方政治思想观念的冲击之下，信息渠道日益畅通，这些变化都会动摇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权威。此外，基督

教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面对如此种种的安全挑战，中国的执政者是如何应对的呢？

事实上，走向世界的中国却没有完全西化，而是走上了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兼具国家主导和市场经济特点的“中国模式”。加入WTO后，经济增长并未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市场机制的引入也未弱化国有经济的力量。与之相反，国有资本仍然掌控关键经济部门，大型央企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政府对资本帐户、汇率保持严格管制。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似乎在对外开放和保证国家安全两个目标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在文章看来，中国政府在应对外来安全挑战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对内，执政者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社会矛盾；对外，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以加强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巩固权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拥有日益显著的议价能力，西方世界的政治敌意得以削弱，其他国家联盟孤立或制裁中国基本不再可能。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让中国与周边的国家、地区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在非洲地区，中国享有越来越多的战略

利益。与此同时，中国不再满足于作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开始寻求国际秩序制定中更大的话语权。

此外，文章特别关注了中国政府的“软实力”提升战略。中国的执政者很早就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将“文化强国”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包括“中国文化年”在内的各种文化展览在各国举办，孔子学院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遍布世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被用来传递中国爱好和平的外交理念；中国官方媒体不惜投入重金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大学与国外大学寻求教育合作。这些措施体现出中国政府提升软实力的雄心。

总而言之，文章认为，中国一方面极大地从全球化中获益，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在深度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一国都变得更加“脆弱”。全文对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影响所作的全局性分析的确不乏洞见。

参考文献

- Nathan, A. J., & Scobell, A. (2013). Globalization as a Security Strategy: Power and Vulnerability in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8, 427–454. doi: 10.1002/polq.12076

政见·外

政治

中美对朝政策可能走向一致？

很多人以为朝鲜体制独特，加之最高领导人“喜怒无常”，其政策很难让人捉摸。但事实上，朝鲜的行为完全可以预测：朝鲜反复挑衅国际社会缓和朝鲜局势的努力，并在核武器问题上毫不妥协。朝鲜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利益。

◎ 归宿

2013年9月26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纽约举行早餐会。在朝鲜问题上，双方都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中美也同意密切协作，让无核化成为朝鲜的唯一选择。中美双方还特别提出，要打破朝鲜长期以来违背承诺的恶性循环，成为此次声明的一大亮点。联想到之前的9月23日，中国商务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公告，高调宣布禁止向

朝鲜出口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作相关的两项技术，中国对朝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引发广泛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朝政策也成为美国相关智库和专家的关注重点。兰德公司（Rand Corp.）在其报告《预防朝鲜崩溃》（*Prepar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North Korean Collapse*）中提出，美国应提前与中国沟通协调，防止朝鲜政权突然崩溃对地区形势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院葛莱仪（Bonnie S. Glaser）在“中美聚焦”（China US Focus）上发表名为〈朝鲜问题上的新型大国关系〉（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on North Korea）的文章，指出北京和华盛顿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扩大，缺少有效协作，若两国不能在朝鲜问题上开展合作，将给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带来消极影响。

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访问学者博大安（Antoine Bondaz）则在名为《中国对朝政策新方向》（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的报告中指出，朝鲜屡次做出鲁莽行为，危及中国核心利益，适当改变对朝政策对中国以及地区稳定都有利。

朝鲜正在挑战中国的耐心

文章认为，很多人以为朝鲜体制独特，加之最高领导人“喜怒无常”，其政策很难让人捉摸。但事实上，朝鲜的行为完全可以预测：朝鲜反复挑衅国际社会缓和朝鲜局势的努力，并在核武器问题上毫不妥协。

朝鲜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利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朝鲜的行为，特别是年初的导弹试射及核试验，显然与中国的目标背道而驰，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联盟更加稳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受损，甚至由于朝鲜执意拥核，东北亚地区的核武器态势也可能发生变化。

中国今年以来已用一系列表态和具体行动表达对朝鲜的不满情绪。今年4月，外交部长王毅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说，中国政府反对“任何一方在这一地区的挑衅言行”，并表示中国的领导人“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博鳌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朝鲜的不点名警告。中国也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谴责朝鲜，甚至还暂

停了同朝鲜外贸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

朝鲜意识到自己“行为出格”，派出包括二号人物崔龙海在内的高官前往北京，表态愿意修补中朝关系，双方似乎达成了谅解。但是要看到，由于朝鲜不愿意在拥核问题上妥协，未来朝鲜的“挑衅”依然不可避免，中国应该对朝鲜的这些“橄榄枝”保持警惕。

中国对朝鲜“办法有限”

文章提出，从目前情况看，在应对朝鲜的问题上，中国有如下六个政策选择：

维持现状。延续中国 2006 年以后的对朝政策，既谴责朝鲜的核计划，又支持朝鲜政权，因为中国担心批评朝鲜政权会导致其倒台，但现在这种政策可能已经不再符合现实和中国利益，事实已经证明朝鲜政权并不会放弃核武器。

再平衡。重新评估与朝鲜的关系，在战略上更靠近韩国，同时减少对朝鲜的支持。但由于美韩的盟友关系和中韩之间的不信任，及开展与朝鲜的贸易有助于中国吉林、辽宁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推行此政策亦困难重重。

放弃朝鲜。停止对朝鲜的能源、资金和食品援助。这似乎是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最不可能的一个选项。中国不仅会失去朝鲜这个缓冲区，朝鲜政权崩溃出现后的混乱局面是中美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

推动改革。中国一直都在鼓励朝鲜进行经济改革。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向朝鲜官员说明改革开放的好处，并积极帮助朝鲜建立经济特区。朝鲜也多次表示要进行经济改革，但看起来似乎都是从口头上敷衍中国。朝鲜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其政策必须具有延续性，这也意味着金正恩无法提出背离其祖训的“改革政策”。

干涉内政。这一政策的可能性也很低，直接干预朝鲜内政与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外交原则相违背。朝鲜对于外部的干涉和介入也非常反感和戒备。看上去，中国是朝鲜的靠山，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朝关系也在降温。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上述五个政策，或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那么剩下的选项只有一个：合作管控。即与朝鲜问题相关利益方，特别是美国开展合作，共同管控矛盾和冲突。朝鲜核问题近些年米始终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方始终未能在如何对付朝鲜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朝鲜缺乏明显的国际压力，继续我

行我素。如果中美采取共同的对朝战略，朝鲜就失去了渔利的空间，对其毫无疑问是最大噩梦。朝鲜急着与中国缓和关系，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局面出现。

前景总体乐观

文章认为，合作管控朝鲜符合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利益，也可能成为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中美两国，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应形成共同的“底线”：不承认朝鲜的核地位，朝鲜不增加核武器，不进行核试验，不进行核扩散。

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会面时，已经就地区稳定和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共识，这其实就是很好的开端。中美这种合作会向朝鲜发出明确的信号：中国不会再容忍对其国家利益的挑衅行为。

参考文献

- Bondaz, A. (2013). *A New Direction for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Retrieved fro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www.carnegiesinghua.org/2013/08/27/new-direction-for-china-s-north-korea-policy/gkhw>

中美冲突的风险超过冷战时期的美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金骏远认为，由于中美两国较为模糊的战略“底线”及沟通不畅的现状，两国爆发冲突、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超过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

◎ 宿亮

“中国威胁论”一直存在于当今西方社会。进攻现实主义理论的提出者米尔斯海默不久前还在清华大学坚称：不相信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这种论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学者认定中美冲突不可调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

今年在多个期刊和讲座中提出，由于中美两国较为模糊的战略“底线”及沟通不畅的现状，两国爆发冲突、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超过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

冷战结束后，中美经历多次危机时刻，包括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台海局势紧张、1999 年“炸馆”事件和 2001 年撞机事件。不过，金骏远认为，“那都不叫事”，真正的危机是指涉及关键性利益的对抗，并有冲突升级到战争的可能。

在金骏远看来，中美两国对相互关系中的“底牌”定义模糊。

在西太平洋地区，很难说什么是两国的关键性利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即“一个中国”原则，但近些年，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释放信息：中国不会允许他国侵犯在东海、南海的主权权益。而美国在这方面含糊其辞。

美方和与在这些地区挑战中国主权的菲律宾、日本缔结有条约，与越南关系不断改善，而且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也包含军事内容。但对于现实中的争端，美国持观望态度，并且一直回避是否会坚持给予台湾军事保护伞的问题。另外，中美之间就经济专属区范围上的不同观点也仅停留在“存异”阶段。

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是导致中美卷入激烈冲突的“红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双方会不计后果对抗？这一点并不明确。

金骏远认为，中美不是敌人，这点毫无疑问。但中美又不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如果中美“零和博弈”，爆发战争可能性比当时的美苏大得多。因为美苏经过多次冲突，已经互相探知底线，存在避免冲突升级至不可收拾的机制。中美之间显然没有这种机制。

中美更像“盲人拉锯”，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使多大的劲，也不知道如何回应，极有可能“擦枪走火”。这种局面与冷战早期的美苏关系相似，但如今环境导致中美之间不能像美苏那样在多次危机中慢慢“磨合”。

与美苏对峙不同，中美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对比并不均衡。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上远超中国。也就是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握有优势的美国可能会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而中方对这种可能十分清楚，也有可能在害怕这种情况出现的前提下“先发制人”。任何一方误判都会导致武装冲突，甚至核战争。

中国对核武器持“不首先使用”原则。苏联当时所持的观点则是只要冲突升级，会使用一切手段。也正是苏联这种想法，实际上

导致冲突不会升级。中方因为相信美国不会动用核武器，所以不会考虑动用核武器可能，也就是说不考虑冲突真正升级后的预案。在实际冲突升级中，中国很可能在慌乱中打响第一枪。

金骏远认为，由于当代武器精确程度很高，先动手一方有优势。常规军事力量落后的中国很可能迫于压力先发制人。

导致中美对“底线”含糊不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沟通渠道不畅。

1998年，中美之间建立了热线。但1999年、2001年双方面临危机时，热线并没有发挥作用。金骏远推测，美方无法通过热线联系中国领导人的原因是中方政策协调领域缺乏类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不能迅速做出政策判断，所以才会拖延两国高层对话。

现阶段，中美两国沟通往往是公开声明或在实际行动中释放的某些信号。

公开声明需要考虑的因素过多，很多时候不能代表真实想法；而在行动中释放信号往往存在信息不充分或误判的危险。这些问题导致两国无法坦诚的讨论敏感的政治议题，无法实现信息对称。

金骏远认为，尽管中美在几年内发生冲突可能性不大，但那些导致冲突升级的风险依然存在。两国应该趁现在增加政治和军事交流，特别是两国军队之间的熟悉会在危机时刻在控制冲突领域发挥较大作用。

参考文献

- Goldstein, A. (2013). First Things First: 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4), 49–89.
- Goldstein, A. (2013). China's Real and Present Danger: Now Is the Time for Washington to Worry. *Foreign Affairs*.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9651/avery-goldstein/chinas-real-and-present-danger>

中国、美国、缅甸：合作式的三国演义？

随着缅甸步入政治改革的轨道，美国的对缅政策也经历了从孤立到和解的转折。美国与缅甸的亲密接触是否有遏制中国的引申含义？石眼山（David I. Steinberg）认为，中美对缅甸政策的变与不变，无法用“遏制”和“反遏制”的言论简单概括，而且三方还有可观的合作空间。

◎ 刘岩川

随着缅甸步入政治改革的轨道，美国的对缅政策也经历了从孤立到和解的转折。曾与缅甸紧密合作的中国，对美国的转变抱着谨慎的态度。美国与缅甸的亲密接触是否意在遏制中国？外界猜测颇多。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石眼山（David I. Steinberg）认为，中美对缅甸政策的变与不变，无法用“遏制”和“反遏制”的言论简单概括，而且三方还有可观的合作空间。

根据石眼山的判断，中国对缅政策所遵循的原则直截了当而且始终如一：保持边疆的和平稳定，避免大批难民流入中国，为中国贸易和投资（尤其是云南）提供市场，在国际社会表态时不妨碍中国利益，为中美提供地理上的缓冲空间。如此五项原则广泛适用于中国所有的邻国。

如果说中缅关系有任何特色，那便是双边的能源交易和缅甸给中国提供的海上交通便利。由于中国无力控制马六甲海峡这一能源进口的咽喉要道，与缅甸进行能源陆路交易便减轻了中国的后顾之忧。其次，缅甸的港口还为中国船只提供了直接驶出印度洋的机会。

尽管缅甸对中国的意义看似价值连城，石眼山却找不到证据表明美国走近缅甸是在迂回包抄中国。在他看来，奥巴马政府仅仅需要在东亚收获一场外交胜利，完善克林顿与布什的未尽事宜，并拉近与东盟的关系。此外，与美国言归于好也是缅甸社会发出的信号。不过，石眼山也没有找到证据表明美国在缅甸的利益不存在中国因素。

如果中美在缅甸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冲突关系，那么合作的空间是否存在？石眼山认为中国、美国和缅甸在打击贩毒、边境医

疗、灾害救援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大有可为。一个允许多元文化和和平共处的缅甸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而目前的改革也会增加缅甸的社会稳定性，进而使中国从邻国的改革中获取红利。

虽然合作的空间看似广阔，但石眼山认为缅甸自身的态度至关重要。曾经长期被外来影响束缚手脚的缅甸人，主体意识尤其强烈。在1895年之前，缅甸还是清帝国朝贡体制的一员。今天，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在缅甸经商，时而引起排华的情绪。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也曾“偏袒”缅甸国内某些武装群体和异见人士，给缅甸人造成“心怀不轨”的印象。因此，如果要促成有效率的三方合作，缅甸应占据合伙人主体的位置。

参考文献

- Steinberg, D. I. (2013). *Myanmar-China-US: the potential for triangular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myanmar-china-us-the-potential-triangular-cooperation>

同床异梦：探究中亚地区中俄抗争

中亚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存于中国，而中亚国家的能源也更多地销往中国。中国从经济和能源上都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了中亚国家的首要依存对象，引起了俄罗斯的恐慌，两国的利益出现分歧。中国通过对于中亚国家的经济影响，进一步在他们的国家决策过程中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 袁幼林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的邻国，对于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后果表示了更多的担忧。学界和国际社会关于南海问题、东北亚朝鲜半岛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大多已经有了详尽的阐述，政见团队也多次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介绍。相对而言，中亚地区作为中俄两大强国的角力场，则较少被涉及。

韩国汉阳大学能源及安全中心主任 Younkyoo Kim 教授以及美国陆军学院俄罗斯国家安全研究教授 Stephen Blank 在《当代中国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中联合撰文分析了从 1992 年以来中俄在中亚地区角力的各个阶段。文章着重指出：2009 年以来，中国将中亚国家对其的高经济依存度 (economic dependency) 转化成为政治上的优势。

两位作者将 1992 年以来的中亚地区中俄关系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92 年到 2000 年，在美国宣布在中亚和里海地区有特殊国家利益，以及日趋严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大背景下，中俄的利益趋于统一。第二阶段，从 2001 年到 2004 年，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以及俄罗斯天然气战略的开展，两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开始出现了冲突。第三阶段，从 2005 年到 2008 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开始决裂，中俄关系开始回暖，解决了长达 40 年之久的领土争议问题。最后一阶段，从 2009 年至今，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引起了俄罗斯的恐慌，两国的利益再一次出现分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位作者认为，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分分合合主要归结于两个原因：西方势力和经济能源相关问题。自从

美国渐渐淡出中亚地区后，经济问题及其引发的政治问题，就成为了中俄的首要分歧点。

作者着力分析了中亚国家能源以及经济的转变，从 90 年代至今，中亚国家的经济越来越依存于中国，而中亚国家的能源也更多地销往中国。中亚国家全部是内陆国家，传统的运输和通信线路都是通过俄罗斯进行，因此俄罗斯对于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而与中国的联系越发紧密则让中亚国家寻找到了另外的一条路。同时，中国也非常希望获得中亚国家的能源，以减轻自己对于海路运来的石油的依存度。这则与俄罗斯把自己打造成为中亚地区能源的垄断控制者的目标相冲突。

经济方面，1996 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中亚双赢关系的开始：在 2009 年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第一次超过了俄罗斯，中国占到了吉尔吉斯斯坦 34% 的贸易总额以及哈萨克斯坦 15% 的贸易总额。能源方面，以土库曼斯坦为例，近年来建成的中土天然气管道让中国一跃成为了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能源进口国，而输送给俄罗斯的天然气则从原先的 800 亿立方米降到了 300 亿立方米。中国从经济和能源上都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了中亚国家的首要依存对象。

作者通过重新修订边界这样的事例来阐述中国怎样将经济优势转换成为政治影响力。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以妥协的心态与中亚数国确定了边界，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在边境上的动作也开始多了起来。2009 年年末，中国向哈萨克斯坦租借了 1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用以种植棉花。2010 年，塔吉克斯坦将帕米尔高原地区的 1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中国。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Sharipov 表示：“如果那时我们不决定让出土地的话，我们肯定不能阻挡中国的巨大压力。”

作者总结认为，中国通过对于中亚国家的经济影响，进一步在他们的国家决策过程中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都有所警惕，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法。

参考文献

- Kim, Y., & Blank, S. (2013),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Sin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3), 773–790.

欧盟“北极政策”：拉俄联中？

2013年，欧盟与中国同时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那么欧盟在北极地区的战略是什么？中欧之间是否有合作可能呢？学者提出，欧盟应采取“拉俄联中”，采取利益交换，“合纵连横”参与北极治理。

◎ 宿亮

“政见”团队曾两次刊文介绍中国的北极政策和战略（〈中国“北极梦”路指何方？^{*}〉〈中国北极战略：参与者？改革者？^{**}〉）。2013年，欧盟与中国同时成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那么欧盟在

* 宿亮（2012），〈中国“北极梦”路指何方？〉。 CNPolitics.org/2012/12/china-strategy-arctic-pole

** 宿亮（2013），〈中国北极战略：参与者？改革者？〉。 CNPolitics.org/2013/08/china-north-pole-strategy

北极地区的战略是什么？中欧之间是否有合作的可能？

法国国防部北极战略事务机构学者、海洋法专家于连·达梅斯（Julien Daemers）撰文指出，欧盟与中国一样，在北极地区拥有潜在利益。就具体政策而言，欧盟试图加大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同时联合中国，增强北极地区航线的开放程度和自然资源的国家联合勘探。

何为“北极地区”？北极圈是人为划定的，以此圈定政治和经济概念并不合理。达梅斯提出，北极周边月均气温最高不超过10摄氏度的地区就可算北极地区。

谈及北极，需首先了解几点。第一，北极出现传统安全冲突可能性不大，周边国家合作较为成熟；第二，全球变暖将在几十年后改变北极地区生活习惯和经济活动；第三，北极航线虽然距离短，但涉及航行补给、沿线保障设施、保险及破冰等额外费用，商业上是否可行存在疑问；最后，北极海洋面积大，受联合国海洋法约束，再加上地区机制，国际合作态势较为复杂。

欧盟成员国意见不一

欧盟方面2009年颁布北极政策(EUAP)，并申请成为北极理事

会永久观察员,但由于和加拿大等国渔业争端,最终被驳回。2012年,新版北极政策提出运用欧盟太空政策技术优势,强化与北极国家合作。

欧盟部分成员国属北极地区国家,它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如丹麦一直与加拿大、挪威、俄罗斯、美国联合讨论北极事务,不希望欧盟插手降低本国的重要性;而瑞典、芬兰等国因为被丹麦排除在外,则希望推动欧盟介入这一政策领域。较大成员国中,只有英法德表达对北极的关注,中东欧国家则漠不关心。

应注意的是,欧盟参与北极事务和成员国参与北极事务概念不同——欧盟掌握成员国贸易立法等权限,加入北极事务涉及与相关国家的贸易联系。另外,联盟加入北极,也意味着成员国更多“主权让渡”,涉及丹麦等国切身利益。

与俄罗斯进行“政策交易”

达梅斯认为,在内外复杂形势下,欧盟在北极发挥作用,需处理好两个关系。其一是与北极地区大国俄罗斯的关系;其二是与北极潜在重要参与者中国的关系。

现阶段,俄罗斯认定北极航线途径俄罗斯领海,而不是领海延

伸出的专属经济区，也就是说，外国商船不能自由穿行。俄方要求船只提前四个月向俄罗斯运输部门申请，并强制要求船只租用破冰船，而全球绝大多数破冰船都来自俄罗斯，价格大约每天 1.4 万美元。这使得北极航线费用大增。

在石油开发领域，俄罗斯政策开放程度更低，占股份比例超过 5% 的外国投资商都要直接申请获得克里姆林宫批准。巴伦支海油气田虽然有法国和挪威的能源公司参与，但控股权牢牢掌握在俄方手中。

达梅斯分析，欧盟与俄罗斯进行“政策交易”不鲜见。欧盟曾以批准加入 WTO 谈判为代价换取俄罗斯减少对欧洲航空运营商收取的额外税负。在北极问题上，欧盟较为成熟的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可以成为重要筹码，在北冰洋航行定位、紧急救援中发挥作用。另外，欧洲企业独有的远洋勘探能力也可以为俄罗斯提供急需的技术支持。

中欧合作的可能性与分歧

欧盟与中国在北极议题上的合作不多，但双方享有不少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开放北极航线和科研领域，中欧立场一致。

就北极航线而言，中欧都存在潜在经济利益。国际贸易中 90% 通过海运，欧盟拥有 41% 的商船，而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先前明确表态，希望国际航运组织在北极航线的运营中发挥作用，北极航线应成为国际航线，而不是领海航线，这点与欧洲、美国的态度一致。

就科研而言，中国的极地科研能力已经位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是为数不多地自己拥有破冰船的国家，而且 2014 年还有一艘新的破冰船即将下水。而欧洲也已持续 10 年参与北极科研。是对于欧洲和中国而言，参与北极科研都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参与北极治理、增加发言权的方式。

就能源而言，由于国内煤炭比例远高于天然气，中国短期在北极地区没有太多利益需求，但中国企业也已经加大投资，谋取长线利益。

中欧在北极事务上观点一致，欧盟认为北极发生的事情必将影响世界，而中国认定北极是全人类的北极，体现双方都希望参与北极治理的愿望。但中欧之间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直接对话。一些欧盟官员透露，中国官员曾经询问相关信息，但没有回应欧方信息交换的要求。

不过，中欧依旧存在分歧。首先，中方要求在海洋法的框架下讨论北极治理问题，但欧盟要求建立新的治理框架。即便建立新机制，欧方内部博弈也难以满足中国企业涉足北极自然资源勘探领域的要求。其次，欧盟由于渔业政策等问题，与北极地区国家存在较大分歧，特别是加拿大，而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一直在改善，在多方博弈中不一定会站在欧盟一边。

达梅斯认为，“拉俄联中”是基于欧盟利益和政策手段分析后的最佳策略，也是欧盟作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国际行为体参与北极的可能途径。

国际谈判是利益交易，在北极问题上的“合纵连横”考验外交技巧。因纽特人有句谚语：“直到冰碎那刻才知道哪些敌人是朋友。”欧盟谈判策略秉承经典国际关系传统，其理念和策略值得注意。

参考文献

- Daemers, J. (2012).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Arctic: A Pole Position?* Bruges Regional Integration & Global Governance. http://www.cris.unu.edu/fileadmin/workingpapers/BRIGG_papers/BRIGG_2012_-_4.pdf

政见·外

他山之石

正规军和游击队： 民间反腐网站在中国和印度的迥异命运

民间反腐网站的失败告诉我们，新媒体的“革命性潜力”不应该被高估。新媒体可能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壁垒，但一个孱弱的公民社会，在新媒体的环境里，依然会弱不禁风。

◎ 邵立

印度的民间反腐网站“我贿赂了”(IPAB, I-Paid-A-Bribe) 成立于 2008 年，用以搜集网民为了办事对政府公务员进行贿赂的汇报。直到 2012 年 5 月，已经搜集了超过一万七千份行贿报告。到 2013 年 1 月，超过 160 万人访问了这个网站。IPAB 在印度的影响力引起其他国家争相模仿。中国的此类网站也在 2011 年的夏天出现并迅速发展，但它们大都很短命，不久就都消失在网民的视野

里（参看《南方周末》的报道：〈尴尬的“我行贿了”，艰难的民间反腐^{*}〉）。

为什么民间反腐网在印度可以坚持下来，而在中国却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有学者认为，中国民间反腐网站的短命是由于言论环境的限制，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真正公开民主的言论生态系统。但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在即将出版的《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期刊上反驳了这个观点。她认为不能用统一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政府对待民间反腐网站的态度。她引用了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讲话，论证中央政府还是肯定了反腐网站的监督作用。但地方政府由于直接受到监督，自然感觉到反腐网站的威胁。因为政府内部的态度本身矛盾不一，言论管控并不见得是中国民间反腐网站的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洪把视角放到中印反腐网站组织上的差异。她认为，中印反腐网站在几个方面存在不同：

第一，印度的 IPAB 网站是由专业的非营利组织“贾纳格拉哈”

* 鞠靖等（2011），〈尴尬的“我行贿了”，艰难的民间反腐〉。[infzm.com/
content/60721](http://infzm.com/content/60721)

公民民主中心 (Janaagraha Centre) 建立的。这个中心的目标是集中公民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贾纳格拉哈中心的运作相当专业，两位创始人均拥有美国的研究生学历。一位是耶鲁大学的 MBA，另一位也曾活跃在美国著名的国际交流组织亚洲会社 (Asia Society)，被评选为“年轻亚洲领导者”。它有两个明确的任务：第一是推动政府管理程序的改革，即研究公共服务中腐败频出的制度设置，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例如他们曾向交通部门提交了将近四十页的研究报告。第二，他们致力于对公民进行法治教育，培育公民合法权利意识，并告诉他们如何避免或者抵抗行贿。IPAB 网站的建立，不是为了惩处某个受贿官员，而是为了反映出腐败产生的系统性问题，从而改善政府治理。洪评论到，这个网站的存续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印度允许这样的民间组织存在，也是因为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与此相反，中国政府不允许非政府组织拥有自主权去监督政府，也不允许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介入行政改革的研究进程。中国民间反腐网站并没有一个强大而专业的组织作为依靠，因此大部分都是个人自己管理。很多网站管理者因为政治风险都选择了隐藏身份。他们建立网站的初衷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有的甚至是为了赚钱。

第二，洪源远通过分析网站上行贿报告的内容发现，中国网站的目标比印度网站狭隘得多，仅仅将反腐视为惩罚“坏官”，甚至夹杂了泄愤和个人报复的内容。因为缺乏有效的管理，中国网站的目标和愿景都不清晰，尽管他们在“山寨”印度的 IPAB 网站，但既没有继承 IPAB 改革制度的志向，也没有达成公共教育的意愿。作者评论道，这种对惩罚坏官的沉迷实际反映了中国更宏观的政治环境：中国政府正是喜欢通过周期性的运动去清洗贪官，而有意识地避开对腐败产生制度性原因的讨论。

第三，由于印度 IPAB 网站有明确的目标，他们给网民设置了严格的报告模版。他们严格区分了信息公开的范围。例如，所在城市，日期，贿赂的金额和贿赂过程是可以公开的，但因为这个网站不针对个人，涉及到个人的名字等信息就会被软件自动过滤。他们还聘请了网站管理员去删除故意的诋毁诽谤信息。而在中国网站，行贿报告并没有固定的模版，网站管理员没有计划去搜集贿赂信息来调查腐败的规律，而仅仅提供一个平台给网民讲故事。结果，网站的报告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夸张和挑衅性的语言被大量使用。另外，由于缺乏严格的版规，这些网站并不能保护个人隐私，被举报人的手机号和名字经常被曝光在网上。

第四,印度的IPAB有专业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他们接受个人和机构捐款,资助机构包括慈善基金,联合国发展计划,还有像戴尔和谷歌这样的企业。他们的年度财政预算都公布在网上给公众和捐款者查询。而中国的网站则大都是网站管理员自己掏腰包。由于预算吃紧,中国的民间反腐网站还提供“增值服务”:网民可以承担网站管理者的食宿差旅费,让他们去所在地进行调查,并对官员的所作所为进行“爆料”,提高公众的关注度。更坏的是,有的网站管理者还接受“有偿删帖”,接受被举报人的贿赂删除举报信息。

作者认为,印度的IPAB网站在一个专业组织管理之下,像一支正规军,而中国的民间反腐网站则像缺乏组织和目标的游击队。她认为,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限制,让民众得不到专业的自我组织,缺乏“自我治理”(self-govern)的培育。互联网貌似降低了民众参与的门槛,却由于匿名制度,降低了人们履行公共责任的信念,恶化了公民社会的建设。网民反腐的逻辑,反映出执政党的“运动式反腐”的“坏官”思维和话语。相应地,作者认为要谨慎对待“网络反腐”的乐观情绪。首先,这种举报方式可能成功打击了几个不走运的贪官,但不能提出防止官员“前腐后继”的制度方

案。其次，由于官员的职权范围模糊不清，他们很有可能被“错打”，这会导致地方官员在施政时畏手畏脚，反而损害了地方治理。

作者最后总结道，新媒体的“革命性潜力”不应该被高估。新媒体可能降低了政治参与的壁垒，但一个孱弱的公民社会，在新媒体的环境里，依然会弱不禁风。

参考文献

- Ang, Y. Y. (2013). Authoritarian Restraints on Online Activism Revisited: Why “I-Paid-A-Bribe” Worked in India but Failed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Retrieved from: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2244661>

政见·访谈

马修·斯巴克：世界从来不是平的

在历史上，全球化的主要赢家其实就是少数几个国家而已，长远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双赢”。在国与国之间，有输赢之分，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会有着不同的境遇。

◎ 柏蔚林 / 特约观察员

马修·斯巴克 (Matthew Sparke*) 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地理与国际研究教授，长期从事全球化研究，并于 2013 年出版了《全球化：协作、冲突与不均衡整合》一书，全面阐述了他对全球化及很多相关问题的见解。对于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他也给予了格

* Matthew Sparke: <http://faculty.washington.edu/sparke/>

外的关注。我在不久前对斯巴克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其间论及了如何理解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意义。以下是斯巴克教授主要观点的汇总：

为什么要关注全球化？

一个很直接的答案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比如我面前的这台计算机，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各种零部件，比如 CPU，各种芯片等等，来源于世界各地，并在中国完成最后的装配，然后才来到美国市场。在我的本科学生里，这几年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很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而我本人，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出生在英国，在牛津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后来去了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教育，现在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有很久的时间，比如英帝国扩张的历史，就曾经是全球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没有谁可以逃避，因此研究和认识全球化以及它如何改变了世界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的结果并不是单一普适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现在要讨论全球化，就必然谈及中国，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和地位无可替代。而要研究中国，同样不可避免要研究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对于全球化的解读，政治地理的角度有什么独特之处？

现在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很多，主要有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等。而政治地理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全球化。

从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化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模式，即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取得相应的位置。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极力推销他的全球化理念，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势所趋，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参加进来，而且全世界最终都要加入进来，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各种隔阂都已经不再重要。

但是从政治地理的基本角度观察，世界从来也不可能会是平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充满了千差万别，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世界通用的模式，来让所有的人都能接

受并受益。政治地理不仅仅看到了全球化中合作的一面，同时更强调全球范围内冲突与不均衡发展的另一面。要知道，在历史上，全球化的主要赢家其实就是少数几个国家而已，长远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双赢”。在国与国之间，有输赢之分，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会有着不同的境遇。现在一个基本事实是，世界上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很多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很厉害，比如中国，在一方面经济增长举世瞩目，而在另一方面，仍然有着数量巨大的贫困人口。

全球化是怎样的一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现在很多人以为全球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在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今天，对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也仅仅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全球范围之内的合作与联系并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完全对等的。也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和利益集团在全球化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主导了话语权，而其他一些后来加入的国家也就只能服从已经制定好的规则，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会员身份就很不容易，附加了非常多的条件。其结果

也就很清楚，全球化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赢家。全球化一个标志性的产物就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流动性，跨越了国界，自由进出主权国家。而与此同时，资本收益的大部分却是仅仅流向了少数的地区。

事实上，市场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也不可能实现自发的均衡，全球化本身就是一套人为的规则，高度政治化，体现了占主导优势地位者的意志。市场化的倡导者一直鼓吹完全自由的市场和减少政府干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撒切尔到里根，还有中国的邓小平，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借助政府之手强力推行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能说“世界是平的”吗？显然不能。

为什么中国需要重新理解全球化？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使得很多人认为这都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因而我注意到现在很多中国人对全球化的理解基本上就是要积极参与，却忽视了全球化本身是基于一套利益规则的，也没有注意到全球化中有失败者。所以听到弗里德曼的书《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很流行，我一点也不奇怪，完全可以理解。

现在中国和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也需要听到外部的声音，所以我希望我的看法可以对中国有所帮助。我认为中国不必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宏观的经济指标上，而是要对全球化做更深入全面的观察和思考，进而采取合适的政策措施。在我的新书《全球化：协作、冲突与不均衡整合》中，我的基本态度就是采取了辩证的立场，强调了基于政治地理的协作与冲突，以及不均衡整合作为目前全球化的结果，不是像弗里德曼那样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极端的立场。看起来中国目前对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产生的影响的了解还不是很全面，因而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要更积极地参与，并希望借此机会，就像以前东亚其他国家一样，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而我认为中国需要明白，世界不是平的，没那么简单，弗里德曼的逻辑可能会误导，否则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就会感到不知所措。现在西方世界对于当前的全球化也已经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明白了全球化在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中国应该注意到这些经验和教训。

简评

斯巴克对于弗里德曼的批评，实际上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诠释

了全球化的实质特征：即一方面“中心”与“边缘”必然同时存在，另一方面“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关系也是永恒的，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进程就是“中心”与“边缘”关系互相转换的过程。弗里德曼幻想了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而现实却远非如此。中国主流意识对于全球化的理解过于浪漫化和理想化，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思考的时刻。

相关链接

- 斯巴克在 Coursera 开设的课程：Globalization and You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globalization>

政见·美国政治学年会专题

什么样的帖子更容易被删除？

去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用采集到的数据说明了中国网络的特点：不管帖子的政治倾向如何，可能诱发集体行动的内容，而并非单纯批评政府的言论，才更有可能被关注和删除。今年，该团队用参与性实验和深入访谈更有利地证明了这一点。

◎ 刘冉

恐怕许多人都有莫名其妙被“小秘书”删帖的经历，在郁闷之余，你是否想过，小秘书的行为是否有什么规律性？最容易被“和谐”的是什么内容？最近，哈佛大学的 Gary King, Jennifer Pan 和 Margaret E. Roberts 在美国政治学协会年会上发表的论文，通过参与性实验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得出结论：单纯批评政府并不一定会被删帖，涉及鼓励或有可能诱发集体行动的内容则更有可能被删

除。同时，他们指出，社交网站与网络媒体在删帖方面其实有比较灵活的弹性空间。

此前，这个研究团队在今年5月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论文，通过跟踪分析近1400个中国社交媒体和论坛中的1100万个帖子，指出删帖的目的并不是阻止民众批评政府，而是为了遏制可能发生的集体行动。与过去一些研究的观点不同，Gary King团队认为，中央政府并没有在积极遏制批评信息的传播，甚至有可能利用社交媒体中的批评信息来整顿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只有当集体行动的隐患出现时，相关网络信息才真正被视为危险。

在这篇新的论文中，研究者指出，过去的研究大多通过观察、收集和分析已有数据得出结论，其主要问题在于无法得知未经发出就被和谐的内容。因此，本文采用了参与性实验的方法，随机选取网站并由研究者根据当前社会话题贴出敏感程度不同的内容，观察其在网站上发出、存留和扩散的情况。同时，为了直接了解网站的删帖机制，研究者建立了一家社交媒体网站，该网站并不对公众开放，但研究者与中国较大的一家论坛管理平台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以顾客的身份向他们询问如何管理网站。

研究团队发现，删帖机制十分复杂，可谓多管齐下，例如：1. 基于内容的：关键词过滤、通过插件屏蔽敏感词等；2. 基于用户的：通过用户的 IP 地址、登录时间、过去发帖内容等删帖；3. 基于时段的：在某些时段内，所有发帖内容都会经过审查，或直接禁止发帖。此外，网站功能允许“小秘书”根据发帖时间、用户名、关键词、IP 地址和帖子长度等批量删帖。论坛管理平台向研究者建议，每达到五万名用户，应雇佣 2-3 名“小秘书”。研究者据此估算，中国网络公司雇佣的“小秘书”人数大约在五万到七万五千人之间。

在随后进行的实验中，研究者选取了 100 家社交媒体网站，其中包括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以及 97 家全国或地方性博客类网站；他们在每家网站上创建了两个帐号，并于 2013 年 4 月 18—28 日、6 月 24—29 日和 6 月 30 日—7 月 4 日进行了三轮实验。每轮实验开始时，他们会在新闻中选取当时热门的集体行动事件和非集体行动事件。其中，“集体行动事件”定义为三种类型：1) 涉及网下抗议或集会；2) 与曾经组织或引发过集体行动的个人相关；3) 与曾引发集体行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关。“非集体行动事件”则同样牵涉社会与政治热点，关乎中国政府或官员的行为，但与集体行动无关。

随后，研究者聘用写手针对各个事件分别撰写支持和批评政府的言论，并非常注意不在已有的话语中增添任何新的概念。于是，根据支持还是批评政府、是否有关集体行动这样两条标准，言论可以分为四类。随后，每个帐号各针对两起事件发言，组合方式是：“支持政府的集体行动事件”加“反对政府的非集体行动事件”，或“反对政府的集体行动事件”加“支持政府的非集体行动事件”。

将三轮实验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研究者发现，与非集体行动事件相比，集体行动事件更容易被删除；而在不涉及集体行动时，反对政府的言论并不比支持政府的言论更容易遭到删除。

研究者还发现，100家社交网站采用的删帖机制与技术各不相同；这可能说明政府有意鼓励网络公司在技术方面的创新。同时，各家网站在判断标准方面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对于政府何时会采取干预手段也没有明确的概念。若根据网站归属方身份分为政府网站、私企网站和国有企业网站，则政府网站的预审几率更高，而私企网站有更高几率会先发后审。有趣的是，政府网站对于支持政府的文章也比私企网站发布得慢，这是因为关键词机制往往误伤支持文章——例如，支持文章中若出现“反腐败”一词，就可能被当作“腐败”这一关键词被搜索到。

此外，研究者还特别选择了三个格外敏感但并不涉及集体行动的事件，用以探测集体行动理论的边界；其中第一起事件仅涉及线上集体行动，第二起涉及香港的集体行动，第三起则涉及腐败和具体政治人物。结果发现，这三起事件都没有遭到更多删帖；这有力地证明，相比起批评政府，集体行动才是决定网络信息是否被删帖的最终标准。

参考文献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2013). A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Study of Censorship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中国走入非洲的两种模式

学者比较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安哥拉、尼日利亚介入当地电信产业的不同方式，认定中国通过创建“多赢”模式，推动产业发展，并分析在非洲政治经济博弈中取得先手的“玄机”。

◎宿亮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国家援建多个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在电信领域，中国企业已经逐渐崛起为非洲电信领域的竞争参与者。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介入非洲目的是获取能源，这种说法是否靠谱？中国“走进非洲”奥秘何在？美国学者罗斯林·薛（Roselyn Hsueh）和迈克尔·尼尔森（Michael Byron Nelson）提交给美国政治学学会2013年年会的论文《中国如何影响非洲国家——市场关系：

以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为例），分析中国电信企业在非洲的作用。

在非洲，电信业正在进行革命。2000年以来，超3亿人成为手机用户，数量每年超过40%的速率增加，并将持续到2020年，市场前景广阔。

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洲的基础建设投资从2001年至2007年，每年增长46.1%，在南撒哈拉的技术设施投资承诺从2005年起就超过了世界银行。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是在非洲谋求获取自然资源，指责中国没有帮助非洲建立更好的治理状况，是新殖民主义。

两位美国学者选取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作为案例。安哥拉和尼日利亚都是石油出口国，过去十年里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电信业成长显著，出现中国企业身影。但就石油进口而言，大量安哥拉石油输入中国，在尼日利亚，情形正好相反。

就安哥拉而言，长期内战影响市场环境，在十年前电信业起步时，几乎不存在正常运营的西方企业，竞争环境初期比较简单。在西方企业对安哥拉政局判断不明、徘徊犹豫时，中国政府基于“基础设施换能源”的方案容易获得接受，中国电信企业也因此进入安哥拉。由于电信产业的战略意义，安哥拉倾向于政府主导产业，私

营化程度不高，便于在政府协议框架下展开合作。

所谓“安哥拉模式”指的就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合作。中国政府“搭台唱戏”，引入政策性银行、财政部门提供资金保证；中国企业在履行承诺，把适合非洲使用、价格优惠的技术带到非洲，建立合作关系。

比较而言，在非洲最大的电信市场尼日利亚，“安哥拉模式”无法复制。尼日利亚市场中本身就存在不少西方电信企业，有一定自由化、私营化水平。

中国电信企业介入尼日利亚市场，最明显的作用是改变了市场的竞争态势，扮演“规则改变者”的角色。这种市场多元化变化有助于尼日利亚政府在全国选举中赢得更多选票，促使政府支持中国企业介入，形成“政府-市场同盟”关系，实现了中国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共赢”。

罗斯林·薛和迈克尔·尼尔森认为，无论是“安哥拉模式”，还是“政府-市场同盟”同盟，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非洲民众对电信业的需求。企业、政府、民众三方面获益决定了中国扩大了在非洲的影响力。

中国电信企业在进入安哥拉的过程中锻炼了国际竞争能力，同

时获取一定经济利益。不过，中国企业在劳动安全保障等方面不足也招致非洲工人批评。另外，中国产品的低价位也触发了关于中国给予企业不合理补贴的怀疑。

研究者认为，尽管遭遇西方国家批评，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推动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具体方式上存在“安哥拉模式”和尼日利亚式的“政府-市场同盟”，并不一定以获取能源为根本目的，客观上也推动了产业发展。这种做法决定了在非洲政治经济博弈中，中国取得“先手”。

参考文献

- Hsueh, R., & Nelson, M. B. (2013). How China is Impacting Business-State Relations in Africa: The Cases of Angola and Niger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书记和县长对教育投入的不同态度

共产党干部选拔和升迁制度作为基层官员的激励措施，深刻影响了公共教育的投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升迁轨迹并不一致，导致了他们对教育投入的态度存在参差。

◎ 邵立

地方教育投入的增减，和地方官员的政治任期有很大关系。这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吕晓波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刘明兴研究员在今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提出的观点。

两位研究者采集了全国六个省份的县级政府从 2001 年到 2007 年之间的教育经费变化，结合当地政府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任期更替进行定量分析，再加上一部分实地采访调研的资料进行讨论。

他们用奥尔森的“固寇与流寇”的理论进行解读。奥尔森把强制收税的国家与强行夺取别人财产的强盗进行类比，认为国家更像是盘踞在特定一个地方“收租”的固寇，他们乐于在自己“地盘”上提供公共服务，甚至获得当地人民的支持，以换取可持续的租金。另一方面，四处流窜的强盗则不会有给某一地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

吕晓波和刘明兴借鉴了奥尔森的框架。他们认为县委书记具有“流寇”的特征：由于共产党选拔干部的制度，他们的任期不固定，并没有从加大教育投入获取政治资本的强大动力。他们的研究论文也证明，县委书记任期和当地教育投入变化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相反，县长的任期通常比较固定，时间也比较长，他们更倾向于加大当地的教育投入，更像是“固寇”，利用教育投入换取基层的支持。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无一例外地热衷于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河南和湖北的两个案例里，县委书记都喜欢投资校园建设，但吝于把预算花在聘请老师等“软件”之上。

县委书记与县长的权力斗争也密切影响着对教育投入的态度。如果一个拥有政治实力的县长对教育投入一直很支持，“空降”下

来的县委书记也会有加大教育投入的冲动。在福建的一个案例中，一位县委书记在上任初期大手笔投资教育基础设施以获取人们的支持，但三年以后，当他扶植的干部基本垄断当地官场之时，教育投入也随之减少了。如果县长本身在当地任期不长，权力地位也并不稳固，那么县委书记对教育投入的态度也就会比较冷淡。

反观县长们，他们对教育投入的热情也和自己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与县委书记不一样，县长升迁最主要的途径便是被提拔为当地的县委书记。论文中的统计分析表明，在这些县长升迁成为县委书记之后，当地教育预算投入比之前减少 4%。这说明，县长们将教育投入当成是获取政治资本的一个途径。当“固寇”的县长成为“流寇”县委书记之后，他们对教育投入的热情也随之减少。

研究者最后总结说，论文证实了共产党干部选拔和升迁制度作为基层官员的激励措施，深刻影响了公共教育的投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升迁轨迹并不一致，导致了他们对教育投入的态度存在偏差。两者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也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作者评论道，当今的干部管理制度，尤其是县委书记的快速流动，虽然加强了上级政府对干部的控制，减少了他们在地方培植势力的可能，但在激励官员为地方事业长期发展的政策决策方面，显得不那么

成功，甚至有负面效果。从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可以看出，地方人民的长远福利也没有整合到县委书记的升迁考核之内。这也表明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没有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accountability）。

参考文献

- Lv, X., & Liu, M. (2013). Public Goods with Private Benefits: Understanding Local Governments' Incentives in Education Provision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政权合法性来自绩效？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模式”，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政体未来命运的争论持续不断，而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合法性”。中国的政权合法性何在？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中基于“民意授权”的合法性模式，绩效合法性能支撑中国未来政治走多远？

◎ 于灵歌

在 2013 年美国政治科学年会上，格拉斯哥大学三位学者 Neil Munro、Jane Duckett、Kate Hunt 与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Matt Sutton 结合三个实证研究的调查数据，对中国是否享有“绩效合法性”作出了探讨。

在政治学理论中，“合法性”（legitimacy）的概念最早由马克

思·韦伯提出，指政府和法律的权威被民众认可的程度，并按其来源分为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克里斯玛）与法理型三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对此进行修改，将意识形态、法治选举与绩效作为合法性的三个基础性来源。他联系中国的历史模式，将“绩效合法性”追溯至传统的“天命观”——天命无常，统治者只有履行职责治理好国家，才能承续“天命”。而这种以绩效为主导的政权合法性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

在本次研究中，“合法性”这一概念被分解为两大维度。一是政治信任，包括对党中央、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军队、法庭、公务人员的信任；二是对政体的支持满意度，调查人们对这种说法的支持度：“不管有什么过失，我们政府的组织形式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最好的。”

四位学者发现，近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而政治民主化程度则与之形成反差。与此同时，多次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政体拥有较高的民意支持，亦即享有较高程度的合法性。那么，合法性来源如何？统治绩效是否是影响民众的支持的主要因素？

他们选取了过去十年中中国内地的三份实证调查数据，其中两

份来自 2002 年与 2007 年的“东亚民主研究计划 ^{*}”报告，另一份是 2012 年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针对中国医疗互信评估的报告 ^{**}。

通过对“合法性”两大维度与四个假设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学者们发现：在 2002–2012 十年间，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虽然较高，但整体趋势走向中等适度，同时异议增多。绩效是影响较高合法性的主要但并非唯一因素。与大多数定量研究发现不同，这项研究结果显示：政治绩效比经济绩效更能影响民众的支持，政体满意度方面则取决于民众对政治自由与法制建设的重视。

从影响合法性的其他方面看，十年间，意识形态方面变得更加多元开放，价值观复杂化，虽然目前没有严重冲突，但未来很有可能因冲突增加影响政体支持；大众媒体最为影响政治信任，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政治信任很难通过简单的信息“灌输”模式获得。个人环境方面，生活满意度的增加、个人定位的提升等则有利于较高的政体支持。

* 东亚民主研究计划 (Asian Barometer)：<http://www.asianbarometer.org>

**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trust and utilization of health care in China:* <http://www.gla.ac.uk/petu>

当然，这项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基于调查数据的相关分析在个别问题上无法解释与调查结果不一致的地方。研究最后指出，在目前依赖于绩效合法性、尤其是政治绩效越来越关键的模式下，中国政体在面对民主政治改革失败的风险时仍然相对脆弱。

参考文献

- Munro, N., Duckett, J., Hunt, K., & Sutton, M. (2013). Does China's Regime Enjoy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Surveys from the Past Dec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微博与公民参与：从大学教室开始

微博能促进社会联结和信息传播，从而提升政治参与。不少美国学者在大学政治学课程中引入微博（推特），尝试通过新式工具提升学生对政治事务的兴趣。研究指出，微博在影响学生政治参与程度上潜力巨大，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分析。

◎ 宿亮

Web 2.0 时代，社交媒体广泛渗透进社会各个角落，也影响着政治学研究。流行观点认为，微博能促进社会联结和信息传播，从而提升公民参与、政治参与。不少美国学者在大学政治学课程中引入微博（推特），尝试通过新式工具提升学生对政治事务的兴趣，并测试微博作为政治传播途径的实际作用。

美国综合性文理学院中北学院学者史蒂芬·卡里昂多 (Stephen Maynard Caliendo)、苏珊娜·肖德 (Suzanne Chod)、威廉·马克 (William Muck) 在 2013 年美国政治学年会提交论文，对微博在政治学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有趣的分析。

事实上，微博或社交媒体与政治学的互动早已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以“社会资本”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 1995 年曾提出，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导致公民政治参与度下降。一些学者认为，普特南的观点正确，但其结论是基于电视时代民众之间的共同联系不断降低导致社会资本减少而得出的。

也就是说，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微博通过使用者紧密联系创造新的社会资本，并成为信息传播的新途径，推动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发展。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认为，这种关于微博作用的说法存在漏洞。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最新调查显示，类似美国政治明星、纽瓦克市长克里·库克那样出于政治目的使用社交网络（特别是微博）的人本身在线下就已经非常活跃。其网络支持者也往往在线下就有较强的政治参与。因此，研究者无法确定微博是否

提升了政治参与程度。

那么，在政治学课程中引入微博，也就是要求学生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发微博并进行互动的做法是否能提升学生的政治参与呢？有人提出，那些在大学中选修政府或政治相关课程的学生往往预先对政治有兴趣并有所了解，或者先前就使用微博实施公民参与或政治参与，很难说使用微博是增加参与程度的先决因素。另外，尽管技术更新换代很快，但关于现实政治的讨论往往还是发生在线下。

不过，一些政治学学者还是寄希望于吸引学生来到教室，建立相对独立的对话空间，增加学生的政治学知识，并引发更多的政治参与。他们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一代社交网络、如微博已经能够形成与政治学课堂类似的环境，促进政治学知识和信息的传播。

换句话说，微博在不少学者眼中已经延伸成一种政治学教育的工具。课堂中的学生通过微博能在下课后继续讨论政治话题或与不在课堂上的其他学生一起讨论，推动了教师把政治学知识和信息从课堂传播到更加广泛的空间中。这种方式把学生置于政治

传播之中，提升政治参与程度，扩大政治共同体的构建。

中北学院三名学者为科学化验证微博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以本校政治学相关课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三个案例。其一是调查多个把发微博作为课堂要求的政治学课程，分析学生发微博的数量和内容；其二是对比那些没有把发微博作为课堂要求的课程；其三是追踪访问参加过以发微博为课堂要求之一的学生。

在第一个案例中，3个课程 54 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在为期 10 周的上课时间里总计发 742 条微博。除去教师发的 19%，有 36 名学生 10 周中平均每周发不到一条微博。2 名学生所发微博数量明显超过其他人。发微博数量前 6 的学生占了总微博数的 50%，前 10 名的学生占了将近 60%。从时间上来看，往往是前几周发微博数量一般，最后结课评分的几周内数量激增。

大部分学生支持在课程中使用微博。他们倾向于发原创微博，喜欢回应课程之外的人发布的微博，常常在微博中放入链接并 @ 课程之外的人参与讨论。

针对互动而言，关于课程内容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参与课程的学生之间，与课程之外微博网友的讨论不多。不少学生表示结课

后还会关注课程成员，但微博主要目的还是娱乐，而有 18% 的人回应课程结束后就彻底不再用微博了。

在第二个案例，也即没有发微博要求的课堂中，学生政治参与程度和兴趣没有体现出与第一个案例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研究没有体现出微博的作用。

在第三个案例中，34 个有效问卷中只有 8 人选择继续参加有发微博要求的政治学课程。但多数学生在结课后仍积极在微博上讨论政治和公共事务。多数学生自信，使用微博使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得到了提升。

三名学者在研究最后给出相对“开放”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一些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微博在影响学生政治参与程度上潜力巨大，但研究没有证实微博是否能排除其他因素单独发挥作用。就微博的“力量”，研究者谨慎乐观，他们认定，微博本身作为一种社交工具，不足以强化学生的政治参与，而使用微博的方式，例如微博聊天、在重大事件时“现场直推”等对政治参与可能有更强影响。

笔者最早在中国政治学相关研讨会上听到关于微博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是 2008 年初。当时国内流行的版本——新浪微博

还没有上线；如今，微博用户已经较为普遍，2011年的统计数据是1.95亿，有关微博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也成为热门话题。尽管中北学院学者这项研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但其内容和研究方法依旧对政治学在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Caliendo, S. M., Chod, S., & Muck, W. (2013). If We Can't Reach 'Em, Maybe Mayor @CoryBooker Can: Using Twitter to Increase Political Interest Among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 Stud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加入我们

政见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我们期待并随时欢迎你的加入。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相信：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

在这里，你可以与一群优秀的朋友共事，施展自己的才华。

成为政见观察员

目前，政见观察员以在国内外修读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和从事政治报道的媒体人为主。我们致力于将理性、深刻、富于启发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大众。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并且能够完成以下两项工作，那么你就是我们希望吸纳的新成员：

※ 阅读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与中国政治社会相关的文章，并撰写千字左右的文章对作者观点予以介绍。例文：〈“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CNPolitics.org/2011/12/local-political-participation

※ 联系研究中国政治的国内外学者，并进行访谈。例文：〈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你的职责将是定期提供稿件。因此我们希望你每周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政见自身拥有多种新媒体平台，并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让你的作品获得广泛的传播。我们是非营利团队，因此没有办法向你支付薪酬；如果作品被合作媒体选用，你可以得到稿酬。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作品。作品需为上述第一类文章。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设计师

如果你爱好信息可视化，如果你是 Adobe DTP 专家，如果你计较像素对齐、标点挤压……如果恰好你也像我们一样，关注中国政治，政见期待你施展以下任一才华：

- ※ 优雅的文字设计：擅长图文编排，对文本有严谨的控制力，对图像有丰富的表现力。在这里，你将亲自实践屏幕呈现的图文设计，还将参与平面媒体的信息图制作。
- ※ 精致的用户界面：擅长信息架构，熟知互联网及移动设备的交互模式，良好的视觉表现技能。在这里，你将直接推动政见网站的改版，探索政见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产品设计。
- ※ 创造性的信息可视化：擅长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动态、可交互的信息图设计。在这里，你将与时政领域最优秀的观察家紧密合作，探索中国政治话题下的信息创意传达。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设计作品。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LITICS.ORG

加入政见新媒体运营团队

政见是一个基于新媒体的团队，我们生产的内容依托多种新媒体平台传播。在今天这个媒体变革的年代，好的内容更需要依靠懂传播的人才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作为政见新媒体运营团队成员，我们希望你认同团队理念，并且能够完成这些工作：

- ※ 与现有团队成员合作，制定、调整政见新媒体运营的整体策略（包括微博、人人、微信等），并分工执行。
- ※ 与其他网站、平台联系开展合作。

我们希望寻找的新成员，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

- ※ 思维活跃，熟悉新媒体运营，熟练掌握各种新媒体平台以及 Photoshop 等软件的使用。
- ※ 掌握基本的政治学、社会学知识，修读相关专业者更佳。

- ※ 做事靠谱，认真细致。
- ※ 新媒体运营对及时性的要求很强，因此希望你大部分时候每天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并附文介绍自己对政见新媒体运营的想法。来信请致：Webmaster@CNPoitics.org

成为政见工程师

Web 前端工程师：

- ※ 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知识。
- ※ 熟悉 W3C 标准及规范, 熟悉 HTML、CSS、JavaScript 等技术。
- ※ 熟悉各类 JavaScript 框架, 如 jQuery、ExtJS、Yahoo UI、Prototype、MooTools 等。
- ※ 能熟练高效手工编写 HTML、CSS 及 JavaScript 代码, 确保代码对各种浏览器的良好兼容性。
- ※ 熟悉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法、对设计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及应用。
- ※ 具备 JavaScript 框架开发经验者优先考虑。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Web 后端工程师：

- ※ 精通 web 编程, 具备 PHP 开发经验, 熟悉常用设计模式。
- ※ 熟悉至少一种主流数据库及 SQL 语言、熟悉 Linux, 熟悉主流开源框架。
- ※ 热爱技术, 喜欢钻研, 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 ※ 有良好的沟通技能, 团队合作能力。
- ※ 有移动服务端开发经验者优先。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有意加入者, 欢迎投递简历。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Cover image courtesy of [Rijksmuseum](#)
— *Winter Landscape*, Barend Cornelis Koekkoek, 1835–1838.

欢迎投稿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

联系邮箱：Webmaster@CNPOLITICS.org

新浪微博：[@政见 CNPolitics](#)

腾讯微博：[@政见](#)

网易微博：[@政见 CNPolitics](#)

人人小站：zhan.renren.com/CNPOLITICS

Google+：[+政见 CNPolitics.org](#)

微信公众号：[政见 \(cnpolitics\)](#)



政见 CNPolitics.org © 版权所有

